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香港的民主運動與面對中國：司徒華的視野與歷程

Hong Kong's democratic movement and facing China: The
vision and course of Szeto Wah

卓育至

Yu – Chih Cho

指導教授：石之瑜 博士

Advisor: Chih – Yu Shih, Ph.D.

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July 2013



謝 辭



期盼了如此長久，這一天終於到來，著手進行謝辭的同時，也代表我三年的研究生生涯來到尾聲，更是我在台大七年歲月的句點畫下。步出椰林大道，回顧過去從政治系到國發所的點滴經歷，心中可說百感交集，而這半年來的論文寫作時光，更是一輩子重要的記憶。

論文之寫作是研究生必經路程，對我來說，在反覆琢磨論文的過程中，著實增進了我在資料收集、研究議題等方面之能力，而寫作論文的長期抗戰也使我的時間安排與生活規畫思維，都有著收穫。而更重要的是，在研究所求學的這段期間讓我逐漸找到自己未來理想的方向，了解自己真正想要什麼，而又應該如何去做，脫離了大學時期的茫然與懵懂無知，我想這是人生的一大啟發。

雖然本研究不能說對學術界有甚麼貢獻，也並沒有真正實質學術上的新發現，但我確實盡力的讓本文章能夠引發讀者的興趣與共鳴，在目前香港快速變動的政治與社會大環境下，面對切身重要的公共議題，可以如何的去思索其過去、現在與未來。

本文的完成首先感謝我的指導老師，台大政治系石之瑜教授，石老師博學多聞，在各學科知識方面都有所鑽研，學術著作以及學生眾多，提供給我相當多的資源，亦能從不同的角度表示意見，其思想與學術上之精闢見解啟發了我的思考方向，使我受惠良多。我論文大綱的口試委員，翁松燃教授與梁文韜教授，以及適逢颱風侵台，不得已而臨時更換、願意提供我指導的論文口試委員，高朗教授與邵軒磊教授，四位老師都給予我相當大的幫助，他們對於本論文的修正建議與提供之思考方向，使本文得以更為詳細與周延，感謝老師們的指導，在此向老師

們表達謝意。



接著感謝我們好友們，好友在人生的路途上互相扶持及鼓勵，感謝他們在我寫作論文時給予我的鞭策與幫助，互相鼓勵、陪伴我度過這段研究所求學的歲月，給我滿滿的能量。無論是國發所同學、高中同學、或者是台大政治系的大學好友們，在課業上或是平日生活中都充滿你們的身影，希望未來也能夠一起努力。政治系籃球隊、國發所籃球隊的戰友們，與台大各界籃球人士、那些也在拼搏論文的老校隊們，讓我在寫作論文的期間中，還能夠有人一起打球，放鬆身心，這是支持我的一股很大力量。

其他各界的好友們，project10、政治系 B93 的學姐們、學弟妹們、龍願老人團、石老師課堂的同學與前輩等，都一直給予我鼓勵，讓我充滿精神力量去完成我的論文。國發所辛苦的所辦行政人員與期刊編輯小組，也幫助我甚多。

感謝我的父母，完全信任我，並且一直督促我、幫助我，家人是我人生中最堅固的靠山，讓我無後顧之憂的完成了論文。也感謝父母支持我完成論文後出國留學的決定，沒有父母的支持不會有今日轉變的我。

最後感謝女朋友，一路走來我們互相扶持，體諒對方的焦躁與脾氣，並且互相影響各自的想法，是我最重要且最實質的精神支柱。我們終於一起完成各自的碩士論文，之後將朝向一起出國留學的目標前進，完成論文只是開始，我們將共同迎向更好的未來。

碩士研究生
卓育至
謹於 台灣大學
2013 年 8 月

摘要



近年香港的社會運動及民主運動蓬勃發展，諸如反洗腦、佔領中環等，令人興起探究其背景與相關訴求之想法。香港政治與民主運動深受中國影響，與中國間可說緊密互動與相連，而港人自我身份認知的議題亦是相當重要，身份意識的衝突，影響了近代香港整體政治決策與社會環境走向之變化。

司徒華代表香港的民主運動先驅，致力於香港的民主和社會進步。此同時，司徒華也是熾熱的愛國主義者，因此本文以司徒華的視野出發，在香港民主運動廣泛的範疇下，探討其一生政治歷程，和他對於香港與中國的情感、付出與影響。並藉由一個個人化的思想與行動歷程，來追蹤與分析在整個香港層次上，關於民主運動與身分情感意識之議題。

本文希望探討以下各層面問題：近代香港民主運動之背景與原因？港人在民主運動進程中對於「自己」和對於「中國」之間的看法如何？等特殊之情感與思維。

最後提出總結性的歸納，分別在：司徒華的民主思維、司徒華的民族主義、身份認同意識、不同的看法、司徒華的政治智慧、司徒華的人生觀等方面，均提出個人看法，並在最後就今日香港政局與香港民主運動之未來發展，做個人看法之陳述。

關鍵字：香港、中國、司徒華、民主運動、身份民族認同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ocial movements and democratic movement in Hong Kong have vigorous development, like Anti-brainwashing movement and Occupy Central movement, make me want to explore the background and the demands associated with this issue. Hong Kong's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movement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China, and the two indeed are closely connected. Therefore, the ethnic identity issue is important for Hong Kong people, Can be said that it did changed Hong Kong's political decisions and social environment movement.

Szeto Wah represents the pioneer of democratic movement of Hong Kong, dedicated in Hong Kong's democracy move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Meanwhile, he is also a patriot. Therefore, this thesis will look through his point of view, try to explore the political course of his career, and his emotions toward Hong Kong and China.

This thesis hopes to explore the following dimensions of questions: The background and reason of modern Hong Kong democratic movement. How do Hong Kong people think about “Hong Kong” and “China” ?

In the end of the thesis are the conclusions, put forth personal viewpoints in the different aspect respectively, and forecas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Hong Kong democratic movement.

Key Words: Hong Kong, China, Szeto Wah, Democratic Movement, Ethnic Identity

目 錄



目 錄.....	I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背景.....	1
第二節、研究目的.....	7
第三節、研究對象簡介.....	8
第四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12
第五節、文獻回顧與分析.....	13
第六節、研究方法.....	24
第七節、論文章節架構.....	25
第二章、香港民主運動的發展背景.....	30
第一節、港英殖民時期的香港政治.....	30
第二節、香港民主運動之發軔.....	35
第三節、過渡期的政治變化.....	38
第四節、九七回歸後的民主發展與爭議.....	44
第五節、菁英理論與香港民主的發展.....	55
第三章、司徒華的政治信念與意識.....	59
第一節、司徒華早年生活與背景.....	61
第二節、求學時期的思想形成.....	65
第三節、文憑教師薪酬事件.....	70
第四節、教協會的成立與運作.....	76

第五節、投身於社會運動	84
第四章、司徒華與香港民主運動的發展	92
第一節、司徒華的民主理念	94
第二節、參與民主運動與投身政治	98
第三節、六四事件與支聯會的創立	105
第四節、民主黨成立與香港回歸	115
第五章、司徒華與香港民主的答案	120
第一節、回歸後民主發展的困境與重生	121
第二節、司徒華晚年的堅持	128
第三節、後司徒華時代的挑戰	140
第六章、結論	145
第一節、綜觀司徒華一生與回顧	146
第二節、香港民主的今日與未來	155
參考文獻	161
附錄	181



表目錄



表 1：菁英民主理論的主流表述	24
表 2：回歸後的香港立法會選舉方式	48
表 3：各界對司徒華生前之評價	61
表 4：文憑教師薪酬抗爭之罷課活動日期	74
表 5：第二次中文運動三大目標	87
表 6：司徒華對於民主制度的看法	95
表 7：司徒華認為民主制度的優點	96
表 8：2003 年「七一遊行」中香港市民所提出之口號與訴求	126
表 9：「五號政改方案」對於 2007 年行政長官選舉方法建議之部分內容	130
表 10：「五號政改方案」對於 2008 年立法會選舉方法建議之部分內容	130
表 11：民主黨希望中央能接受的訴求	136
表 12：民主黨所提出的改良方案	136

圖目錄

圖 1：1997 年選舉委員會 800 名委員的分配	48
圖 2：香港人民對於梁振英任內之施政評分	158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背景

這一陣子在台灣的新聞以及報章雜誌、網路社論上，關於香港目前正如火如荼進行社會運動之相關訊息，包括「反國教」、「反洗腦」、爭取直選等，可說隨處可見，各談話性節目甚至開闢專題談論這個現象，突顯了其重要性與影響性，亦引起筆者興趣。在筆者初步認知中，類似這樣爭取民主自由、人權法治、訴求認同等的具體行動，在香港已經行之有年，雖然在過程中也曾經歷停滯、壓制或挫敗，但總體上，部分積極參與的香港人民已經為自己爭取到了重要的政治空間，並且接續的發展也咸信可邁向更大的目標。香港中文大學副教授馬嶽曾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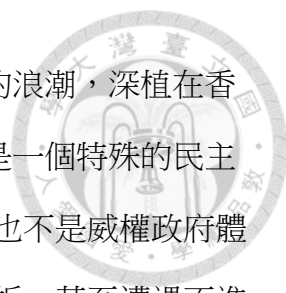
香港的民主運動歷時起碼二十多年，中間有不少人付出過相當努力，香港的民主發展，跌跌碰碰一路走來，不能算是有很大成功；但今天這「半桶水」的部分民主體制，其實是多年以來很多人付出過相當努力的成果，如果沒有這些人的付出，今天香港的政制可能更保守，社會更封閉、更不自由、更不公平¹。

根據相關資料，筆者認為新近較大規模、具主體性的政治與社會變化，無論是民間發起之集會活動（比如六四燭光紀念晚會²）、大規模的遊行（例如每年舉辦的七一遊行³），乃至於民間團體、政治團體、民意機關，或政府組織之間的調和互動與運作，都可以視為是近代以來香港一連串爭取民主與政治改革行動的各個環

¹ 出自馬嶽，（2010）。《香港政治：發展歷程與核心課題》。

² 維園六四燭光悼念集會，是悼念六四事件中的死難者的年度活動，1990年6月4日起每年由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舉辦，於維多利亞公園的硬地足球場舉行。

³ 七一遊行是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等民間團體自香港回歸起每年7月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舉行的大型遊行。至2003年才開始引起社會大眾注意，此後七一遊行成為香港人一年一度以和平手段共容表達多元訴求的大型活動，包括爭取普選、平反六四、保護弱勢等。



節，這些環節彼此相扣，互相支持，形成一股看似已不可抵禦的浪潮，深植在香港人民心中，也衝擊著香港的社會與政治局勢。事實上，香港是一個特殊的民主化⁴過程，根據鄒麗泳其文所述，香港未經歷殖民地獨立運動，也不是威權政府體制轉型為民主國家⁵。由於複雜的背景，香港民主化數次經歷轉折，甚至遭遇不進反退之情況，其中原因值得探究。香港雖曾為英國之殖民地，但其發展出了有別於世界上其他殖民地的繁榮與穩定，這是殖民統治史上十分特殊的情況⁶。

香港無論在港英時期或是回歸中國至今，都是一個經濟自由、行資本主義、司法獨立，政治上也自由的城市，公民基本權利具有保障。其身為經濟高度成熟的重要國際港口，「面向國際，背靠中國」的關鍵地理位置；同時在回歸之後成為世界首見的「一國兩制」體制⁷，加以與中共之間複雜的政經情勢、民族情感、以及《基本法》⁸的規範限制等等，總合而塑造了香港獨特的民主經驗。

若要談論整體香港的民主化，則議題顯得過於龐大與繁複，牽涉政治、經濟、社會、國際等諸多方面。因此在建構本議題的初步認知上，筆者選擇先由香港的歷史政治背景角度切入，期盼尋得蛛絲馬跡，以拼湊一合適之脈絡。

香港民主的濫觴可回推至數十年前，主要關鍵時期應在於 1970 年代前後。當時香港仍屬於英國殖民政府統治，舉諸政治制度、民生建設、教育和文化等，多方面與中國存在歧異⁹。1842 年鴉片戰爭戰敗後，清廷與英國簽署《南京條約》，

⁴ 在一般人與大多數社會科學家的理解中，民主化通常是指從威權主義或極權主義等其他各種政治體制轉變成自由民主制的過程。

⁵ 參考自鄒麗泳，(2006)。《「一國兩制」下香港政黨發展—民主黨個案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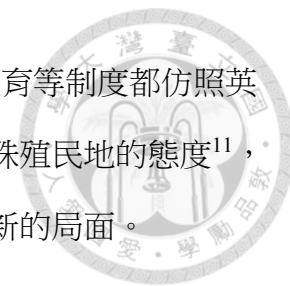
⁶ 參考自劉曼容，(2009)。《港英政治制度與香港社會變遷》。

⁷ 參考自丘偉國，(2007)。《急推；緩進：回歸前後香港民主路程》。

⁸ 基本法全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簡稱《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或《香港基本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性文件，由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負責起草。自 1997 年 7 月 1 日起，取代了殖民地時期《英皇制誥》及《皇室訓令》的地位，確認了特區政府的組成辦法、權力和責任、和中央政府的關係。

⁹ 這或許導致了香港人民對於「中國」以及「中共」認同上的差異，後文再作詳述。

香港永久割讓給英國¹⁰，殖民地政府接著成立，政治、經濟、教育等制度都仿照英國本土的模式而建立。雖然英國在香港的統治是以一種建立特殊殖民地的態度¹¹，但在英國有目的性、有規劃的建設之下，也著實使得香港開展新的局面。



雖然中方曾經多次表明要收回香港主權，也屢次抗議以及尋求談判，但在當時的國際情勢下一直苦無結果¹²。直到 1950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問題才又再次搬上檯面。1971 年，中國獲得聯合國承認，國際地位逐漸穩固，世界列強的權力天平產生震盪；次年，中英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時，中國便向英國與聯合國表明了收回香港的態度，並且積極與英國尋求談判¹³。自此，英國便開始在香港展開其「非殖民地化」的行動，推動一連串積極的民主與建設改革，建立代議政治與選舉制度等等，使得香港的民主化有了突飛猛進的進展¹⁴。另一方面，也帶起了香港民眾的民主思想，進而自發的組織團體，為了港人權益、香港前途和未來政制提出各種意見¹⁵。

1997 年香港回歸後，主權轉移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董建華出任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執行一系列接管的措施。如前文所提及，香港從割讓到回歸，前後經歷 150 年的英國統治（其中曾有過二戰時期 4 年的日本佔領），但在這段期間中，中國幾度政權更迭，政治鬥爭與紛擾亦不曾間斷。另

¹⁰ 詳細可參見維基百科，香港民主運動發展史條目。香港在滿清時期原屬中國廣東。1842 年鴉片戰爭戰敗後，清廷與英國簽署《南京條約》，把香港島及九龍半島的統治權永久割讓給英國，1898 年更簽署《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把新界租給英國，為期 99 年。在後文也會再作說明。


¹¹ 英國佔領香港並不是為了要建立一個移民的殖民地，也不是要經濟掠奪，而是要以香港做為向中國更深入的一個跳板、一個後援基地（葉健民，2009）。

¹² 1912 年中華民國成立後，也無法收回香港。二戰期間，香港曾為日本佔領，1945 年二戰結束後，也曾為了香港主權歸屬問題有過爭論，美國羅斯福總統也曾提出英國應該放棄香港主權。但在英國的強硬態度及戰勝國之間的利益關係下，香港的歸屬問題並沒有在戰後的國際會議上提出。在此背景下，香港於戰後仍由英國政府管轄。

¹³ 參考自劉曼容，前述書。

¹⁴ 英國之所以會突然在香港進行民主建設，是因為英國感受到他們對此殖民地的掌控在未來將會消失，而實施的一種「非殖民地化」的措施。後面會加以詳述。

¹⁵ 出自馬嶽，（2010）。《香港政治：發展歷程與核心課題》。



方面，中國政治局勢除了動盪不安，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也曾長期處在一種相對封閉的狀態之中。反觀香港，透過英國方面刻意的政策調和，在這 150 年間已經發展出屬於自己的一套政治模式，融合西方政制與傳統中國特點，並在代議政治、資本主義、教育制度等新概念的引進下，揉合發展出了一個較為開放的、高度經濟的、文化融合的、人權法治的社會，另外再加上本文所談論的民主化政治體制。這樣獨特的社會與政治狀態，與 20 世紀末的中國形成相當程度的差異。

雖然北京方面再三保證，在收回香港主權、建立新制度新政府的同時，原有香港的政治、經濟等制度與文化習慣等將獲得保留，香港也仍享有很高的獨立性與自主權¹⁶，是為「特別行政區¹⁷」、「港人治港¹⁸」，也可以解釋為「一國兩制」的概念。不過，雙方之間存在的諸多差異性導致了香港面對回歸時之爭議與風波產生，這顯現在文化、制度與政治等多個面向，特別是香港人民對於中共專制政權缺乏法治精神、壓迫人權等等的恐懼。

自從 1949 年中共政權建立後，在殖民政權統治下的香港人民已看過太多次政治鬥爭、侵害人權的行為，諸如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等，因此形成港人認為中共為一專制獨裁政權之普遍印象，論者總對它是否容許香港實行真正的一國兩制懷抱質疑。另一方面，中國近年來的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包括食品安全、環境破壞等，也使得港人對中國之擔憂情緒加深。

¹⁶ 根據 1984 年中英雙方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1997 年後的香港除了國防和外交以外，享有非常高的自主權。根據香港的憲制性文件《基本法》所規定，香港在回歸後的 50 年內享有獨立的政治、經濟、司法及生活，並可以繼續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與國際事務，及與其他國家簽訂協議。

¹⁷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英語：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簡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特區政府、香港政府或港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部門的總稱。1997 年香港主權移交，政府全名改為上述名稱，並根據基本法沿用大部分原有制度。香港政府首長為行政長官，轄下有多名局長負責管理各政府部門。

¹⁸ 中國政府解釋對香港回歸後有關政策的說法。所謂港人是指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有居留權並有資格按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獲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簽發的載明此項權利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者。所謂“港人治港”，就是指未來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立法機關將由當地人（即“港人”）組成，內地不派幹部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立法機關工作。華夏經緯網，(2007)。港人治港。



因此，筆者認為，近代的香港政治與民主運動發展處處可見中國之影響。一方面北京欲確保對香港的控制，令香港整體發展維持在預定的軌跡；反之港人則希望能在北京限制的框架下極力爭取民主自由政治，建立一完善的政治制度，以確保專制獨裁、法治與人權倒退之情況不會發生¹⁹，這也就是近代香港民主化運動的重要驅動背景之一。

檢視中國對香港政治民主化之影響的相關文獻同時，筆者亦發現這或許與香港人民自我身份認同之議題帶有關聯，根據文獻顯示²⁰，港人近年來的身份意識轉變連帶影響了整體政治決策與社會環境走向之變化，加上與北京之間的牽制互動，形成一種群帶關係。在初步的認知上，筆者以為近代香港民主運動以及政治發展，是和香港主體意識與「香港人」認同帶有某些連結，這也是為什麼香港回歸的時候中共要仰賴「港人治港」的政策以爭取認同、安撫人心的原因。


香港本土主體意識的出現大約受到英國殖民、香港經濟與國際地位、香港民主化，以及 1970 年代「港式流行文化」興起等的影響²¹，代表香港人民逐漸認為自己是獨立的一個群體，擁有自己的文化、制度與思想。在今日的香港，「香港人」的身份是已經確立的概念，有如「英國人」、「中國人」一樣的主體認同意識，是堅而不可摧的。這樣本土意識的興起與蔓延在近幾年中國內部問題不斷、新任特首梁振英政府管制失當等諸多情況下達到高峰，甚至社會上出現訴求「香港獨立」之聲音。

根據香港大學民意調查顯示，在 2012 年 6 月港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身份

¹⁹ 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

²⁰ 包括劉兆佳、鄭宏泰、馬傑偉等人均曾著作相關研究與文獻，後文於文獻分析部分再加以詳述。

²¹ 參考自凌文海，(2010)。〈殖民地時期傳統左派對「港人身分」的認知與感受〉。載於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新力量網絡主編，《本土論述 2009：香港的市民抗爭與殖民地秩序》，p.53-60。



的比例為 45.6%；而對「中國人」身份認同僅有 18.3%，是香港回歸以來的最低點²²。不過事實上，港人是一直保留著傳統的文化與生活習慣，並沒有因為殖民統治而斷絕自己與中國的連結。香港居民組成泰半來自中國移民，他們不但保留傳統中國文化，更因為英國的統治而幸運避開了中國許多的政治鬥爭，使之有機會成長為中國文化世界中較為現代化的地區。

對於北京來說，香港自始至終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如同台灣問題一樣，在主權上沒有任何退讓餘地。因此北京方面除了實質的政治控制外，一直以來亦不斷試圖增加港人對中國之情感連結，1980 年代的香港曾經在愛國人士的奔走下，逐漸建立起民族主義情感，包括保釣行動等愛國運動，都可視為是香港人民愛國意識之展現。筆者認為正因如此，逐漸形成了香港人民對於「自己」與對於「中國」的認同差異與情感拉扯²³，為一個具有繁複背景的社會現象。

香港回歸至今已經十五年，中共及香港之間的關係持續維持微妙平衡，其間香港爭取民主、尋求公民社會發展之行動也持續進行。因此筆者欲透過對此議題的研究探尋，嘗試對心中逐漸浮現之問題做出解釋，諸如：近代香港民主運動之背景與原因？港人在民主運動進程中對於「自己」和對於「中國」之間的看法如何？又，香港對於「中共政權」的認知？等等這些特殊的情感，其中原因值得探究推敲。

而透過以上對於香港近代民主運動，以及政治與社會現象之觀察與初步探討，筆者發現部分的香港社運人士，或許同時也是民主運動之先驅，他們對於整個香港民主爭取的歷程付出甚多，可說居功厥偉，甚至型塑了現代香港政治的樣貌。

²² 出自香港大學民意網站，(2013)。《市民的身份認同感 — 身份類別認同》。

²³ 參考自鄭宏泰、黃紹倫，(2002)。〈香港華人的身分認同：九七前後的轉變〉。《二十一世紀》，73，71-80。

司徒華（Szeto Wah，1931 - 2011）便是其中具代表性之人物，他對於香港民主運動之投入，以及個人的強烈民族主義都與本文主題脈絡具有相當高關聯性。



2011年初，香港人所尊稱為「華叔」的司徒華在罹患肺癌的長期糾纏後過世，享年 79 歲，香港朝野與政商各界都一致表示哀悼。司徒華一生熱愛香港，致力於香港的民主和社會進步，曾領導數次社會運動，也擔任過壓力團體主席，更曾經進入建制擔任立法會議員職位，可說是近代香港民主運動最重要的推手之一。此同時，司徒華也是熾熱的愛國主義者，他希望可以由香港的改革出發，進而影響到整個中國，脫離中共的專制領導體制，邁向民主政局，是為終極目標。他曾說：「我愛國，因為看到民族的苦難，我愛我的同胞；但愛國並不等於愛黨，也不等於愛一個政權。我的終極目標，是要結束一黨專政，建立民主中國²⁴」。又說：「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愛的不是黨、領袖、政權，而是人民、傳統文化、土地山河²⁵」。

因此筆者選擇司徒華的論述作為整理分析的主要對象，從他的視野出發，在香港民主運動廣泛的範疇下，探討其一生政治歷程，和他對於香港與中國的情感、付出與影響，進而投射至整個香港層次之議題。以下本文所討論的是，上述的諸多歷史思維，在實踐上如何透過其間人物的參與及領導而得以開展。


第二節、研究目的

本文之研究目的、所預期的研究方向與成果敘述如下：

一、香港的民主發展有其特殊的背景因素及過程，也有著與中共之間交織複雜的政經牽連。今日香港能確保較中國為開放的政治體制，並擁有法治與人權保

²⁴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

²⁵ 出自司徒華，(2007)。〈甚麼是愛國？甚麼是民主？〉。載於《煙雨平生（三言堂結集）》。



障，都是經由不斷努力所得來的，香港民主得以具體落實更是全體港人冀望的共同命運與目標。本研究欲藉由一個個人化的思想與行動歷程，來具體的追蹤與分析香港特殊的歷史背景與定位，是如何形塑香港的民主運動，而民主運動推動的過程中受到哪些因素影響？以及九七香港回歸與港中複雜的政經關係又產生了何種作用？

二、同前所述，香港民主運動以及政治與社會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與港人對於中國的認知有所關聯，香港民主運動的興起，是出自對「港人治港」的期望，以及確保高度自治之政治運作，這也牽涉了港人本土意識之發展。若說港人愛國，事實上他們認為自己的「中國」並不是中共所代表的「中國」；另一方面來說，港人追求民主但也未必是要與中國切割，其間尚未有強大的獨立之求。此為一個繁複的議題，因此本文想要從化約為個體化的情感起伏中，探討近數十年來港人的民族情緒是如何起伏與轉變？以及香港的本土意識與中國認同可能如何授司徒華之影響？

三、由於司徒華本人對於香港民主運動的帶領與投入，反映並帶動了港人的身份意識，他深摯的愛國情緒與中國觀值得探究。本文將由文獻中整理司徒華的著作、行動、思想與情緒，作為嘗試說明香港民主運動發展之原由與歷程、以及港人本土意識與中國觀之間的一個連結性論述。同時探討司徒華投身民主運動之因素，與行事軌跡和思維脈絡，推究其對香港政治與社會之影響，並追問香港的民主運動在後司徒華時代將會如何持續？以及香港未來的發展展望。

第三節、研究對象簡介

司徒華 (Szeto Wah, 1931 年 2 月 28 日 – 2011 年 1 月 2 日)，人稱「華叔」，出生於香港，祖籍廣東開平，畢生從事教職。司徒華愛好閱讀並寫作不輟，著作

繁多，包含散文、報紙專欄，與發言紀錄等，透過文字將處世哲學、個人喜好與思維告訴讀者（見附錄整理）。他也是近代香港民主運動最重要的推手之一，與大律師出身的李柱銘共同被尊為香港民主運動先鋒，及香港民主派元老。



司徒華出生正值日本侵華戰亂時期，母親早逝，共有七名兄弟姐妹，家境並不富裕，更曾經歷過家人分散逃難的戰爭時期²⁶。據他自述，幼年性格孤僻內向，不善交際，因為喜愛閱讀而培養出獨立思考的能力²⁷，這也影響了他未來行事模式之構成。由於親身經歷日本侵華與抗戰、目睹日軍暴行，激發了司徒華的愛國之心，也構成其國族認同之形成。他說：「這些耳聞目睹的抗戰事蹟，給我很大刺激。我渴望國家富強，不會再被侵略，人民不再被異族欺壓²⁸」。

司徒華為了幫忙家庭生計，照顧弟妹，所以選擇投身教職。1952年畢業於葛量洪師範學院²⁹，為該校首屆畢業生，並從事教育工作長達40年。香港的社會運動興起於局勢混亂不安的1970年代，成熟於1980年代，這同時也是司徒華投入社運與政治生涯之重要開始。1973年他領導文憑教師與港英政府抗爭，利用串連罷課而成功爭取合理薪酬，並且催生了「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³⁰」，對於整個香港的教育與社運影響極大。

據其自述，這是司徒華首次參與大規模之社會運動，可說是他一生關鍵，自

²⁶ 1942年日本入侵香港時，司徒華父親單獨留在香港，而把司徒華與兄弟姐妹送回廣東開平老家，直到戰後才又回到香港。

²⁷ 參考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第二章。

²⁸ 前述書，23頁。

²⁹ 葛量洪教育學院(Grantham College of Education)是一所曾經在香港提供專職教師專業培訓的院校，以美術教育為主，於1951年創立，於1994年被合併為香港教育學院的一部份。詳參維基百科。

³⁰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簡稱教協），是一個由香港各級學校教師組成的工會，現有會員超過80,000人，是香港最大的單一行業工會及參與會員最多的民主派組織。其定位除了是工會外，還是教育團體、社會團體和民間團體。司徒華曾任主席。



此積極投身社運之中，例如金禧事件、第二次中文運動³¹、保釣運動、領導香港教育界抗議日本篡改教科書中侵華歷史等等，而漸成為香港社運的領導人物。

這些行動使司徒華被英國殖民政府視為「親中人士」，而事實上當時司徒華與北京之間確實維持一定關係³²，是一種不拒絕、保持適當距離的互動。1985年，司徒華當選香港立法局議員，同年司徒華應北京之邀進入基本法草委會，成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協助《基本法》起草³³，來到他政治生涯的高峰。而他也 在草委會中認識了李柱銘，兩人同為日後香港民主黨的創建者，亦為民主政制與法治的重要推行者。

司徒華的政治生涯在 1989 年「六四事件³⁴」，中共武力鎮壓學運之後，有了重大的轉變。六四事件後，司徒華表示他認清中共本質，「中共的本質就是敵視人民，權力第一，不容許任何挑戰，任何侵犯他們權力的人，即使手無寸鐵，統統格殺勿論³⁵」，再加上先前諸多政治事件與風暴，諸如文化大革命、對人權迫害，以及黨內鬥爭不斷而百姓生活困苦等，使他對中共徹底的失望，於是與李柱銘一起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正式與中共決裂。


³¹ 中文運動是 1970 年代香港為了爭取中文成為官方語言地位的社會運動。1841 年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後，只有英文為有法律效力的語言。雖然各種與華人有關的通告、告示多數都會翻譯成為中文，但一切法律文件只有英文具法律效力，因此與政府的文書往來只能以英文進行，此一政策使得港人認為英政府忽視華人，而激起了民族情緒。

³² 司徒華為愛國份子，在早期學生時代他曾認同中共的新民主主義說法，受左傾思想影響。他希望中共建國之後，中國將可以走上富強的道路。不過在看過中共作為之後，司徒華還是選擇與中共保持適當距離，為一種不拒絕也不主動的態度，因為他對於中共仍存有一點期待。詳見《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

³³ 司徒華認為，香港回歸後採行的基本法，必須要是民主的、法治的，而對於北京之邀，他的答應參加就是希望能確保基本法的制定能夠對香港有利，至少能夠參與起草過程，為港人發聲。

³⁴ 六四事件又稱為天安門事件。此六四事件是指發生於 1989 年 6 月 3 日晚上至 6 月 4 日凌晨，中國人民解放軍與示威學生、民眾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附近和通往廣場道路上所爆發的流血衝突，最終中國政府宣佈戒嚴且派遣軍隊前往廣場以武力進行鎮壓，隨著許多民眾死傷與流亡海外、部分軍人傷亡後示威活動宣告結束。

³⁵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309 頁。



六四事件成為司徒華人生及政治生涯的重要轉折點，他即刻退出基本法草委會，同時在香港聯同多個民間團體，組織成立「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³⁶」，策動市民支持學運及民主的改革行動，同時對中國民運人士提供協助。司徒華主張六四是人類史上最黑暗的時期，支聯會的首要目標即是為六四平反，並且堅決反對中共的一黨專政、侵害人權³⁷。

在此之後司徒華與李柱銘等人決議強化香港民主運動的力量，團結各方派系勢力和政府抗衡，於是聯合數個團體共同成立香港民主同盟，不久又與「匯點³⁸」合併為目前的香港民主黨，成為香港爭取民主最強大的政治力量。2004年司徒華宣布不再參加立法會選舉，放下承擔了18年的議員重擔，並且淡出香港民主黨與政治圈，轉而將所有精力集中在支聯會與民主運動的運作上，但他在民主黨中仍然維持一定的影響力。

1997年香港回歸之後，司徒華持續為了香港的民主努力，也為了維護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政治承諾而努力，更期盼中國真正的蛻變成長。每年在香港維園所舉辦的紀念六四燭光晚會³⁹，便是司徒華一直努力所得來的。香港回歸至今十五年，人民對特區政府的不滿、對政治改革的要求、乃至於對北京政策的質疑等，風雨不斷。然而今日香港人民已經敢於發聲，捍衛自己的權益，表達意見和訴求，筆者認為這部分應歸功於司徒華等一系列為了民主而努力的人士，加

³⁶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Hong Kong alliance in support of patriotic democratic movements in China, 簡稱支聯會)，於1989年在香港人支持當時中國民主運動的大遊行中成立，目的是支援中國的愛國民主運動。支聯會主張「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每年舉辦「六四燭光悼念集會」、大遊行及其他相關活動，支援民運，爭取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在中國早日實現。參考自支聯會官網，<http://www.alliance.org.hk/>；以及維基百科之支聯會相關條目。

³⁷ 引述自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網站。

³⁸ 匯點是香港較早的政治團體，成立於1983年，初期是論政團體，直到1992年才進行政黨化改組，而後在1994年與香港民主同盟合組成為香港民主黨。

³⁹ 維園六四燭光悼念集會，是悼念中國北京天安門六四事件中死難者的年度活動，由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主持舉辦，首次於1990年6月4日，在香港島銅鑼灣的維多利亞公園內的硬地足球場舉行。據官方統計，每年參加的人數都達數萬人以上，甚至有十多萬人參加的紀錄。

以整體時局環境之變化，推動香港公民社會形成。



近年香港民主的發展方向是希望能走上全面民主、爭取普選的道路，但在特區政府與《基本法》的諸多限制，以及香港泛民主派內部不合、甚至分裂之下，路程並不順利，幾度陷入瓶頸，而司徒華也數度捲入政治紛擾局面。但華叔仍然堅持自己的信念，「愛中國、愛香港、愛民主」，各界均感受到其不屈不撓的風骨，這些亦可從他的著作中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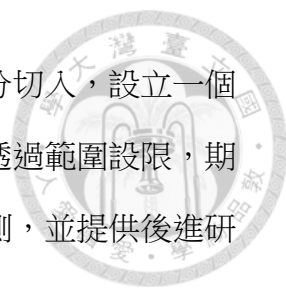
2010年，司徒華宣布自己患上末期肺癌，正在接受治療。雖然他身患癌症，但仍堅持活躍於政治圈與社運，繼續出席活動，以及六四燭光晚會。2010年9月，華叔更染上肺炎，健康情況持續轉差。他明白自己身體狀況，可能不久於人世，但是華叔並不畏懼死亡，反而一直掛念的還是香港，還是中國，他說：「我活著的目的，是使自己能為其他人、為國家民族做有意義的事⁴⁰」。2011年1月2日，司徒華病逝於威爾斯親王醫院，終年79歲，香港各界人士一致表示哀悼。司徒華治喪委員會由家屬、民主黨、教協、支聯會等組成，喪禮以基督教形式⁴¹進行。香港失去了一位為民主奮鬥的先驅，民主黨的策略家，但他的信念與努力已經改變了時局與多數的港人，香港人民爭取自己權益的行動將會持續。

第四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文概念主軸在於香港民主運動的發展與近代香港的身份意識，而這兩者同為香港極為重要的議題，相關論述著作數量龐大，各研究分支流派亦為多元。此二概念具有深且廣的意涵，牽涉政治、社會、經濟等諸多層面，因此必須蒐集大量資料，以分析歸納與佐證理論。為了避免研究資料的蒐集過於龐雜，難以對重

⁴⁰ 出自《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458頁。

⁴¹ 司徒華經受洗而成為基督徒。



點掌握與分析，故有必要限縮其範圍，設立邊界，取其焦點部分切入，設立一個框架作為限制，在框架之外的部分則稍作陳述而不深入分析，透過範圍設限，期能獲得較貼近真實性的研究結論，也較可以作為未來的分析預測，並提供後進研究者參酌。

香港民主化運動發展至今數十年，其間歷經諸多重要事件，包括六四事件、香港回歸、七一遊行等，每段事件的前後因果轉折都可為獨立的研究，要做總合性的分析論述更顯困難，亦有篇幅過於龐大之慮。因此在時間線上，本文會將研究聚焦在「近代」的香港民主運動上，在這段時間裡港、英、中三方的互動與情勢變化，以及政府與社會團體之間的關係，成為香港民主發展的關鍵，並且這也是司徒華所主要參與、投入的部分。此外，本文主要是探討「從司徒華的思想與行動所具像化的」香港民主運動，因此將試著以司徒華此一民間團體領袖的理念角度出發，述說社會團體所認知的香港民主，以及爭取民主的過程與思維。

另一方面，香港的民族主義充滿多元的表現，港人的本土身份建立與民族情緒受到多方面的影響，在自己、中國、港英政府、中共之間，構築了複雜的思緒理路。本文選擇了司徒華這一代表性人物，冀望透過對他的研究與認識，去探討港人的中國觀念與港人本土意識的興起。

故本研究設定以司徒華的視野而推及香港，整合以司徒華思維架構為內涵的框架，藉由對華叔個人的研究、回憶錄探索與文獻分析，期能將香港民主運動發展與身份認知的概念主題做較為清晰與主題性的探討，結合成具脈絡的理論。

第五節、文獻回顧與分析

本研究之主軸在於「司徒華視野下的近代香港民主運動與身份意識」，因此文

獻的回顧與分析採取不同之面向進行，分別探討香港民主運動以及香港的身份意識，藉著對過去研究經驗之整理與學習，加強本文相關論述路徑的建構，同時也對相關之理論做初步建構。




香港民主運動

本文談及香港近代的民主運動歷程，嘗試包含從殖民政府推動之背景，經過其中數度轉折，到發展為今日的樣貌之相關探討。雖然香港民主發展至今不過數十年，但相關的文章著述、研究眾多，足見學界之重視與心力投入。有鑒於香港民主運動仍為一進行中的現象，過去的部分理論可能已經與現實有所出入，因此以下對相關文獻進行檢視，期望可對本文的撰寫有所幫助。

學界一般認為，香港民主運動的興起與英國殖民統治政策緊密相關，這也是普遍認為促成香港人民挺身面對政治與社會問題、公民社會逐漸建立的關鍵因素。如香港教育學院教授盧兆興在《Decolon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 Citizen Participation》中提及，港英政府在 1980 年代推行的「非殖民化 Decolonization⁴²」行動，促成了港人民主觀念的形成以及政治參與。同樣的觀點亦可在香港中文大學副教授馬嶽的《香港政治：發展歷程與核心課題》，以及大陸學者劉曼容編寫的《港英政治制度與香港社會變遷》書中尋得。也就是說，在香港回歸前的過渡時期，由於英國確知即將退出香港，因此開始在香港主導一系列民主化與代議政治改革；此外，當時政治局勢的渾沌不明，亦迫使港人體認到必須起而爭取民主自由、為自己的前途發聲。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劉兆佳在《過渡期香港政治》一書中，對於近代香港民主發展的論述，提出了相關論點。在對於九七回歸的看法上，他認為此為香港民主

⁴² 非殖民化通常是指一個地方從外國殖民統治轉而獨立及自治的過程，與殖民主義相對。在這裡也是指稱宗主國在撤離殖民地前所進行的政治活動。




化的動力，同時也是阻力。九七回歸之所以為動力的原因如前文所述，而其對於香港民主發展之阻礙，根據劉兆佳看法，1980年代香港民主運動開展的首要目的，是防禦北京對港英管治權力的侵奪，及減少港人對殖民統治的挑戰。因此當時民主的發展是由上而下的、被動的、處處受限的，並且帶有其他目的性，港人意欲爭取政治上更多的開放，但並未有所成果。《基本法》的施行成為香港民主發展的另一障礙，回歸後《基本法》即刻上路，並對於香港的政制設立了明確規範，依照《基本法》，雖然中共聲稱給與香港一定的自主性，但事實上最後決定權還是掌握於北京。總和以上，這也就是劉兆佳之所以認為九七回歸是香港民主發展阻力之原因。

李正義說：「北京是香港民主發展的鉗制因素，『基本法』所設計的是『缺乏政治抉擇』的民主機制⁴³」；劉兆佳的《香港 21 世紀藍圖》也提到，北京在香港建立以行政長官為首的政府，直接聽命中央，由行政長官總攬大權，是為行政主導的政體。如此制度設計就是為了要一方面讓香港維持原有制度與生活，同時中央又得以完整的領導與監督。總合來說，回歸以後香港的政治體制，特別是民主的發展，可說處處受制於北京。

如前所提及，儘管面對北京的諸多限制，港人的公民意識已然覺醒，主動爭取自身權益相關之議題，也會為了香港的自由和民主挺身而出。香港政治評論人陳雲在《政改三十年，民運無了期》文中提及，回歸後由於香港特區政府的持續失能，使得人民奮起而走上街頭抗爭，催生了 2003 年的「七一遊行」。遊行最後獲得了成果，並且打破僵局、開啟香港民主新的一頁，「原本要埋沒香港民主的中共代辦，卻成為香港民主的促成者⁴⁴」。馬嶽在《香港政治：發展歷程與核心課

⁴³ 出自李正義，(2000)。《香港民主機制的發展》。

⁴⁴ 出自陳雲，(2010)。〈政改三十年，民運無了期〉。載於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新力量網絡主編，《本土論述 2010：香港新階級鬥爭》，p.105-114。



題》中也說，「七一遊行」之後，港人對於民主與普選的意識大為提高，衍伸出更為積極爭取行政長官以及立法會議員普選的行動。不過此時的香港雖然可說是上下一心，共同一致爭取民主，但《基本法》與北京的管制仍在，北京最後否決了港人 07/08 年「雙普選⁴⁵」的要求，使得香港民主仍未突破實質的僵持狀態。司徒華在他的回憶錄《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中也探討了這部分的歷程，並且稱之為「艱苦的民主路」。

以上文獻主要關於香港近代以來民主發展的背景與歷程，理路清晰，均有其研究之貢獻，著實可供後進研究者參考，在本文的後續章節也多有參酌引用。本文嘗試從民間社運的角度去觀察香港的民主運動現象，可惜這方面的文獻資料較少，目前學界多數著作，或是相關論文文獻均較著重於談論香港政治體制、選舉制度，或是一國兩制對香港回歸的影響，較少著墨文化或是民主運動層面，因此資料找尋上或有困難之處。學界先輩對於香港民主的研究，為本文的撰寫鋪了一條道路，幫助甚大，希望本文對於相關主題所進行的分析整理亦能對往後研究有所助益。

香港的身份意識

本文另一提及的主題便是香港市民身份意識的形成與自我定位問題，也可表現為香港本土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之間的互動消長。這對港人而言，是為重要且切身之議題，特別在今日回歸中共政權後的香港，身份認同的變化與衝突顯現在文化、政治、社會等多個層面。《香港身份認同的建造⁴⁶》文中提及，一般談及文化認同時，往往是在講一種身份構成的過程，是一個定義「自己」和「他者」的過程，具有排他性。

⁴⁵ 此雙普選指香港人民要求特區政府在 2007 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以一人一票的普選方式選出行政長官，同時於 2008 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全數立法會議席亦皆由普選產生

⁴⁶ 取自 <http://www.socialwork.com.hk/artical/sociology/top12.htm>



但香港市民的身份意識同時存在兩種層面，包含了對於「香港人」以及「中國人」兩種身份的認同，甚至是互相交叉而變化為「中國的香港人」或「香港的中國人」，可說相當複雜且矛盾。正因為此議題的重要性卓著，所以相關的文獻著作與資料均相當豐富且多元，由各種不同角度切入分析，甚至是新聞及網路資訊論述等均亦齊備，透過對相關資料的分析與研究，或可提供本文相當大的幫助。

所謂的身份意識或是「認同」，在《香港身份認同的建造》中有所提及，而根據高金鈴其文《香港回歸前後的身份認同觀察》所述，最早是心理分析學派把自我認同當作是個體經由一連串身份認知的過程，包括對外客體的投射與同化（identification），來確定個體對自身主體的認知並賦予意義，較偏向個人自我意願的主觀條件。而後社會學家逐漸把認同與社會的關係連結起來，認為認同形成時，除了個人的主觀條件影響之外，也不能忽視社會建構的客觀條件，因為社會結構會影響自我的主觀認同，相同地群體的主觀意願也可能定型而成為社會結構的一部分⁴⁷。對於香港「認同」的這個議題來說，可以觀察到香港的身份意識已經不單純是傳統認知中，人民個人的「國家認同」或是「民族認同」意識，而已經漸轉變成經由政治、社會、文化等多層面互相影響下的個人「身份與群體認同」之範疇。

香港身份認同的混亂之處，根據劉兆佳的說法，是在於港人同時存在對「香港人」以及「中國人」身份的認同，並且隨著時局變化而稍微有所消長。劉兆佳在《「香港人」或「中國人」：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 1985-1995》文中指出，香港華人普遍使用「香港人」及「中國人」兩個詞來指稱自己，「身份認同的問題牽涉到

⁴⁷ 參考自高金鈴，(2004)。《香港回歸前後的身份認同觀察》。

香港華人對他們與香港及中國的關係的理解與界定⁴⁸」。而一般認為，前者與香港本土意識興起相關，而後者則為家國認知與民族主義之範疇，本文所欲分析的對象司徒華，即為香港家國認知與民族主義一派的代表人物。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鄭宏泰與香港社會學者黃紹倫在《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九七前後的轉變》中說：「港人的身份認同在兩者之間互相拉扯搖擺，每當遇上國家大事，他們會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但當涉及到另外一些情況（例如民主人權問題、政治醜聞等），他們又自覺和大陸有別，認為自己是香港人⁴⁹」。香港中文大學的王家英與尹寶珊在《香港市民身份認同的研究》中也認為，雖然九七回歸對於港人身份意識之塑造帶來很大影響，但無論如何，「香港人」與「中國人」一直以來都是香港市民認為極具意義的兩個主要集體身份。


在現今港人身份意識的建立上，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馬傑偉在《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論述》中說：「『香港人』作為一個集體，其邊界遊移不定，是投射而來的想像，想像出一個集體，想像出一條邊界，作為身份安頓之所」。也就是說，近年「香港人」本土意識的形成與發展，「是歷史條件下具有的社會情境的產物，雖然沒有本質上的必然，卻有文化、經濟、政治的後果⁵⁰」。

追本溯源，造成今日香港身份認同分裂與模糊的主要起因，科大衛（David Faue）在《Society,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中認為，是因為香港曾為英國之殖民地，受過英國的殖民統治。王家英與尹寶珊在《香港市民身份認同的

⁴⁸ 出自劉兆佳，(1997)。〈「香港人」或「中國人」：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 1985-1995〉。《二十一世紀》，7，43-58。

⁴⁹ 出自鄭宏泰、黃紹倫，(2002)。〈香港華人的身分認同：九七前後的轉變〉。《二十一世紀》，73，71-80。

⁵⁰ 出自馬傑偉，(2002)。《香港人的身分認同論述》。取自 http://www.com.cuhk.edu.hk/project/eric/site/hk_identity.pdf




研究》文中提及，香港是一個由華人移民為主⁵¹所組成的城市，因此催生了由血緣與共同歷史文化背景而來的民族情感，亦即對「中華民族」的家國情感認同。另一方面，香港同時也曾是一個長期由異族政權統治的殖民地，漸漸形成了港人以香港疆界與統治為基礎的集體認同，也就是香港本土情感之概念。再加以諸如香港高度發展的經濟與國際地位、受西方影響下的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和中國大陸不同的語言（粵語）與文字（繁體字）、高度人權與法治化，與對於中共威權政制的恐懼等因素，使得「香港人」身份意識逐漸擴散，對新一世代的港人形成很大影響。

最後一個關鍵因子便是香港九七回歸，其直接帶來政治上的重大變革，在港中之間政治體制歸屬結合為一的同時，也帶來了雙方國民整合上的課題。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林泉忠在《「九七回歸」與香港華人的認同問題》中說，香港的九七回歸是一種「歸屬」的變更，也是一種政治意義上的轉變。面對著九七回歸後政經社會等多方面變遷可能帶來的不穩定性，於是塑造出社會的凝聚力，「香港人」的身份意識更加強烈，也就演變成了今日中國民族認同與香港主體性認同的折衝。

香港人民的身份認同矛盾表現在許多方面，諸如政治、文化、種族與族群等等，而港人也嘗試從種種方面去驗證其自身身份的認同，這是為一個之於香港市民切身相關，但又牽涉廣泛、理性與情感糾結，難以具體評述的問題。筆者認為，對於目前的新世代，港人最為重視、同時在傳達其身份認同訴求時最習以訴諸的層面，除了政治之外或許就屬文化了。

呂大樂、吳俊雄、馬傑偉三人共同編輯的《香港·生活·文化》書中提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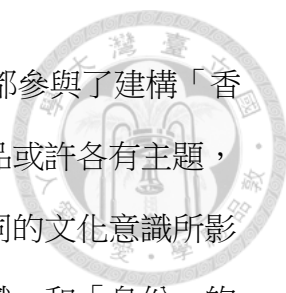
⁵¹ 根據資料統計，香港應有接近九成之人口為華人移民組成。



要了解香港的社會現象、衝突與矛盾，就要從香港的文化去剖析，因為生活與文化是互相鑲嵌的。此外也有許多學者從文化思考的角度出發，梳理港人對於「香港」身份的看法，以及港人本土意識的建立。周蕾的《寫在家國之外》描述香港文化層面，指出它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由於英國殖民的歷史，香港是為一後殖民的城市，揉合中西，形成複雜的社會與身份現象。周蕾認為香港並不樂見回歸祖國，港人應該建立起自身獨立且超群的文化社會價值，走出自己的一條道路，才是面對身份矛盾與衝突的較好方式。筆者認為，周蕾所言或許就是新一世代香港市民本土意識的解釋，而這也是政治上香港本土派之訴求，某些程度也影響了港人民主運動之路徑選擇。

另外，呂大樂在其發行之《號外三十套裝—林青霞》的序文《號外：一個香港文化的故事》中，也提到香港擁有獨特的語言與生活習慣，這也是支持香港本土意識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上海出生，香港長大的學者金擘路在《香港作為一種立場》文中，藉由他的身份背景與經常往來港中兩地的經驗，去思考香港與中國之間的文化碰撞。他認為今日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政治單位，並且社會構成以華人移民為主、溝通也以華語文為主，中國的重量對於香港來說是巨大且無法忽視的。在後殖民時代的其他強勢文化擠壓之下，文化的多元性、彈性與包容性就是香港最大的價值，亦是走出一條新道路的契機。

除了文獻著作與論述之外，透過藝文途徑傳達的香港本土意識，可說是香港文化界最有力量的方式，而香港電影更是其中最重要之一環。香港電影經歷數十年發展，具有完整的環境與人才，儼然成為香港的代表性大眾文化藝術，甚至可謂是港人的情感出口。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李歐梵在《兩部香港電影 — 戲仿與預言》文中曾說：香港的電影是在「對普通香港居民和觀眾的集體『政治無意識』，以商



業產品的形式作出公共表述⁵²」。近代許多的香港電影作品，也都參與了建構「香港文化」以及「香港主體認同」的過程，從表面上看，這些作品或許各有主題，遵循著不同的藝術和商業邏輯，然而在更深層次卻可能受到共同的文化意識所影響，這個文化意識就如李歐梵所言，正是出於對「香港本土意識」和「身份」的探求。香港電影可以說是藉著其敘述和影像參與了對「香港」的想像性締造⁵³。

上海大學教授葉凱在其《身份的認同 — 對金庸小說及電影的文化解讀之一》文中描述：

在香港 50 多年來的各個時期流行的類型片中，很多都包含了這樣的因素，武俠功夫片、古裝片、警匪片、黑幫片、臥底題材影片等香港影視界所熱衷的題材，雖然是都是一種商業娛樂產品，但正是這些影片，在國家意識形態話語和精英話語失語的情況下，多角度的反映了香港市民對自我身份認同上的觀念。

50 年代開始的武俠功夫影片及其他的古裝片的盛行，正在在一種強烈的中國大陸本土文化歸屬感的趨勢下形成的。而從 70 年代中期開始這類影片的逐漸衰落，正是同香港人的這一文化身份認同的逐漸形成互相脈動⁵⁴」。


文中另外也舉了幾個例子來說明香港電影作品中所傳達的身份意識，像是 2002 年的電影《無間道⁵⁵》，講述黑幫與警察互相臥底，透過兩位主角的工作，探討在臥底時對於自身身份的定義產生變化，到工作結束時已經對於身份的認知產生混亂，而迷失方向。藉由電影這樣的情境塑造，事實上也是反射出香港人民所

⁵² 出自李歐梵，(1998)。〈兩部香港電影 — 戲仿與預言〉。《世界電影》，1998，(04)，34-47。

⁵³ 出自羅崗，(2001)。想像香港的一種方式。

⁵⁴ 出自葉凱，(2004)。〈身份的認同 — 對金庸小說及電影的文化解讀之一〉。《二十一世紀》網路版，31。

⁵⁵ 《無間道》(Internal Affairs)，2002 年底香港出產的警匪臥底電影。劉偉強導演，劉德華、梁朝偉主演。



處的現實與對於身份的迷惘。另一方面，像是周星馳的無厘頭作品，也為香港塑造了新的流行文化，那些生活在香港、天天接觸本地普及文化的人，都會對此產生共鳴⁵⁶，並且久而久之周星馳的電影也形成了香港新時代文化的一個代表。總言之，香港電影以其自身的影響力，在許多方面嘗試透過直覺的影像、精煉的劇情、引人深思的時空背景設定，去傳達出港人對於過去歷史、文化定位、自身意識等的想法。

透過以上文獻之回顧與分析，對於香港身份意識的演變做出初步的知識建構。筆者發現，在與香港身份意識相關的著作與資料當中，較多的是從香港本土主義角度出發而論述，探討港人近年主體意識的凝聚現象，比較少有探討港人的中國觀與民族主義角度之著作。而事實上，無論是「香港本土意識」或是「中國民族主義」，對於香港的政治與社會發展，都佔有一定的地位，由民意調查顯示⁵⁷，近年港人本土意識的確有大幅上升，但兩者之間然仍然存在往復拉扯之消長關係，尚未出現明確趨向。

本文的研究對象司徒華是大家所熟知的香港民主運動先驅，其同時也十分關懷中國的民族與人權議題。重要的是，華叔本身對於香港身份意識的觀點，也存在「香港人」與「中國人」之間的複雜情結：他愛香港，盡其一生努力推動香港的政治民主發展，但他同時也是一個中國愛國主義者，他的政治理念由中國出發，終極目標是要建立民主中國。因此筆者嘗試由他的著作文章之中，檢視其對於「香港」與「中國」身份的立場與情緒，並探討其中轉折原由，同時分析如此的情感如何影響他的政治決策。

⁵⁶ 出自劉佳玲，(1997)。〈「香港/人」的顯影拼貼——析論「家」與「身分認同」的香港電影論述〉。

⁵⁷ 參考香港大學民意網站。

菁英理論

筆者認為，貫穿香港整體民主運動的主要支柱為香港的社會菁英，因此「菁英」論便是一個切合本文主軸之理論框架，必須加以探討分析。



「菁英」一詞最早出現在 17 世紀的法國，是用來稱呼「品質優良的商品」。其涵義經過數個世紀以來或許有所轉變，但整體而言可以概括解釋為「在人群社會中，資質、條件、身份背景較卓越，而能夠獲取較多政治或社會資源的少數人」。更具體的說，「民主菁英理論」或許更能夠描述香港民主發展中社會菁英所扮演的角色。雖然早期菁英理論的部分說法和民主之精神有所衝突，菁英主義者認為在政治治理中菁英的地位遠比公眾重要，唯有透過最有能力的人進行寡頭領導，才能建立完善的政治社會，而這明顯與民主主義由公眾參與治理的精神不符。由於在現代主流政治思想下，民主政體仍然是最適合的政治體制，於是出現了「民主菁英理論」，嘗試結合兩者觀點，為現代民主政治提供理論框架。其中代表學者有韋伯(Max Weber)、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eter)與拉斯威爾(Harold Lasswell)，他們主要的理論如下：

韋伯	韋伯首先提出政府機關中有著系統化的分工組織，是為科層體制 (bureaucracy)，他認為透過強而有力的政治領袖來監督政府機器的運作，而這些領袖也接受普世的民主價值，則官僚們就會服從這些菁英，創造出真正的代議民主政治。
熊彼得	熊彼得是最早提出菁英民主理論的學者，他說：「民主的方法，乃是一種為達成政治決策而做的制度安排，在此制度中，個人以競爭人民選票的方式，掌握決策權力 ⁵⁸ 」。公民對政治決策的影響降低，由菁英負責決定與執行政策，但菁英之間必須相互競爭，

⁵⁸ 出自 Joseph A. Schumpeter, (1976).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取得民眾的信任與支持，為「人民贊同的政府」的概念。這種模式可以確保民主政治的運行。
拉斯威爾	他認同社會菁英存在的重要性，在民主政體中也是由少數人執行相對大的權力，關鍵在於菁英對大眾的「責任」，統治者要對被統治者負責，被統治者也有監督的權力，如此方為現代政治中菁英與民主相調和的方式 ⁵⁹ 。

表 1：菁英民主理論的主流表述⁶⁰

在現代的民主化理論中，許多學者也將政治精英視為民主化進程中最為重要的因素，政治菁英在社會上與政治圈中的行為、決策與信念等，可以影響整個民主發展的過程。諸如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李普賽特（Seymour M. Lipset）等，他們既重視政治菁英在社會關係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注意到其他社會菁英甚至公民在社會關係中的存在和主張，認為菁英既可以產生於社會上層，也可能從下層產生；既可以產生於政治領域，也可以產生於其他社會領域。

第六節、研究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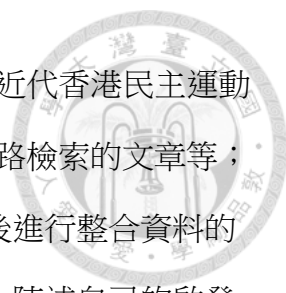
本文主要進行對司徒華參與的香港民主運動歷程，以及香港身份意識之相關研究，採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中的質化方法進行。

本文主要使用文獻分析法與歷史分析法，分述如下：文獻分析有助於了解研究對象看待有關問題時的態度，從文獻中去尋找當代或歷史的問題意識⁶¹。本研究

⁵⁹ 出自 Harold Lasswell and Abraham Kaplan, (1963). *Power and Society: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Inquiry*.

⁶⁰ 參考自葉俊麟，(2001)。《菁英理論應用於政策制訂過程之研究：以我國國民卡方案為例》。

⁶¹ 參考自石之瑜，(2003)。《社會科學方法新論》。台北市：五南出版



涉及對歷史演化的觀察與個案的研究⁶²，因此筆者將嘗試蒐集與近代香港民主運動以及香港身份意識相關的書籍、期刊、報紙與雜誌社論、以及網路檢索的文章等；同時也蒐集司徒華個人的著作、回憶錄、相關新聞與評論，爾後進行整合資料的交叉整理、分析、與詮釋，嘗試能夠歸納得到預期的研究結果，陳述自己的啟發並且提出見解，建構研究目的中所述之脈絡架構。

而歷史研究法是希望從歷史過程的演變中，分析事件的前後相關因素，並探討這些因素之間的關係，如何影響其變化。本文將由龐大資料中，梳理與研究主題相關之歷史脈絡，嘗試進行前後能夠相串連之完整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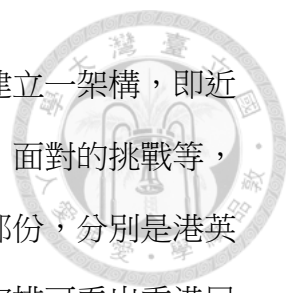
至於訪談的部分，由於司徒華本人已於 2011 年離世，故無法採取直接訪談研究法來取得第一手資料，甚為遺憾。本研究將會以各種文字資料或是影像、聲音資料來推究其原意，甚至在往後會斟酌情況，如有適當機會也會研擬對其他相關人士的訪談，以對研究做出補充，強化立論之基礎。

第七節、論文章節架構

本研究共分為六個章節，在此說明預計敘寫的內容以及章節安排：

第一章為緒論，首先說明研究動機與背景，以及評估預計得到的成果。之後對研究對象及相關文獻作初步之介紹與整理，最後是說明採用的研究方法和本文章節安排等。

⁶² 個案研究是針對一個單獨的個人，所進行的表意式檢視。主要的目的雖然是在於描述，但也可以試著提出解釋。本文即試著在司徒華的框架下歸納出一個脈絡。李美華等(譯)，(1998)。出自 Earl Babbie 著，社會科學研究方法(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下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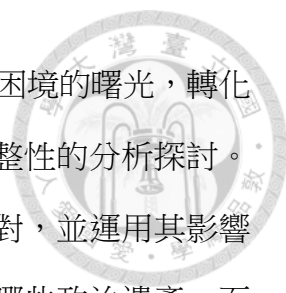


第二章開始為正文，本章嘗試為全文研究的框架做破題，建立一架構，即近代香港民主運動的發展史，從興起的背景到後續一系列的發展、面對的挑戰等，做出整理與回顧。這裡依照時序將香港近代政治歷程分為幾個部份，分別是港英殖民時期、過渡期政治發展、回歸後的困境等，希望從如此的安排可看出香港民主發展是否有一脈相承的理路，並為後續探討司徒華之香港相關視野之章節鋪路。在本章的最後，也嘗試為司徒華之於香港影響之整體現象提出相關理論解釋，即菁英理論的提出，觀察司徒華的相關行為模式是否與理論有所連結。

第三章主要談及司徒華政治信念的形成，是怎麼樣的環境際遇，塑造了他的堅毅性格，並一生堅持其信念。首先由司徒華早年時期說起，先是幼年時代之經歷，再到其求學時期投入社團運動之經歷，接著探討首次與中共思想接觸的思維轉變路程。之後分析司徒華投身社會運動的契機，以及司徒華畢生志業之一的教協之創立過程，嘗試由其中總和探索司徒華與整體香港大環境在當時政治社會變動之背景下，社會運動與公民意識萌芽之互相作用。

第四章則主要談司徒華與近代香港民主運動之發展。首先寫司徒華的民主意識，包括其理想中的民主政制樣貌，與其堅持為香港爭取民主的原因。接著是司徒華於 1980 年代參與民主運動與進入政壇之過程與實際行為，在香港政治變遷的框架中做一個描述。之後談六四事件爆發對司徒華所造成的影響，此為他一生政治生涯的轉捩點，自此他與中共正式決裂。爾後他在香港創立支聯會，本文將探討他們之間的連結，司徒華的思想與人格影響了支聯會，而支聯會也一直對司徒華的行動提供後盾，透過支聯會司徒華得以推行他的更多理想，使他更有力量。最後探討香港回歸前的政治變化，包括民主黨成立與港中之間的政治勢力交錯。

第五章討論回歸後的香港在民主運動上面臨的限制與困境，包括外在與內在



的因素，爾後在 2003 年七一運動時產生一個轉折點，一個突破困境的曙光，轉化而成延續到今日對於民主與直選等之訴求，本文嘗試做一個統整性的分析探討。接著寫司徒華晚年所面對的香港政治爭議，他是以何種思維面對，並運用其影響力做出對整體最為有利的決策。最後是司徒華過世後，他留下哪些政治遺產，而他的哪些精神又可為後人所學習。後司徒華時代的香港民主該如何繼續堅持前行，筆者除了整理相關文獻外，也提出一些個人見解。

最後為結論，根據前幾章的分析內容，做一個歸納總結，為本文主軸「司徒華視野的近代香港」，在民主運動發展以及身份意識兩個框架之下，陳述自己的研究發現。首先回顧司徒華的一生，在幾個主要思維脈絡下做歸納性、整體性的分析，提出個人見解。之後嘗試解答本文最開始之疑問，即近年的相關社會運動是否與司徒華之影響有所關聯，之後再對香港民主未來可能的發展，提出筆者個人看法，或可供未來研究之參考。

以下為各章節標題：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背景

第二節、研究目的

第三節、研究對象簡介

第四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五節、文獻回顧與分析

第六節、研究方法

第七節、論文章節架構



第二章、香港民主運動的發展背景

第一節、港英殖民時期的香港政治

第二節、香港民主運動之發軔

第三節、過渡期的政治變化

第四節、九七回歸後的民主發展與爭議

第五節、菁英理論與香港民主的發展

第三章、司徒華的政治信念與意識

第一節、司徒華早年生活與背景

第二節、求學時期的思想形成

第三節、文憑教師薪酬事件

第四節、教協會的成立與運作

第五節、投身於社會運動

第四章、司徒華與香港民主運動的發展

第一節、司徒華的民主理念

第二節、參與民主運動與投身政治

第三節、六四事件與支聯會的創立

第四節、民主黨成立與香港回歸

第五章、司徒華與香港民主的答案

第一節、回歸後民主發展的困境與重生

第二節、司徒華晚年的堅持

第三節、後司徒華時代的挑戰

第六章、結論

第一節、綜觀司徒華一生與回顧

第二節、香港民主的今日與未來



第二章

香港民主運動的發展背景



前言

近代香港民主運動的發展，可說與整體環境及歷史之背景密不可分，其互相的影響與作用十分顯著。因此若要對本文所建構的框架「司徒華視野的香港民主運動與身份意識」作探討，則需先從其背景開始，掌握前提與要素，再漸次逐步的往下分析，以期能夠作為整個研究的基礎。本章嘗試架構近代香港民主運動發展與香港政治環境變遷的歷史背景，刻畫較為重要的環節，並與司徒華在社會運動與民主運動中之足跡作出聯結，以如此的脈絡，帶出後續章節對司徒華思緒之描繪。

第一節、港英殖民時期的香港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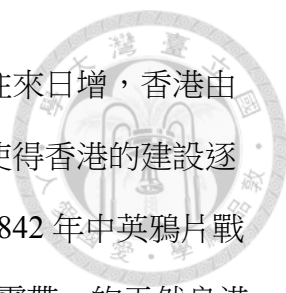
香港地處中國東南，由香港島、九龍和新界三部分所組成。香港目前為國際上重要的金融、服務及航運中心，以高度經濟發展、法治自由與中西文化交融聞名全球，與紐約和倫敦齊名為世界三大最具影響力之都會⁶³。此外，香港同時也是目前世界上特殊的「一國兩制」政治體制施行之地區。

香港原為一人口不多的漁村⁶⁴，在此生活的居民生活簡樸平實，以捕魚曬鹽維生⁶⁵。事實上，在英國將之納為殖民地之前，香港一直都未有一個明確的行政區劃

⁶³ 參考自 Michael Elliott, (2008). A Tale Of Three Cities. TIME Magazine, 2008/1/17.

⁶⁴ 參考自 Jan Morris 著，(2006)。黃芳田譯，《香港 1840-1997 大英帝國殖民時代的終結》，96。

⁶⁵ 書中引述 1840 年代香港割讓後來到香港之英軍所描述之景象。



與地位，而是統稱於嶺南廣州地區。清代中葉後，清廷與他國往來日增，香港由於相當鄰近當時的貿易重鎮廣州，因而部分商船會來此停靠，使得香港的建設逐漸興起，軍事方面防備也開始加強，香港亦漸為國際所認識。1842 年中英鴉片戰爭之後，英國看中香港「港闊水深，四季不結冰」，且「不在地震帶」的天然良港地理優勢；另一方面，英國也希望能以香港做為與中國及遠東地區貿易的據點⁶⁶，因而要求清廷割讓香港島和海港，自此香港成為英國的殖民地。

英國統治香港之後，立刻宣布香港為一自由港，任何國家商船均可在此停靠貿易，且採低稅率、免關稅措施，是為「香港開埠」。自此之後，多間洋行在香港設立，華人商號也相繼成立，香港成為英國與中國之間經濟往來的重要根據地⁶⁷，自由貿易與私人企業興起，經濟快速發展。另一方面，割讓予英國也使得香港得以避免接連的危難戰亂，例如太平天國、反清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與中共黨爭等，這也使得大量人口陸續移入香港，影響一百年來香港的城市化、以至於製造業大量興起、經濟騰飛，漸漸型塑香港的樣貌。

今日在香港在經濟貿易之外，重要的是社會穩定、文化中西融合、政治風氣相對中國開放與自由，這樣的背景條件，形成孕育近代香港民主思想的興起與發展之關鍵因素。而歸納香港民主思想興起之原因，實與英國的殖民統治有著深遠關係，以下嘗試提出幾點看法：


(一)、殖民政府的統治方式與政商共治

對於香港的統治，英國採取全權政治領導，也就是「主權在英」的原則。維多利亞女王於 1843 年頒發《英皇制誥》⁶⁸ (Letters Patent)，制訂《香港憲章》(Hong

⁶⁶ 參考自丁新豹，(1997)。〈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載於王賡武編，《香港史新編（上冊）》，59-130。

⁶⁷ 參考自丁新豹，前述書。

⁶⁸ 《英皇制誥》(Hong Kong Letters Patent) 是香港在英國殖民時期的重要憲制性法律文件，為皇



Kong Charter)，為英國政府對香港統治之指引性文件，並任命砵甸乍（Henry Pottinger，台灣譯名為璞鼎查）為香港第一任總督。砵甸乍上任後，即依據《英皇制誥》成立香港政府，設立議政局⁶⁹、定例局⁷⁰和最高法院等相關的政治機關。由於香港的地位特殊且重要，關乎英國在中國與遠東地區之商業利益，是「遠東和歐洲的一個聯絡環節⁷¹」，需要中央直接的管制。因此殖民政府採取「行政主導」政治體制，以倫敦指派的港督為政府核心，總攬大權，達到由上而下的穩固統治。

另一方面，港英政府的政策方向是以經濟貿易為主要考量，倚重英商華商資本協助英國本土的經濟發展，而政府亦直接的提供貿易保障，雙方結合成利害關係共生體，因此政府單位中多有英資商行的代表進入⁷²，形成殖民官僚與英商財團共治的局面。經濟導向的統治原則也使得殖民政府採取較為包容的態度，而非高壓手段，藉以減低民眾抗爭之可能性，維持社會的持續穩定而確保英國在中國的商業利益。

（二）、尊重華人文化傳統

由於英國是以異族殖民政府姿態進入香港，而香港仍以華人為主要的人口組成，因此如何削減文化衝突、爭取社會認同，達到穩定的統治以提高施政效率，便顯得相當重要。港英政府在許多方面試著保持與華人文化的兼容並蓄，像是舊有習慣、律法、宗教與風俗等均盡量予以保留，強調「尊重華人習慣與傳統」。另一方面亦引入西方的文化與思想，採取開放的統治方式，中國學者吳江曾說：「港英政府在香港營造一種由西方文化為主導的社會環境，同時也允許中國傳統文化

室制誥的一種。當中的 24 條條文，規定了香港的行政、立法及司法機關的組成、權力，及一般事宜，且確立香港的三權分立政體。

⁶⁹ 即之後的行政局（Executive Council）。

⁷⁰ 即之後的立法局（Legislative Council）。

⁷¹ 參考自張順洪等，（1997）。《大英帝國的瓦解-英國的非殖民化與香港問題》。書中引述英國首相邱吉爾所言。

⁷² 參考自馬嶽，（2010）。《香港政治：發展歷程與核心課題》。

的存在與傳播」⁷³。



在實際的政策面上，根據金耀基所言，殖民政府透過委任華人菁英和社團的領袖進入政府決策機關，諸如行政局、立法局或是市政局等，藉由菁英作為英方與華人溝通的媒介橋樑，借助華人菁英在社會上的威望，達到收買人心穩定統治的目的。金耀基稱這個過程為「行政吸納政治」(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⁷⁴。採行相關政策可說相當成功，英國在香港的殖民歷史中，除了幾次的暴動之外，並未有過嚴重的大規模反殖民運動，殖民政府的統治整體而言是平順的⁷⁵。

另一方面的影響，英國採取的包容政策也使得香港人民對於自己的中國文化認同得以保存；而重視菁英所帶來的影響，可以從日後香港民主化運動興起時，多是經由社會菁英的領導與推行看出，香港的社會菁英在民主的爭取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這兩個部分在後面再加以說明。

(三)、六七暴動的影響

根據馬嶽的說法，香港在 1967 年發生的六七暴動，影響了整個香港的發展，無論是對於殖民政府、抑或是整個社會而言。

1960 年代的香港正遭逢經濟低潮，失業率和物價上漲，政府弊案頻傳，造成人民信心低落與社會不穩定。此同時，中國爆發了文化大革命，連帶使得香港一直存在之左派份子的情緒被挑起⁷⁶，於是在 1967 年他們展開行動，目標直指打倒英國殖民政府。抗爭情勢隨著時間演變而擴大，乃至於發起聯合罷工與罷課，以及

⁷³ 參考自吳江，(1997)。〈香港文化認同問題〉。《廣東社會科學》，1997 年第 4 期，22-23。

⁷⁴ 出自金耀基 Yeo-Chi King, (1975). 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 in Hong Kong: Emphasis on the Grass Roots Level. *Asian Survey*, 15(5):422-439.

⁷⁵ 參考自劉兆佳、關信基，(1993)。〈香港市民的取向－香港人對政治權威的態度及殖民地政權的認受性〉。《香港廣角鏡月刊》，1993 年 9 月號，90。

⁷⁶ 澳門此時爆發的「一二三事件」也對香港左派鼓舞極大，詳見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

激進抗爭行為接連產生，是為「六七暴動」。不久後，香港左派的行動趨於暴力與失控，包括放置土制炸彈攻擊，造成死傷與恐慌，迫使殖民政府必須採用武力鎮壓。這些暴力行為同時引起社會群眾反感，輿論群起批判，最後暴動在港英政府的壓制，以及中共總理周恩來的表示⁷⁷下，漸漸平息⁷⁸。

六七暴動的平息，對當時的香港帶來很大影響。首先是人民對於港英殖民政府的認同增加：一方面由於政府平定了造成社會動盪、人民生活困擾的暴動；另一方面則是相對於當時處於混亂文革中的中國政府而言，港英政府的確維持了香港社會的穩定與秩序⁷⁹。其次，港英政府也了解到香港社會目前的需求與反應，於是針對部分政策進行改革及調整，包括主動介入社會、改善官民溝通、重視民意與人民需求、社會福利建制、推動廉政建設等⁸⁰。

在以上所述的影響與改革之下，香港的確開展了新的局面，七零年代變成了香港的「改革年代」，除了社會進步，經濟也突飛猛進，人民對於港府的認同提升使政策執行上更有效率，人稱「黃金十年⁸¹」。這樣的背景條件，為香港社會運動及民主運動的孕育塑造了良好環境，呂大樂說：「六七暴動令在港出生及成長的年青一代開始反思香港的前路，為七十年代的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播下種子⁸²」。

總和以上，我們可以說，香港雖然經歷一百多年的殖民統治，但是卻十分特殊的形成了社會開放、經濟高度發展、文化多元的環境。這樣的先天背景條件，對

⁷⁷ 此時在大陸的政治風波稍微平息，北京感受到動搖香港現狀對自身並無好處，於是表示香港左派份子放置炸彈的行動是過於激烈（丘偉國，2007）。

⁷⁸ 參考自張家偉，（2000）。《香港六七暴動內情》。

⁷⁹ 參考自 Ian Scott, (1989).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⁸⁰ 參考自馬嶽，（2010），前述書。

⁸¹ 指稱香港總督麥理浩（Sir Murray MacLehose）在位十多年來，對於香港的建設良多，促進了香港整體社會與經濟的大幅提升。

⁸² 出自呂大樂，（1997）。〈香港故事：「香港意識」的歷史發展〉。載於高承恕、陳介玄編，《香港：文明的延續與斷裂？》頁 1-16。

於日後民主化、自由化思想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提供了一個孕育的溫床。



第二節、香港民主運動之發軔

一般對於香港民主運動的分析，都認為七十年代的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是香港八十年代民主運動的先聲⁸³。如前所提及，1966年的六六暴動⁸⁴與1967年的六七暴動，在某些程度上激發了香港青年的自主思考，主動關懷香港政治社會與未來前景⁸⁵；相對的，此時港英政府也更加重視人民聲音，並啟動具體的改革措施。在此兩因素相輔相成下，帶起了港人公民意識的開展，形成一股社會運動風潮，多由大學生集結成組織而發起，諸如「保釣運動⁸⁶」、「中文運動⁸⁷」，並擴大到社會各個層面。不同的壓力團體、獨立工會應運而生，包括「香港社區組織協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簡稱教協）」等。當年參與學生組織的學運人士後來多投入社運壓力團體之創建，而他們也對往後香港的民主運動做出很大貢獻。比如本文所描繪的司徒華，便是在此時期發跡，爾後成為其中代表性的人物。

香港的民主化運動，植基在七十年代的社會運動基礎上，發揚於八十年代。推究其緣起，除了逐漸成熟的社會運動體系、公民意識，加上政府改行開放態度施政成為推手外，主要的起始動力根據馬嶽所言，是港英政府主動自上而下的推行政策改革。他提到，港英政府在總督麥理浩於1979年訪問北京之後，了解中國未來收回香港主權、執行和平統一⁸⁸的決心，因此便在撤出香港前推行一系列民主

⁸³ 參考自馬嶽，(2010)，前述書。

⁸⁴ 1966年由於天星小輪（天星小輪是橫渡維多利亞港的最短航線）加價引發民眾不滿，進而引發大規模抗議行動，甚至出現暴力抗爭的行為。最後由港英政府鎮壓而平息，天星小輪最終還是加價了五仙。

⁸⁵ 參考自呂大樂，前述書。

⁸⁶ 保釣運動始於1970年，是在日本與中國之間，為了釣魚臺列嶼主權問題而發起的一系列運動。活動方式包括遊行、示威、登船出海到釣魚臺列嶼海域等等。

⁸⁷ 中文運動是1970年代香港學界所發起，希望爭取中文能成為官方語言的社會運動。

⁸⁸ 當時中國大陸處於改革開放的時候，除了香港問題之外，尚有澳門與台灣的問題待解決。因此

化的政策措施。而這也帶起了香港民眾的公民意識，進而自發組織團體，為了港人權益、香港前途和未來政制提出各種意見⁸⁹。



根據劉曼容的分析，香港在回歸前政治的民主狀態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段為「禁止民主發展時期」，而後段則是「加速民主發展時期」⁹⁰。這兩個時期的分野，主要在於 1979 年麥理浩出訪北京，以及後續的中英談判。

一、禁止民主發展時期

自割讓予英國開始，香港即進入殖民統治時代。殖民政府為了穩固統治，一切的制度設計均圍繞中央，由總督專權，政府官員均採委任制，包括立法局議員亦採委任制，實權薄弱。雖然香港市民曾數次嘗試爭取政治自由，諸如：爭取設立市議會、立法局設立直選議席、要求地方政府自治，乃至於「楊慕琦計劃⁹¹」的政制改革等。但這些行動均在港英政府與倫敦的反對下而告失敗，拒絕一切關於推行代議政治、民主政治改革的請求。其理由有三：

- (一)、香港人口組成以華人為主，但由西方國家進行殖民統治。因此必須確保香港治理局勢之穩固，同時安定社會、避免華人勢力集結。
- (二)、香港是英國在遠東的商業據點，主要目標是維持與中國之間的貿易經濟關係，同時推展在遠東地區的商業利益和文化進步。
- (三)、香港地位特殊，其並不是一個獨立國家，而是原屬中國的一部分。因此香港並沒有要獨立的問題，英國要面對的實際上是與中國的互動關係。

鄧小平堅持要收回香港的決定，拒絕英方所提出的種種條件，就是要為未來中國解決台灣問題做先鋒、為和平統一鋪路。

⁸⁹ 參考自馬嶽，(2010)，前述書。

⁹⁰ 參考自劉曼容，(2009)。《港英政治制度與香港社會變遷》。

⁹¹ 楊慕琦 (Sir Mark Young) 為時任的香港總督，他於 1946 年提出政治改革計畫，希望「香港市民有更多責任去管理自己的事務」。計畫內容主要是希望組建市議會，並且提供一定的席位由民選產生，被視為是具有民主意識的實際改革行動。但後來在英方反對與香港市民意見不一之下，並未能夠成功。



總和以上，英國必須一直維持在香港的直接管制⁹²，把統治權力集中在倫敦，以維護其殖民政府的統治地位，縱使港人有爭取民主之求，但港府表示未有建立代議政治之可能，英方認為港人所提出之相關要求會對其統治造成負面影響，而一律予以否決。明報曾說：「殖民地上，絕無民主；如有民主，非殖民地⁹³」，便是在描述此種現象。

二、加速民主發展時期

1979 年港督麥理浩出訪北京，了解到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決心，港英政府將必須撤出香港，結束其殖民統治。於是麥理浩隨即啟動一系列「去殖民地化⁹⁴」的措施，包括推展代議政治架構、培養親英人才、拉攏政商菁英等等，一如英國撤出殖民地前的一貫作為，讓殖民地可以漸漸實行自治。而這「突然民主」的政策，打破香港百多年來的政治局面，香港的民主化腳步從此正式開展。

港英政府推動的政制變革，首先為代議政治的推行，移植英國體制，使立法機關漸掌權力，進而改變行政專權的局面。從 1982 年區議會設立計劃開始，包括之後的市議會、區域市政局⁹⁵開放部分直選，立法局加入功能界別議席，以及最終目標的立法局議員直選，採循序漸進之模式推動。根據 1984 年的《代議政治綠皮書：代議政治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中所說，這樣的政策規畫是希望能夠「逐步建立一個政治制度，使其權力穩固的立根於香港，有充分權威代表香港人的意見，

⁹² 參考自 George Beer Endacott, (1964). *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Hong Kong 1841-1962*.

⁹³ 出於香港《明報》，1992 年 11 月 20 日。

⁹⁴ 推究英國突然在香港推行民主政制的原因，便是英國在撤出殖民地前所一貫採取的「去殖民地化」策略。這包括了設立代議政治、培養親英人才等等的政策。而英國這種「去殖民地化」策略的主要目的在於兩方面，第一是把政府的權力轉移到香港；第二是要把政治權力從總督與官員手中轉移到立法機關。以期把香港轉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體制，延長英國撤出後對香港的影響，並藉以制衡中國對香港的主權行使（劉曼容，2009）。

⁹⁵ 自此香港三級議會的體制成形，第一級為全港性的立法局、第二級為市政局與區域市政局、第三級為地區性的區議會。

同時更直接的對香港人負責」⁹⁶。



香港民主運動的崛起，除了前述的社會運動風潮、加以政府推動之外，尚與港人的政治意識自覺有著重大相關。影響港人政治覺醒的關鍵因素，是 1980 年代的中英談判與《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中英雙方針對香港前途做出談判，起因於中國強烈表明收回香港主權之意願。談判使得香港的政治局勢面臨巨大轉變，前途的不明朗讓港人產生自覺，公民意識崛起，關注與自身相關的議題，進而組織團體就香港前途和未來政治體制提出意見，並實際參與政治。特別是年輕一輩的那些所謂「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基於對於香港的認同加深，與「港人治港」前景的期望，於是學運領導份子與社會菁英們便由七十年代的社會運動風潮之中，轉而投身至八十年代的非殖民化與民主化運動。

第三節、過渡期的政治變化

九七回歸可說是近代香港政治上具有最重大意義之事件，而政權跨越的更迭，對香港民主運動發展來說，更是一個意義非凡的分水嶺，其對民主運動帶來的影響，值得探討。

首先談及香港回歸前夕，從中英談判到 1997 年主權正式回歸期間，香港的政治、經濟，乃至於整體局勢，都面臨極大的轉變與動盪。在此回歸前的「過渡期⁹⁷」中，除了政府持續推行有目的性的代議政治制度，港人所組織的各種壓力團體也不斷就香港前途議題而努力，塑造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凝聚香港的公民社會

⁹⁶ 出自香港政府，(1984)。《代議政治綠皮書：代議政治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

⁹⁷ 過渡期說法之來由，據劉曼容所說，是依照《中英聯合聲明》內之：「自本聯合聲明生效之日(1985年5月27日)起至1997年6月30日止的過渡時期內...」。亦有另一說為：「從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署之日起，香港進入過渡時期」。詳見錢其琛《關於香港回歸的若干問題》(劉曼容，2009)。

意識。根據司徒華所言，他所積極投入參與的，包括《基本法》的起草、爭取「八八直選」、籌組港同盟和民主黨等等，都是風雨奮鬥之歷程。



1988 年的「八八直選」訴求，可謂港英政府推動代議政治政策的延續，由於市議會與區域市政局選舉逐漸開放，於是當時的香港民主派人士⁹⁸便提出香港立法局選舉引入直選之訴求。這在當時的香港社會引起風波，民主派與保守派展開激辯，政府也組織民意調查機構就直選議題進行公眾意見之分析。雖然最後八八直選的要求在政府受限於《基本法》的表述下被否決，《代議政制今後的發展白皮書》說：「雖然市民對在立法局於三年後加入若干直選議席此項原則，表示支持，但是在實行時間上則有歧見⁹⁹」，但這對香港民主運動來說不啻為一重要進展，也催生了 1991 年立法局直選議席的實現。

另一方面，民促會在此時期主要的目標，除了 1988 年的立法局直選之外，就是爭取在《基本法》中關於香港民主機制的載明，因為他們希望香港民主政治之相關發展進程可被寫入《基本法》中，以確保其施行。1985 年，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根據中英協定的決議而成立，共有 23 名來自香港的起草委員，但只有李柱銘與司徒華兩人屬於民主派。《基本法》草擬過程共歷時數年，這段期間中各派人士就其對於香港未來政制之期望，展開不同的行動，包括動員、爭取支持、辯論等，香港充滿政制討論、展望新時代的氛圍。

六四事件

1989 年「八九民運」與接連的「六四事件」爆發，對香港政局情勢帶來很大

⁹⁸ 當時香港民主的民間勢力以「民促會」為主軸，全名為民主政治促進聯委會(Joint Committee on the Promotion of Democratic Government)，成員包括各種居民團體、參政團體、教育團體、工會與學生組織等 (Sing, 2004)，由司徒華及李柱銘兩位基本法草委領導，為香港民主派前身。

⁹⁹ 出自香港政府，(1988)。《代議政制今後的發展白皮書》。



衝擊，港人亦對回歸產生信心危機，認為必須運用民主做自力救濟行動¹⁰⁰。根據馬嶽所歸納，六四事件對於民主發展的影響有三：

- 一、 北京的八九民運在香港引起風潮，令港人大規模的投入支援國內民主運動，包括了那些傳統親中人士，令香港市民對民主運動的支持力量大為增加。
- 二、 因為六四運動的衝擊，司徒華與香港民主派聯合成立了支聯會¹⁰¹，以金錢和物資直接支援民主運動，如此卻令中共中央政府對香港民主派產生不滿，憂心香港民主的發展或許會影響中國內地政制，對香港的民主運動更加疑忌。
- 三、 八九民運與六四事件的武力鎮壓，使得港人對中共政權產生恐懼，也連帶引發了港人的身份認同意識。如此對於回歸的不安定感，也令港人對於民主化的追求更為強烈，促使英國政府改變政策¹⁰²。

此外亦可觀察，英國政府的態度隨著六四事件爆發而有轉變，從原先不希望與中國的意願有所衝突，轉而堅持推動民主化，變成和中國政府相對抗。其中原因如下：

- 一、 首先為中國政府鎮壓學運民運、侵害人權之行為，引起國際社會反彈。英國政府因此受到各國壓力，質疑香港在回歸中國後的人權是否受到保障，同時國內政壇、議會也出現反對英國靠攏中國的聲音，批判英國一直在香港問題上採軟姿態。此外，香港民主派成員（如李柱銘）出訪歐洲，爭取各國

¹⁰⁰ 參考自 Ming K. Chan, (1994). Decolonization Without Democracy: The Birth of Pluralistic Politics in Hong Kong. in Edward Friedman (eds).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zation: generalizing East Asian experiences, p.163.

¹⁰¹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Hong Kong alliance in support of patriotic democratic movements in China）。

¹⁰² 出自馬嶽，（2010），前述書。

對香港民主的支持，都對英國保守派政府樹立壓力。




二、另一方面，六四事件影響了香港社會，造成香港民心不安、恐共情緒蔓延全港，除了百萬人反對北京武力鎮壓的大遊行外，更曾發動罷工、罷市、罷課等抗爭，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大的政治抗爭活動。港英政府為了穩定港人信心，推動一系列新政與改革計畫，包括「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居英權計畫」、「香港機場核心計畫」等，希望刺激經濟。然而這連串的新政策卻引起中方政府不滿，認為港英政府有意藉此對回歸的協議建立障礙，並且大型建設所需的高額費用融資將會跨越 1997 年，北京認為港英政府此舉有意耗盡香港的儲備。雖然歷經數次調停談判，建設與改革計畫終獲北京同意，但同時也在中英兩國簽署的《關於香港新機場建設及有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¹⁰³》中設下條款，往後多重要決定和合約都必須徵詢中方同意，使得英國發覺對港的管治將會越處於被動。

總和以上因素，整體環境轉變使英國感到與中國合作的代價越來越大，不只牽連國內執政情勢，亦感受來自國際之壓力。對此，司徒華如是說：「英變換政策的原因有二：一是汲取了《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以來的經驗教訓，一味忍讓將不是出路；二是「六四事件」中，港人的政治覺醒和民主訴求都有極大的提高，英不能對此視若無睹，置若罔聞¹⁰⁴」。因此英國決議加速香港民主化的推行，尋求制

¹⁰³ 1991 年 9 月 3 日，英國首相約翰·梅傑（Sir John Major，港譯馬卓安）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李鵬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簽署《關於香港新機場建設及有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Concer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Airport in Hong Kong and Related Questions）。備忘錄主要申明：

1. 香港政府在其管理期間負責建設並在最大程度上完成機場核心計畫，留給未來香港特區政府的儲備不少於 250 億港元；
2. 中國政府支持新機場建設，對需在 1997 年 6 月 30 日以後償還的香港政府的舉債採取積極的態度，並同意中國銀行發揮適當的作用；
3. 中英兩國成立一個由中英聯合聯絡小組領導的機場委員會，而香港政府則成立香港機場管理局和諮詢委員會。

¹⁰⁴ 司徒華，(1997)。我所認識的彭定康。載於《捨命陪君子》



衡北京勢力的方法，同時相關新建設、新政策的出台，也是出自增加香港後續自身的發展能力及主體性，以使回歸後不至於被中國的區域發展政策所吸納，在五十年內便淪為只是中國的一個沿海城市¹⁰⁵之期望。1992年，倫敦指派彭定康出任香港最後一任總督，推動新一波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措施。

彭定康的政治改革

彭定康（Chris Patten）為最後一任的香港總督，於1992年7月上任，同年發表《施政報告》，其中包括他的政改方案，提出行政立法「兩局分家¹⁰⁶」、改革立法局選舉制度，取消所有委任議席、放寬選民資格限制、並新增九個功能組別議席（新九組¹⁰⁷），使所有在職人士都有資格投票，以加快香港的民主步伐。彭利用《基本法》的模糊地帶，嘗試將立法局選舉的民主成分提升至最高，「新九組」就是透過新增的九個功能組別議席，將相關的選民基礎盡量擴大，到達直選的地步。

如此具有民主成分的改革方案引起北京強烈反彈，認為彭有意破壞中英雙方協定，於是開始集結各方力量干涉，採取各種手段以反對政改方案的通過。不過縱使彭定康受到各方政治壓力，但倫敦政府高層仍然支持其決策，使他得以堅持己見，握有籌碼與中國坐上談判桌。

經過為期數月的談判，雖然中英雙方各自做出退讓，但最終還是無法達成共

¹⁰⁵ 參考自蕭全政，（1995）。〈一九九七前夕的香港在兩岸政經關係中的角色〉。載於蕭全政編，《台灣新思維：國民主義》，頁287。

¹⁰⁶ 原本港英政府容許兼任行政局與立法局議員，但彭定康認為，議員既要履行行政局保密原則和集體負責的承擔，又要在立法局層面上，爭取市民支持及醞釀政黨發展，太為困難。部分立法局議員身兼行政局成員，部分政策辯論可能要由立法局的公開辯論，轉成行政局閉門辯論；部分行政局議員，身兼立法局議員，具有相當民意基礎，會在行政局議事時企圖發揮影響力，削弱港督的絕對權力（彭定康，1992）。

¹⁰⁷ 新增九個功能組別為：1. 漁農、礦產、能源及建造界 2. 紡織及製衣界 3. 製造界 4. 進出口界 5. 批發及零售界 6. 酒店及飲食界 7. 運輸及通訊界 8.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業服務界 9. 公共、社會及個人服務界。由於功能界別議席的選舉方法是任何在組別中的在職人士都可投票，如此使得符合資格的選舉人數擴大至一百多萬人，等於是變相的直選。

識，談判宣告破局。彭定康深怕談判延宕未決，因而堅持一個時限，將他的政改方案寫成法案送交立法局表決。最後於 1994 年，彭定康利用關係¹⁰⁸，使得政改方案在立法局民主派與保守派的角力中過關，並在隔年的立法局選舉中實行。民主派透過修改的選舉制度順利取得過半席次，寫下香港民主發展新的一頁。

但選舉結果北京自是無法接受，並決定「另起爐灶」，表明廢止「直通車¹⁰⁹」，並自行籌組新的「臨時立法會」。臨時立法會在 1996 年成立，民主派的議員全部「下車」，由親中人士填補空缺。此臨時立法會負責處理香港特區成立的相關法律，而九七回歸之後臨時立法會便成為香港正式的立法機關。

香港回歸前夕，短短十多年的過渡期中，整體政治局勢丕變，面對著回歸中國的不安定性，與六四事件的衝擊，無論政府或民間均著手研擬新政策或計畫，以因應新時局新環境到來。香港的民主化在此時有著突破性的發展，隨著代議政治逐漸啟動與政治自由度提高，許多政治團體應運而生，參與各種議政、論壇、報章專欄等，而請願、示威遊行、社會衝突之頻率也顯著提升¹¹⁰，以參政為主要目的的政黨也出現了，可說是個各家爭鳴的政治與社會環境。學者關信基針對過渡期香港政治社會環境轉化，做出一個統整看法：

- 一、 社會經濟的持續現代化，伴隨而來的是更複雜、更大規模的發展問題，例如社會經濟利益的多元會和社會、經濟關係的複雜化。
- 二、 香港的群眾政治覺醒了，知道幸福的生活得依賴政府的服務，他們接受了從權利意識，學會了向政府提出要求。他們當中的積極份子自發的組織

¹⁰⁸ 彭定康利用英商怡和代表鮑磊變節，在立法會表決中取得關鍵票的支持，促使政改方案過關（Jonathan Dimbleby, 1997）。

¹⁰⁹ 指北京原本承諾 1995 年香港立法局選出之議員可過渡至九七回歸後，而無須變動。

¹¹⁰ 參考自葉國豪，(2005)。《政治機會結構與社會運動：香港解殖後的轉變》文中提及之相關描述。轉引自 Siu-kai Lau, and Po-san Wan, (2000)."Social Conflict: 1987-1995".



議政團體或透過各類運動向政府施壓。

三、政權逐漸開放，使之不得不面對日益複雜的社會、進一步現代化的問題，再加上期望升級的群眾、擴大收編社會精英的策略到達極限、九七主權移交的衝擊等等因素，終於決定引進有限的代議政制，其結果一方面使尚未被收編的精英有更多機會扮演積極角色，也創造了群眾參與政治的正規渠道。

四、中國政府基於戰略上的考慮，原則上贊同殖民政權的開放方向，並且把代議政制的基本原則（選舉）採納於《基本法》之中，無疑鞏固了群眾政治的制度基礎¹¹¹。

最後，以司徒華對於過渡期香港民主運動發展的看法，來做一個總結，他說：

在回歸前，我提出的口號，是「不撤退，反倒退」。「不撤退」是：一、不離開香港移民，二、是堅持民主運動。「反倒退」是：反對自由、人權、法治的倒退。我估計，中國不走向民主化，香港的民主難有寸進。即使香港的民主沒有進展，也要提防和反對在自由、人權、法治上的倒退，在不倒退中，等待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趕上來，一起前進，在反倒退中去壯大公民力量¹¹²。

第四節、九七回歸後的民主發展與爭議

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正式移交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及《香港基本法》而成立，由特別行政區政府管理，以行政長官為首長，結束155年的英國殖民統治。根據中英協定與《基本法》之規範，香港回歸後實

¹¹¹ 出自關信基，(1998)。〈香港政治社會的形成〉。載於劉青峰等編，《轉化中的香港：身分與秩序的再尋求》。

¹¹² 司徒華於2006年9月15日，在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以英文演講的講稿。

行高度自治，維持多方面的獨立地位，包括獨立的司法系統、獨立的財政與稅制等，在貿易上亦維持關稅自主，可與世界各國進行貿易，並繼續以獨立身份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等等，是為「一國兩制¹¹³」，只有國防及外交事務由北京中央人民政府負責。

而此「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事實上是為了保持香港經濟的持續發展，以及維持港人信心而訂立，關信基說：「『一國兩制』其實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的延續¹¹⁴」。中國政府認為香港經由英國的長期統治，已然成為貿易興盛且繁榮的國際港口，對中國的實質利益需求有所幫助。藉由維持香港資本主義市場運作，同時保留此中國的對外窗口，達到吸納資金、外匯與技術的目的，可使中國的改革開放更快取得成果，同時也為日後台灣問題的解決做出示範¹¹⁵。

北京不希望任何內地社會主義的邏輯在回歸後干預香港資本主義的成果，因此便有著「一國兩制」政策的考量與運作¹¹⁶。我們可以說，回歸後的香港政制在北京安排下，以維持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安撫香港民心，加上穩定政局為導向，在為中央獲取利益之前提出發，香港得以擁有比中國大陸更高的政治自由。不過亦可觀察到，雖然北京做出「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但在《基本法》的限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實際上被踩了剎車¹¹⁷，進入停滯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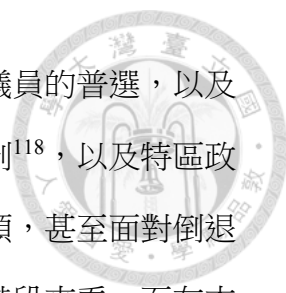
¹¹³ 學者翁松燃認為「一國兩制」的涵義，是：「『一個單一制國家依據自己憲法、法律的明文規定』容許其一個或多個部份地區實行基本上不同於國家一般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但這些地區政府是這個國家的地方性政府，除非依法由中央例外授權，不能行使國家的主權。」

¹¹⁴ Hsin-Chi Kuan, (1999). Is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ormula Working?". In Gung-Wu Wang and John Wong (eds.), *Hong Kong in China: The Challenges of Transition*.

¹¹⁵ 參考自丘偉國，(2007)。前述書。

¹¹⁶ 參考自 Yash Ghai, (1997). *Hong Kong's New Constitutional Order: The Resumption of Chinese Sovereignty and the Basic Law*.

¹¹⁷ 如前所說，北京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前提是香港不能破壞此「一個國家」的政治底線，任何有礙國家社會穩定、妨礙中港兩地經濟運轉、阻礙關乎統一的事務的行動，都不是北京所想要見到的，民主的發展即是一例。



香港回歸後，民主運動的主要目標在於爭取特首與立法會議員的普選，以及對於人權、法治等權利之訴求。但囿於《基本法》與北京的限制¹¹⁸，以及特區政府「推倒」彭定康政改的成果，香港民主運動在回歸後陷入瓶頸，甚至面對倒退之風險。根據馬嶽所述，回歸後的香港民主運動，可分成幾個階段來看，而在本文後續章節也嘗試將司徒華思緒與足跡放入此框架中探討：

- 一、 1997 至 2003 年：民主運動面臨瓶頸、停滯或是倒退的階段。
- 二、 2003 至 2005 年：民主運動重新開始，集結力量的階段。
- 三、 2005 年至今：民主運動再次陷入僵持、醞釀突破的階段。

一、第一階段 1997 至 2003 年：

如前提及，香港在回歸後基本上維持了高度自治，北京在諸如人權、法治等許多方面，都鮮少介入特區政府的施政。但在港人希冀的民主政制改革上，《基本法》可說限制了所有可能的路線，縱使不時有民主派議員提出希望透過修改《基本法》而推行帶有民主精神的政策改革，但此時的《基本法》是幾乎無法更動的，因此提案往往不了了之，在社會上也難以引起共鳴。另一方面，香港在此時蒙受金融風暴的襲擊，造成經濟衰退與失業危機，連帶令港人對於政治的關懷度有所下降。

回歸後彭定康政改成果被推倒，幾項政策與制度的重新修改，使得整體局勢更不利於民主發展，如以下說明：

¹¹⁸ 根據凌鋒（林保華）所說，《基本法》的限制表現在：

一、立法會六十個議席中，只能有三十席是直選議席，也就是不超過半數，以後如何發展，要由特區政府決定。特區政府由保守的董建華控制，民主派議員在議會中要達到半數議席非常困難，因此不但全面直選可能是幻想，連再擴大直選議席恐怕也相當困難。

二、提交立法會的任何議案，必須由會內的兩個小組先通過，其中一個小組是功能組別小組，由保守的工商界所把持，任何有利於民主發展和草根階層利益的動議幾乎就無法通過（凌鋒，2003）。



(一) 首先，立法會地區直選的選舉制度改採「比例代表制」¹¹⁹，加上功能界別選舉制度與選舉委員會制度也都有所改變：功能界別議席在席次、界別上有所調整，選民資格和人數也限縮，變成對特區政府與親中黨派有利，商界或工業界擁有資本與人脈，自然在功能界別選舉中更佔有優勢。因此北京刻意拉攏香港工商界，加以親中資本在回歸後大量來港投資，讓民主派只剩下法律界、教育界等席次得以抗衡。另一方面，選舉委員會的制度修正自彭定康政改方案，原先由 100 個直選區議員組成的委員中選出立法會的 10 個議席，1997 年改變成由 800 名工商界代表為主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出。而這 800 名代表實與功能界別有高度相關，工商界與親中人士佔有重要角色，建制派與親中黨團可以透過互相支持協調，而獲得選舉委員會幾乎全部的席次。

組織成份	組成人數	議席分配
工商金融界	200	工業一(12)、飲食界(11)、香港僱主聯合會(11)、金融服務界(12)、工業二(12)、酒店界(11)、中國企業協會、進出口界(12)、商界一(12)、金融界(12)、地產及建造界(12)、航運交通界(12)、商界二(12)、保險界(12)、紡織及製衣界(12)、批發及零售界(12)、旅遊界(12)
專業界	200	會計界(20)、中醫界(20)、教育界(20)、高等教育界(20)、工程界(20)、醫學界(20)、法律界(20)、資訊科技界(20)、衛生服務界(20)、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20)
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界	200	漁農界(40)、勞工界(40)、社工界(40)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40)、宗教界(40)
原政界(200 席)	200	全國人大代表(36)、市區區議會(21)、立法會議員(60)、全國政協代表(41)、新界區議會(21)、鄉議局(21)

¹¹⁹ 比例代表制的選舉制度令立法會中黨派林立，對於民主派不利，難以在直選議席上取得多數，形成一個被特區政府與親中黨派社團夾擊的情勢，並且可削弱香港立法機關威脅管治權威的可能。

圖 1：1997 年選舉委員會 800 名委員的分配¹²⁰



選舉相關制度的改變使得民主派不再能夠佔有多數，甚至議席大為減少，由親中陣營得勢。於是立法會轉為向特區政府傾斜，變相削弱了立法會的政治影響力，與民意對政府的影響和監察¹²¹，對於民主改革的訴求也無力實行。回歸後的立法會選舉方式如下：

(一)、20 名直選議員由五個地方選區選出，採比例代表制。
(二)、10 名議員經選舉委員會選出。
(三)、30 名議員由功能界別團體選出。

表 2：回歸後的香港立法會選舉方式

(二) 區議員恢復由特區政府委任之制度，全香港三百多萬選民選出四百多名區議員，而行政長官一人卻可委任超過一百名區議員（親政府人士），佔區議會總議席五分之一，具有不公之議。而公眾對行政長官委任區議員之標準亦無從得知，中國政府及香港市民的互信，或許跌至低點¹²²。

(三) 1999 年行政長官董建華將擁有獨立財政與土地的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解散，由政府收回市政財政預算權及市政用地的使用權，此即俗稱的「殺局」¹²³。兩個市政局議員原是由直選產生，市政局制度可以說是港英政府推動民主的第一步，民主派也在其中佔有多個議席。但由於兩個市政局的立法角色會對行政領導為主的特區政府造成限制，因此董建華決定「殺局」。

¹²⁰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¹²¹ 參考自馬嶽，(2010)。前述書。

¹²² 參考自龍緯汶，(2010)。《香港回歸後的民主倒退》。

¹²³ 參考自丘偉國，(2007)。前述書。

失去兩個市政局的議員資源，對民主派來說又是一重大打擊。



綜合以上所述，在政治空間緊縮、整體環境不利¹²⁴，以及民主派內部缺乏方向之下，逐漸產生分裂與衝突之危機，民主黨從原先的國會第一大黨退居第三大黨，優勢不再，這對於香港民主運動的發展，無疑雪上加霜。比例代表制的提名制度造成民主派為了搶奪提名席次而分化，難以整合成統一力量；加以民主運動的處處受限，導致民主派內部對於「民主派/民主運動」未來該如何發展的分歧與爭議產生。於是派系鬥爭越發嚴重，演變成實質的分裂局面，民主運動也隨之趨向分裂。基於以上分析，筆者認為香港回歸初期的政制發展走向，是政黨政治發展弱化、議會的角色重要性也降低。對於民主運動來說，是面對停滯與陷入困局之狀態，民主派本身亦同。


二、第二階段 2003 至 2005 年：

2003 年可說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重生年，出現曙光的原因在於面對金融危機與經濟不振之風暴，港府的政策又接連產生錯誤，包括醜聞頻傳、急躁決策等，導致港人抗議聲音四起，政府民調持續下滑。在未見政府願意改善與董建華仍然連任特首之下，港人的憤怒持續累積，對於政制改革的訴求也再次興起。於是 2003 年 2 月 SARS 疫情的爆發以及《基本法》23 條的立法，便成為引爆港人憤怒、50 萬人「七一遊行」要求政治民主改革的導火線。

SARS「沙士」疫情與 23 條立法

2003 年 2 月，香港爆發了非典型肺炎 SARS，共有 1700 多人受感染、近 300 人喪生，對香港整體環境與人民信心造成很大打擊。根據文獻顯示，造成如此嚴重疫情之原因，主要歸咎於相關單位的延遲通報與隱瞞疫情，加上處理上決策錯

¹²⁴ 其他包括特區政府的經濟為主政策取向、相關法令限制了社團與社會運動發展等，都對民主發展塑造了不利的環境。



誤，才導致 SARS 快速擴散，香港成為世界僅次於中國的第二嚴重災區。SARS 疫情對香港經濟與民生造成嚴重打擊，觀光旅客人數急降，市民對政府的不滿亦累積到高峰。疫情一直到 2003 年 6 月方受控制，但董建華政府的心力卻全部放在推動《基本法》23 條¹²⁵的立法通過，因此被批為罔顧民意、不知變通。在法案本身之爭議上，23 條草案亦被認為過於嚴苛，其中誇大「國家安全」之定義，對基本人權和自由有侵害之虞，同時也限制新聞報導之自由。儘管港人與社會菁英均群起反對，但董政府卻視而不見，強硬「不容商量」的態度造成港人更加不滿，終於引爆了回歸後最激烈的政治抗爭運動。

七一遊行

事實上自香港回歸起，每年的 7 月 1 日民主派各政團都會聯合舉辦遊行，以表示對民主追求的堅持。但 2003 年港人在接連遭受打擊與滿腔憤怒下，七一遊行便被賦予了更深的意義，港人要對特區政府表達他們的不滿情緒，而對民主派而言則是一個重新振作的力量與契機。2003 年 7 月 1 日，超過 50 萬的香港民眾由民主陣營的號召之下上街遊行，高呼「反對廿三、還政於民」口號。七一遊行對香港政局與社會帶來很大衝擊，也吸引國際社會的關注，中央了解到挑戰目前香港主流民意並非上策，最後在北京的讓步下，決議先將 23 條立法的程序撤回，七一遊行的影響與 23 條立法的爭議方告落幕。

2003 年的七一遊行可說是香港回歸後最重大的社會事件、同時也是政治上具

¹²⁵ 《基本法》23 條是一條有關香港境內國家安全的憲法條文。其內容全文為：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而就此條文立法的草案中，有許多內容引起香港市民憂慮，認為對於他們的人身、言論自由等，都有所侵害。包括：警察無需證據和法庭手令即可入屋搜查、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均屬違法，知情不報者可被檢控、「煽動」「處理煽動」「管有煽動」「知情不報」之類罪行，可能會對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造成潛在威脅等。

有最大影響力的事件之一。香港政治評論人陳雲說：



七一事件可說是香港政局的分水嶺，原本政府可以用欽點代言人的方式而主導調配利益的勢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 by selection），要變成由政府與反對派互動和衝突而透過選舉議員而達致的勢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 by election）。轉變的原因，是港人不再信任中共在香港的代理人能像往日英國在香港的代理人一樣，秉公辦事、平衡參與¹²⁶。

換言之，七一遊行之效應實質的使香港政治與民主開展新的局面，說明如下：

- 一、間接導致董建華的下台。在七一遊行前後，由於董政府接連政策失敗，其民意掉到低點。香港社會對於董的不滿高漲，造成他在之後第二年就請辭下台，事實上這可視為是北京的權力布局操作。
- 二、香港市民對於爭取民主與普選的意識大大提高，港人對政治參與的心態也轉趨積極。七一遊行使得港人了解到只要挺身參與和爭取，就有機會得到更多的政治空間，促成政策改變。
- 三、爭取行政長官、立法會「雙普選」成為香港民主運動的主要目標。七一遊行為香港民主派注入新生命，並在隔年區議會選舉中重新得勢。他們利用時機，提出雙普選的訴求，令特區政府、甚至是北京，必須就這個議題做出回應，引起各政治勢力的角力，以及港人對香港民主發展更加明確的認知。
- 四、最後是令北京更加重視香港管制問題，深怕香港民主意識的覺醒危害其一國兩制之政策佈局，於是新成立港澳事務協調小組，協助特區政府，加強對於香港的管制。

¹²⁶ 出自陳雲，(2007)。香港人真的需要民主嗎？《民主戲一場－香港文化與現實政治》。



2004年，人大常委決議，否決民主派對於2007年香港行政長官與2008年立法會全面普選的要求，並且規定2008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分區直選和功能界別議席的比例維持不變¹²⁷。可以觀察到即使在主流民意支持下，北京仍然強勢否決民主派的直選訴求，宣示北京捍衛其對於香港政治決策權掌控之決心，害怕民主派得勢後會對香港穩定統治造成威脅。這對香港民主運動來說無疑為重大打擊，香港民主在此時雖然重新亮起希望，但囿於北京的強硬管制態度，仍然面對漫漫長路。

三、第三階段 2005 至今：

2005年，董建華以身體健康為由請辭香港特首，由曾蔭權接任，曾的政治作風不同於董，較為圓潤，加以港人願意給曾蔭權嘗試機會，由是開啟特區政府新的治理局面。曾蔭權決定在普選問題上採取主動介入，表示願意循序漸進的推動民主，首先針對2007/2008年行政長官與立法會選舉的改革措施，提出《政治發展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¹²⁸》，但曾同時也劃清底線，即民主派所希望的「雙普選」將不會在這年發生。泛民主派認為此政改方案表面看似增加民主成分，但本質上卻是拖延了民主的步伐¹²⁹，並且缺乏普選時間表與路線圖，於是他們再度發起遊行

¹²⁷ 參考自馬嶽，(2010)。前述書


¹²⁸ 《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及二零零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 — 建議方案》，簡稱為「五號政改方案」或「五號方案」。主要內容為：
行政長官選舉

1. 特首選舉委員會人數由 800 人增至 1600 人。
2. 選舉委員會第一界別（工商、金融界）、第二界別（專業界）、第三界別（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等）各由 200 人增至 300 人；第四界別則大幅增加區議員人數，與原有的立法會議員、鄉議局代表、港區人大及政協等，合共 700 人。
3. 提名最低門檻的比例維持在選舉委員數目的 1/8，即加 200 人。
4. 維持行政長官不屬任何政黨的規定。

立法會選舉

1. 議席數目由 60 席增至 70 席。
2. 分區直選議席由 30 席增至 35 席。
3. 功能界別議席由 30 席增至 35 席，當中的「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由 1 席增至 6 席。

¹²⁹ 後文詳述，嘗試分析司徒華之看法。



與抗爭，向特區政府施壓，反制此「五號方案」。最後在泛民主派聯合議員投反對票之下，曾蔭權的政改方案未能過關，2007年與2008年的選舉辦法照舊。事實上，「五號方案」的提出，在一方面或許也表示了北京願意就香港普選議題做探討，在民主派的堅持下，促成了未來或許真正得以實行普選的契機。

第三屆行政長官選舉

時間來到2007年，即爭議激烈的香港特首選舉。雖然泛民主派對於直選的訴求遭到人大釋法否決，但間接促使了民主派思考民主運動新的可能性，也就是嘗試投入行政長官的參選，希望可以藉此展現民主派治理香港的願景與能力。另一方面，由於民主黨內部的分裂與路線歧異，黨內溫和派認為或許採取新路線、配合政府體制，而非激烈抗爭之方式，對黨的團結與發展較為有利¹³⁰。

泛民兩大主力陣營民主黨及公民黨達成共識，在積極運作下終於通過選舉委員會的提名門檻¹³¹，推出公民黨的梁家傑參選，成為香港史上首次有競爭對手的特首選舉。由於當時選舉委員會仍然是親中派佔有多數，因此曾蔭權如預期的大勝梁家傑，但雙方候選人採取普選的方式競選，包括政見說明、拜票、出席活動論壇、甚至電視政策辯論等，引起香港公民普遍關注，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以全票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普選問題的決定》，可說對普選之爭取具有重大意義。按照有關決定，2012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及立法會選舉，在不實行普選的前提下，可以作出符合循序漸進原則的適當修改。文件最後說明了香港可以於2017年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另外可以於2020年普選立法會，為落實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訂出明確的時間表，香港民主政制

¹³⁰ 參考自鄒麗泳，《「一國兩制」下香港政黨發展—民主黨個案研究》。

¹³¹ 《基本法》附件一規定行政長官候選人必須得到多於100名選舉委員會的委員提名。

發展邁出了最重要的一步¹³²。



在此之後，香港民主發展的討論與行動主要集中在幾個面向：

- 一、行政長官選舉的提名程序與條件。
- 二、立法會功能界別選舉的改革問題。
- 三、普選的時間表。
- 四、香港與北京政府之間的關係。

曾蔭權就職其第二任期後不久即發表《政制發展綠皮書》，再次提出關於特首與立法會選舉的政改方案。其中雖然仍不包含 2012 年的普選計畫，但根據其中的描述，對於 2017 普選的期望與要求，可說有著循序漸進的希望。而這幾年中，泛民主派歷經意見不合、分裂、再度統合，甚至在 2008 年立法會選舉中亦面臨失去席次之危機，但總體而言仍是為了爭取普選努力。這幾年歷經許多風波，包括：2009 年的「五區總辭¹³³」、2010 年對政改方案提出修正方案之爭議、2012 年再次參與特首選舉，以及 2013 年「真普選聯盟¹³⁴」及「佔領中環」行動等。

在北京仍然擔憂過快的民主化可能對行政實權造成威脅下，香港民主政制之發展與改革依然持續受限。2012 年的特首選舉，同樣採取仿效普選的方式進行，最後梁振英當選成為新任香港特首。唯梁振英上台後爭議不斷、醜聞頻傳，加以其未對普選改革做出相關承諾，加上其與民主派的關係一直不佳，因此多次爆發

¹³² 資料來源自維基百科。但香港民主派認為北京並沒有承諾是否會在參選資格上設限，擔心中央會在選舉委員會設置門檻，令民主派候選人無法參加直選。

¹³³ 「五區總辭」是指在五個香港立法會選區中，每區均有一位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辭職，產生五個空缺席位，然後按照香港《立法會條例》必須進行補選，將補選當作為「變相公投」讓香港所有選民投票。假如五位泛民主派參加補選的議員得票總數多過對手，即代表提出的普選議題有相當的民意基礎，希望藉此行動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造成壓力。

¹³⁴ 真普選聯盟 (Alliance for True Democracy) 於 2013 年 3 月 21 日由 12 個香港泛民主派政黨及團體聯合成立，目標為推動香港行政長官和香港立法會盡快實現雙普選 (即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及香港立法會選舉)，召集人為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系講座教授鄭宇碩。

反梁遊行。2013 年 3 月泛民主派成立「真普選聯盟」，以推動香港行政長官和香港立法會盡快實現雙普選為目標。



綜觀回歸後的香港民主發展，縱使網綁於北京不願全面發展民主與普選之態度，香港泛民主派有如在迷霧中前行。但至少在這十多年來的努力，包括反 23 條立法、政改方案、2007 年與 2012 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各種訴求的遊行抗爭活動等，爭取來了香港人民的公民意識覺醒。如同司徒華所說：

回歸後，香港的公民力量是壯大了的。正如上述，反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和《政制改革方案》，就是兩次反倒退的勝利，公民力量得到壯大。所以，我把回歸前的口號「不撤退，反倒退」，改為「反倒退，發展公民力量」。以不斷壯大的公民力量，為迎接民主香港和民主中國作好準備¹³⁵。

整體而言，無論是在港英統治初期或是回歸後由特區政府治理，香港的民主運動都處於備受限制之狀態，而其原由都可以歸納為「避免民主的發展影響到政府集權的統治模式」。但港人一直都持續著對於民主與代議政制的追尋，今日香港的民主運動仍然進行著，泛民主派負起向北京爭取香港民主的重擔，放眼北京承諾的 2017 年行政長官普選，除了監督普選是否落實外，亦期望能夠突破目前香港政制由於特區政府舉措保守、各黨派與利益團體互相杯葛所造成的困局。

第五節、菁英理論與香港民主的發展

在開始第三章的探討之前，筆者嘗試將本文中心思想與首章所提及之菁英理

¹³⁵ 出自司徒華，(2006)。香港回歸後九年多以來的變化(2006 年 9 月 15 日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演講講稿)，《弦斷誰聽》。

論作一整合，以強化本文的理論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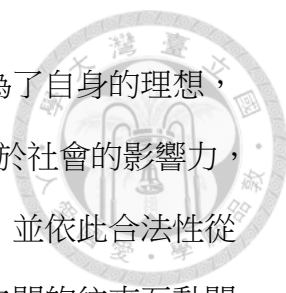
在香港的民主化過程中，也可以看出類似的菁英—公眾、菁英—社會之間的關係，在香港特殊的歷史背景，包括被殖民統治、高度經濟發展導向、以及回歸後一國兩制的政治環境下，漸漸形成具有香港特色的菁英理論，我們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看：

一、行政吸納政治政策

港英政府所採用的「行政吸納政治」政策，即是將各專業社會菁英委任加入行政部門或立法部門機構中，透過拉攏香港地方菁英人士，吸納到一個由行政主導的決策機關之中，建立一個以菁英共識為基礎的政治體之過程。在港英政府統治的早期，主要目標是拉攏華人商界菁英，藉由他們在社會上的威望，協助政府管制華人、仲裁華人之間的紛爭等，以穩固殖民政權的統治。之後港英政府吸納菁英的範圍越加廣泛，這是一個成功的政策，有效的讓港英政府得以收買人心，達成對華人的穩定統治；而後吸納範圍的擴大，使得殖民政府得以擴大其影響力，建立「菁英共識」政治。這表現在許多方面，例如立法局的功能界別議席，即是希望吸納社會菁英進入治理圈，利用菁英在社會上突出的地位與能力，擴大他們對於公眾社會的影響力，達成政府統治目標的一個典型例子。

二、社會菁英的角色

在香港追求民主運動的過程中，社會菁英所佔有地位十分重要。港英政府首先自上而下的推動民主，引進代議政治，帶起了港人的公民意識。那些學運社運的領導份子，便紛紛起而投身於爭取民主、人權與法治的行動當中。有些人組織團體、舉辦活動、發起遊行，鼓吹與統合市民大眾為了民主目標而努力；有些人創辦公司商會，借由經濟的力量來制衡政府決策；甚至有些人進而創立政黨，像



是民主黨等，進入政府機構，實際的參與政治。這些社會菁英為了自身的理想，挺身而出帶領整體市民的民意和政府斡旋，而政府也鑒於菁英對於社會的影響力，一直以來都嘗試拉攏各界菁英，希望藉此取得統治權力合法性，並依此合法性從意識上消除潛伏於社會政治中的反動力量¹³⁶。於是菁英與政府之間的往來互動關係往往形成牽連社會局勢變動的關鍵因素。

三、 民主派與親中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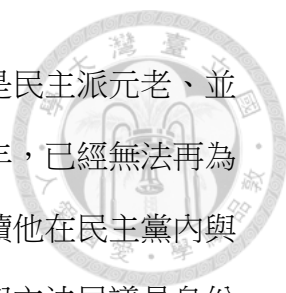
香港回歸前夕，面對即將而來的政治局面轉變，港人菁英也面臨極大壓力。首先是港英政府推動民主化，而使得港人公民意識覺醒，再加上六四事件的衝擊，使得許多社會菁英都投身於民主運動之中。但在中英協定簽署之後，北京勢力越來越靠近香港，為了將來進入香港的統治，加速其佈局，於是開始拉攏香港的菁英，同時引入中方政商人士，以在港培植親中勢力。北京以實際的經濟誘因，加以香港回歸的既定事實，提出若非「親中」即屬「親英」的二分法，及「支持民主即是破壞國家主權」等邏輯，迫使香港菁英必須在中英雙方之間選邊站¹³⁷。於是在回歸後，香港政局演變為兩派菁英之間的角力抗衡，民主派挾港英推行民主化之後主流爭取民主政治的民意，與親中政商界菁英和政府所代表的利益與價值對抗，漸形成今日民主發展的樣貌。

四、 司徒華與其在香港社會的角色

司徒華無疑為香港社會菁英之一，而本文即是探討他對於香港民主運動的影響，於是筆者希望可以藉由菁英理論，而解釋其在這艱困歷史進程中所扮演之角色。司徒華早年便投身學運與社運，之後創立了香港教協會與支聯會，並且擔任主席，他更曾擔任近 20 年的立法局議員，一生努力於香港的民主，而他的個人特

¹³⁶ 參考自丘偉國，(2007)。前述書。

¹³⁷ 參考自鄭宇碩，(1995)。〈香港的立法局選舉-九一選舉回顧與九五選舉佈署〉。載於鄭宇碩、雷競璇主編，《香港政治與選舉》。



質與政治意識也對社會大眾造成影響。在香港，他被港人視為是民主派元老、並且是最早挺身而出為香港爭取民主的人之一。即使到了他的晚年，已經無法再為奮鬥民主而四處奔波，但仍持續以精神領袖的形式付出著，延續他在民主黨內與社會上的影響力。作為一位具有社運領導人、壓力團體領袖、與立法局議員身份的社會菁英，他以許多實際行動來發揮其影響力，諸如：出訪國外進行演講與政治遊說、發起群眾集會遊行、每年舉辦維園紀念燭光晚會、向商界募款、在立法局中的質詢與發言等，這些行動都是在藉助其身為社會中堅領導份子的身份，進而達成其所冀望的目標。另一方面，司徒華個人的政治思想、理念與觀點，也會經由這些行動而傳播，感染關注政治議題的民眾，像是他對於六四事件的看法與期望平反的心願等，間接形塑了港人的身份議題與中國觀。

第三章

司徒華的政治信念與意識



前言

司徒華 (Szeto Wah)，人稱華叔，是近代香港政治與社會運動的指標性人物。本文以下根據既有文獻整理司徒華個人政治意識形成之路徑，以及其對民主運動的投入，並且探究其個人的思緒，包括他的行動與觀念在香港社會所造成的影響，最後分析其對香港與中國未來發展之期望等。由於無法對司徒華本人進行直接訪談，故本文所仰賴的文獻，主要參酌司徒華所著作之回憶錄、文章評論、報章投書等，與其在教協會、支聯會與立法會中的發言紀錄，再加以他人對司徒華的評論，嘗試歸納司徒華的心路歷程。司徒華生後，各界推崇其在建設民主道路上鞠躬盡瘁，耗費畢生心血與精神，其中備有大量文獻，並非本文所盡能涵蓋。準此，本文以下分三個章節來敘寫，大抵依照時間序列的安排，藉以掌握前後發展完整的理路。

若謂司徒華一生走來豐富且精彩，論者或均可同意，其經歷大時代之變遷，參與驚濤駭浪的歷史事件及各種社會運動與辯論之風雨。他始終表現出熱愛香港，因為各界感受到他竭盡一生努力，堅持信念無私的付出與貢獻，以至於他能影響整個香港社會主流觀點的建立，展現人生價值，精神與品格長存人心。司徒華對於香港的影響力與民主運動的重要性，由其過世後各界之反應可見一斑。司徒華過世消息很快傳開世界各地，海內外民主人權人士對司徒華的悼念紛湧而來。在香港，不僅新聞媒體連篇累牘報導，詳盡介紹司徒華的生平和各界哀悼情況，社會上，尤其是香港的民主人權團體，更舉辦了眾多的悼念和相關活動，大量民眾

參與其中送華叔最後一程¹³⁸，表達對華叔的懷念，包括政府官員、甚至親中派成員，也不例外表示弔唁之意。



劉青在其對華叔之回憶文章《司徒華價值—民主精髓》中，曾如此論及司徒華對於目前整個香港政治大環境、公民意識與民主發展方面之影響：

香港現在可以說是中國爭取民主人權的前鋒和基地，因為香港人不單單與中共力圖收縮擠壓香港民主人權的空間抗爭，也是關注支持幫助大陸民眾爭取民主維護人權的堅定力量，這是世界各國和地區尤其台灣不能相比的。每當大陸出現嚴重侵犯迫害人權的事件，香港民主人權人士一定採取包括遊行等行動，對受迫害者表達同情支持並抗議譴責中共暴行，許多時候還從物質等方面予大陸人士幫助。僅是平反六四一事情上香港的作用就可以略窺一斑，在六四屠殺已經二十一年後的去年，香港還有十五萬人出席維園的燭光悼念晚會，同時敦促中共正視六四問題和譴責拖延淡化六四的意圖，這份數十年數十萬人矢志不移的堅持，令所有聽聞香港壯舉的有良心者感動莫名。而香港上述的所有爭取民主維護人權行動，無不與司徒華的帶領和直接組織操作密切相關。任何地區國度對抗專制暴虐爭取民主人權的運動，都必須有不懼險惡敢於承擔責任的草根領袖，司徒華正是香港展現這一民主精髓的主要領袖之一¹³⁹。

以下節錄司徒華過世後，部分重要相關人士對他的評價：

香港總督彭定康

「從來沒有人稱他是英國帝國的工具，他是一個反殖

¹³⁸ 引自劉青，(2011)，《司徒華價值—民主精髓》。

¹³⁹ 同上。

	民地主義者，堅定、強硬及非常聰明的中國愛國主義者 ¹⁴⁰ 。」
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	「我和華叔合作多年，大家是最親密戰友的時候，就是起草《基本法》的時候。他是真正盡心盡力為本港民主前途的人。」
香港特首曾蔭權	「司徒華一生熱愛中華、熱愛香港，致力推動民主發展。他為人剛直不阿，一直堅持理想，從不言休。崢嶸風骨，深受各界尊敬。」
前學運領袖王丹	「華叔一直是我個人，和我們民主運動的精神導師，對我來說，他代表了很多很多東西，我覺得華叔最偉大的地方，就是在他去世之前，把他的精神傳承下來了。」

表 3：各界對司徒華生前之評價¹⁴¹

本章首先談及司徒華的早年時期，包括成長背景、求學經驗等，嘗試了解他投身社會運動的契機與行動過程，以及從參與社運中所獲得之成長與體會，另外亦包括 80 年代香港充滿民族主義色彩的社會運動與司徒華之關聯。

第一節、司徒華早年生活與背景

1931 年 2 月司徒華生於香港，祖籍廣東開平。根據其回憶錄提及，司徒氏族譜記載其本名為「司徒衛華」，是由於他出生時正值日本侵華時期之故。他說：「一九三一年，日本軍國主義侵占我東北三省，悲憤的《松花江上》響遍海內外。這

¹⁴⁰ 出自陳慧兒、林祺娟、潘麗瓊，(2011)。《功成必有你在：華叔紀念集》，228 頁。

¹⁴¹ 出自《頭條日報》專題，(2011)。各界對司徒華的評價。



一年，我在香港出生¹⁴²」。幼時家境清貧，父親在造船廠任職工人，共有七個兄弟姐妹，而他排行第三。性格孤僻內向，不善交際，喜歡閱讀以及自己思考，據其表示，這樣的性格讓他自幼培養出自主思考的能力、刺激思路，對往後生涯有很大幫助。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軍隊佔領香港，戰爭威脅籠罩、社會動盪不安。司徒華跟隨家人回到故鄉廣東開平避難，是年司徒華11歲，也是他第一次離開香港，強迫接受逃難生活。據其回憶錄表示，在抗戰時期曾目睹許多日軍侵華之殘酷暴行，包括屠殺中國軍民與戰爭之互相殘殺，甚至中國人必須卑躬屈膝的向日軍行禮，否則引來拳打腳踢或者殺害¹⁴³。如此民族屈辱之情事加以諸多不人道之景象，引起司徒華憤慨之情，也是他民族主義萌芽的契機。他說：「我們盡見日軍之殘暴，也見到路邊堆滿凍死、餓死的同胞，我年紀雖小，但已有憤慨之情¹⁴⁴」，在年幼司徒華的心中，產生了愛國思想，他開始關注報章上關於國家的議題與事件，也激起了他日後投身愛國運動的想法。「這些耳聞目睹的抗戰事蹟，給我很大刺激。我渴望國家富強，不會再被侵略，人民不再被異族欺壓¹⁴⁵」。

雖然司徒華幼時家貧、人口眾多，而其就學年齡又適逢抗戰，但其父親仍然堅持孩子的教育狀況，環境艱難亦照常供孩子上學。而日後父親失業時，仍幸得親戚救濟，司徒華與兄弟姐妹們即使在戰時也未曾停學。據司徒華自己表示，他深受其父親影響，在性格上有幾分相像，筆者推測，或許華叔是指那份堅毅與執著，獨立的性格，再加上對人處事之態度。

司徒華母親早逝，父親雖然窮困，但堅持獨力擔起照顧家人的責任，讓司徒

¹⁴²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序。

¹⁴³ 同上，17頁。

¹⁴⁴ 同上，18頁。

¹⁴⁵ 同上，23頁。



華與其兄弟姐妹們能夠擁有完整的家庭生活、手足之間感情深厚，並且接受教育，獲取同樣受知識的機會，得以在社會上立足，實現完善自由的發展。在司徒華父親過世後，他亦以其父親為榜樣，尋得教職，照顧幼小之弟妹與家人，這也培養出他勇於擔負責任的性格。

再另一方面，如前提及，司徒華的家庭曾面對經濟困境，必須靠親戚朋友接濟方得繼續求學，餬口度日。這也對他造成很大影響，據司徒華回憶錄表示，必須靠別人接濟度日使得他更加自卑，華叔回憶童年時曾說過：「我是個極端內向的人，有多少悲劇性格」，「可能是童年歡樂少，見得太多不公平事，看問題，總有多少悲觀的想法¹⁴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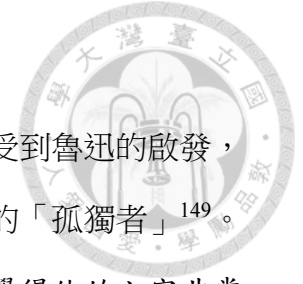
司徒華就讀小學與初中時便養成了廣泛閱讀之習慣。閱讀對於司徒華來說，是最為快樂且投入的休閒時光，而其中特別對文史與政治類感興趣，他說：「閱讀主要是有關文史和政治的，包括古今中外。讀過其作品而覺得言之有物、無教條腔、文字具可讀性的作者，瞥一瞥序言、後記和目錄，合口味的便買下¹⁴⁷」。司徒華每當有空閒時間，往往翻一翻書，每日更是關注報紙相關訊息，甚至在睡前繼續讀些書，床邊堆成一座小書山，如此數十年如一日，閱讀成了他一生持續的習慣。

「人的肉體需要運動，鍛煉體格，保持健康。不運動，就會衰弱，百病叢生，壽命必短。閱讀書報，就是一種精神運動。閱讀時，思想隨着文字而活動；事後，再作思考，更是重要的活動。肉體的運動要經常，精神的也要經常¹⁴⁸」。這是他對於維持閱讀習慣的看法。

¹⁴⁶ 出自蘋果日報，2011年1月3日，《苦難中成長，動盪中堅持，為了民主，一生孤寂》。

¹⁴⁷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33頁。

¹⁴⁸ 出自司徒華，(2009)。「無味」與「可憎」，《欄干拍遍》。



中外眾多作家之中司徒華最喜愛的便是魯迅，他認為自己受到魯迅的啟發，曾自喻有魯迅小說《孤獨者》主角魏連殳的影子，為現實世界的「孤獨者」¹⁴⁹。華叔表示魯迅是一個堅持理想，且愛國家愛人民的作家，「我覺得他的文字非常好，特別深刻，其次，他的性格堅強，不畏惡勢力，是個愛國、愛人民的作家。朋友說我的文風、性格，都有魯迅的影子¹⁵⁰」。他亦從魯迅的作品中認識到更多深厚的愛國愛民情緒，對其影響至深。

除了自身閱讀之外，他也寫了許多文章來分享其讀書心得，以及教導他人如何閱讀、如何發掘自己對於書本的興趣，筆者認為或許這是他身為一位教師的天職使然。由他作品集中的諸多文章例如《從唐詩宋詞入手》、《我讀「疾風驟雨中」的周南》、《「坐看雲起時」》、《「書中自有黃金屋」》等，可看出其涉獵廣泛，包含古文詩詞、各當代作家等。司徒華在閱讀文章後，往往進而提出自己的看法，藉由觀察其心得與描述，可知悉當他讀及自己興趣之文章時，是如何吸收整理，將文句內容轉化為胸中墨水，並與自身思想融合轉化。持續而廣泛的閱讀使得司徒華見多識廣，對於世事變化亦能立即掌握，輔以他豐富的人生閱歷、以及獨立思考之習慣，往往能引發獨到見解，而後將這些思緒轉化成為筆墨句讀，影響更多的讀者。就如其在《「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中所說：

當最初去接觸和學習某一種知識、事物、道理的時候，只能根據當時自己有的能力、學養、經驗，去領會。經過一段時日，如果能力有所提高，學養有所增長，經驗豐富了，再去溫習，自然會有不同的新的體會和發現，認識是深刻得多的。

¹⁴⁹ 出自《蘋果日報》專欄，司徒華病逝，民主鬥士，風雨一生。2011年1月3日。

¹⁵⁰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32頁。

一個好老師，一定比自己在做學生的時候，在能力、學養、經驗上都有了進步，從「溫故」中得到「知新」，結合這些「知新」去教導學生，這才是「活」的教學，深入的教學¹⁵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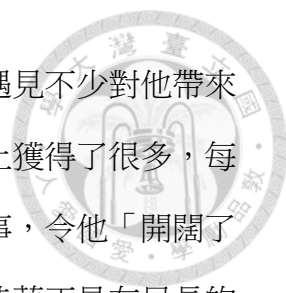


據司徒華之自述，其童年時期之家庭環境、見聞經歷與所受教育，對他來說是一個完整且深刻的記憶片段，而這構築了他個人未來發展的基礎，同時啟發思想，並對於往後性格特質的型塑、甚至整個生涯的樣貌，都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由此可知，司徒華對於童年生活的記憶與經歷如何型塑生涯性格相當重視，在他的散文集中蒐錄了相當多的文章，為他對歷史人物或是當代著名學者、政治家、軍事家等的評論與看法之專文，而在描述這些人物時，往往都會提及其童年時期，更甚者，用廣大篇幅特別描述其童年經歷，並試圖在童年經歷與人物的未來發展與作為之連結上，尋出一個脈絡。因此，筆者推究司徒華認為一個人的內斂反思個性是從小養成，而他對諸多人物童年之描寫與心得也成為司徒華在教師工作上的延伸參考。

第二節、求學時期的思想形成

若說司徒華的兒時經歷與環境影響了他的性格，那麼在求學時期的成長則對其思想構成與政治志向建立有很大影響。這個過程最早可以追溯到司徒華所就讀的小學——導群中小學，這是一所具有黨政背景的學校，以國民政府的資金籌辦，學生必須習讀三民主義與《國父遺囑》。同時學校每日舉辦升旗儀式，營造濃厚的民族主義氛圍，學生很早便具備愛國思想。據司徒華表示，導群中小學啟蒙了他的愛國教育，是其最早愛國思想之養成。

¹⁵¹ 出自司徒華，(2005)。「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橙黃橘綠》。



抗戰勝利之後，司徒華回到香港繼續學業，在這段期間裡遇見不少對他帶來啟發的師長與同儕。司徒華說從學習交往的過程中，在他們身上獲得了很多，每個人有不同的專長、習慣或者是背景，每次的相處都是不同故事，令他「開闊了眼界、也立了志」。但對他形成最實際影響的仍然是親人，司徒華正是在兄長的帶領下，首次接觸了左派團體，例如女青年會等。

當時國內情勢風雲變化，國共內戰壓力席捲而來，司徒華說：「歷經多年艱苦歲月的中國人民，無不期盼有和平的生活。中共提出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在當時深得民心¹⁵²」。相較當時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獨裁，中共趁勢提出了新的思潮，即「新民主革命理論」，吸引許多當時追求進步思想年輕人的目光，其中也包括司徒華，認定這就是中國的未來。這些左派團體便在如此背景下，或許經由中共的扶植，而接連成立，成為中共吸納青年新血、推行政治行動的幫手，也開啟了司徒華的左派背景。

創建學友社


1949年，司徒華正在油麻地官立學校就讀，同年他和一些中學生在中共地下組織的指導下，組成《學生文叢¹⁵³》月刊的讀者會「學叢之友」，在半年後改為「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即「學友社」，而這也是司徒華第一次參與團體組織。《學生文叢》月刊事實上具有濃厚中共背景¹⁵⁴，司徒華表示，在當時他嚮往進步思想，認為中國應該要有所改變，於是在兄長的引導下開始與中共人士有所接觸，後來參與學友社的組建，也是一連串因緣際會的結果。

對於學友社的籌辦或活動規劃，司徒華通常利用課餘時間參與，在投入社務

¹⁵²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50頁。

¹⁵³ 學生文叢為中共建國之前由中共相關人士所籌辦編輯之刊物。

¹⁵⁴ 主要的創辦人為中共元老陳獨秀的小兒子陳哲民與親共電影界人士廖一原。



運作時，或有機會和《學生文叢》的編輯等具有中共黨政背景的人士接觸，再加以月刊內容本就帶有濃厚中共色彩，因此司徒華漸受共產思想薰陶，嚮往共產主義，而後更進一步的加入中共組織「新民主主義青年團¹⁵⁵」。他曾說：

我曾多次聽陳哲民和其他人開編輯會議，聽他們討論國家大事，特別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鬥爭，以及國共內戰、國民黨的腐化、共產黨爭取民主及抵抗日軍的事蹟。耳聞目睹下，我深受影響，認為共產黨是將來救國的出路，漸漸對共產主義產生信任與憧憬¹⁵⁶。

當時還是「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的學友社主要是進行一般的文藝活動，特別是舞蹈的教學與歌唱等。在五十年代的香港，學校生活貧乏單調，因此許多學生都希望能夠參與課外活動，藉以認識朋友、開拓生活圈。而學友社即是透過這樣多元的活動安排，吸引學生參加，爾後默默觀察適宜人選，再私底下將之納入社團組織之中。對於進入社團的學生，組織成員會採取集體學習的方式，包括觀看愛國電影並進行討論、閱讀社會主義相關著作，採取潛移默化的方式對年輕學生進行思想教育。

學友社的內部有著完善的組織規劃，與各成員精細分工，較有經驗的司徒華則擔任領導角色，在社內頗具地位。1949年末，司徒華入皇仁書院就讀，此時他可說全心投入社團之運作，包括會議議程、小組討論提綱、思想教育內容等，一手包辦。在這段他自稱是「廢寢忘食」、瘋狂投入社務的歲月裡，讓他成長很多，包括待人處事、包括愛國主義的啟發，以及對於身為團體領導身份的學習，為他日後投入更高層社會活動、創建更大型之組織打下深厚基礎。

¹⁵⁵ 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是中共領導的青年組織，在1921年成立，最初叫做「社會主義青年團」，後來配合中共建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改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為共產黨的助手和後備軍、「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前身。

¹⁵⁶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55頁。



學友社「奪權」事件

隨著學友社運作順利，私下吸納學生的工作也有成果，於是社團的組織越加擴大，新成員不斷加入，其中也包括其他同由中共領導團體之成員，學友社的組成趨於複雜。司徒華說，在此時他慢慢覺得中央有意要強化直接對學友社的領導，亦即排除如司徒華這種英文書院¹⁵⁷學生背景的幹部，但由於華叔在學友社內影響力仍大，故起初他不以為意。但漸漸的，來自中共「紅校¹⁵⁸」之學生數量增多，他們姿態甚高、擺領導人之架勢，甚至開始對舊社員進行批判、散布謠言等行動。爾後大批「紅校」學生湧入學友社，對司徒華做批評，指控他「挾群眾自重」、「我行我素」、「違反黨中央路線」等罪名。隨著「紅校」派利用手段在學友社幹事選舉中獲勝，原本英文書院派的舊幹部權力便面臨架空、司徒華等人甚至被打為頑固份子，學友社進入了「紅校」主權時期，社內原先歡樂交融的氣氛一掃而空，社團從此走上不同路線。


司徒華說，這「奪權」的事件對他打擊很大，包括後續被組織調離學友社轉任《兒童報》、以及被其所信任之中共人士歐陽成潮¹⁵⁹欺騙等遭遇，使他第一次體會中共的本質，讓他對於左傾思想與中國共產黨將會拯救中國之期望，產生了懷疑。他說：「做為一個擁有十年團齡，相信在共產黨領導下，中國會走向民主富強的年輕人，實在完全無法理解，同為『愛國陣營』一份子的『紅校』人士，竟會採取卑劣的手段，以對敵的鬥爭態度，向學友社的愛國青年進行無情打擊和批鬥¹⁶⁰」。

¹⁵⁷ 指當時由港英政府設立的官立中學體系之學校，包括皇仁書院、英皇書院、庇立羅士書院等。

¹⁵⁸ 指在香港，那些直接由中共地下組織控制，在傳統左派學校活動的份子，稱為「紅校」。

¹⁵⁹ 歐陽成潮祖籍廣東潮州，目前居於香港。歐陽成潮在當時是司徒華於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的領導與聯絡人。

¹⁶⁰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79 頁。



據司徒華在數年之後的回想，判斷當時學友社的「奪權」，實為紅校系統的學生想要截取司徒華等人在學友社上成功經營的成果，藉以向中央邀功，以獲得實質的利益。而爭奪地盤的第一步，便是要清除司徒華在社團內部的影響力，這也是他在此事件之後即被調至《兒童報¹⁶¹》任職編輯的原因。轉調至《兒童報》後，司徒華可說遭到架空，離組織與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運作更為疏遠。雖然之後他仍然試著要與共產黨再度取得聯繫，但遭到接連被拒絕並感覺遭到欺騙，1966年《兒童報》無預警停辦，司徒華在組織中的聯絡人歐陽成潮亦與他斷絕聯絡，自此司徒華與中共的組織關係完全畫下句點。

司徒華的早年政治與社會運動生涯，從1949年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到1966年《兒童報》停辦為止，都一直受到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影響。但經過了包括學友社奪權等十多年的風風雨雨，司徒華說他「看到了中共的官僚、親疏有別和不近人情的作風¹⁶²」，大部分的人對於中共來說，都是「呼之則來、揮之則去」，一旦失去利用價值之後便丟棄一旁，十分殘酷。

這些中共的所作所為，包括在國內進行的一些極左運動、批鬥行動等，只是不斷的鬥爭與扣帽子；再加上中共所鼓吹的烏托邦理想從來都沒有實行，他說：「中共所宣揚的革命理想，吸引了包括我在內的大批熱血青年，為所謂的革命獻身。當中有很多人犧牲了¹⁶³」，但在中共奪得政權後，並沒有實行過真正的新民主主義，甚至「在文革期間，連劉少奇說過要鞏固發展新民主主義制度的言論，也成了被批判的黑材料¹⁶⁴」。這些種種體會使得司徒華對於共產黨救中國的憧憬破滅，可以視為是司徒華由支持中共轉變為和中共決裂的第一個關鍵性因子。

¹⁶¹ 同為中共地下組織相關的機構，由左派的集友銀行提供資金設立，報社內部人士也多有中共相關背景。

¹⁶²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93頁。

¹⁶³ 同上書，106頁。

¹⁶⁴ 出自司徒華，(1995)。有關「臨時立法會」的種種奇談怪論，《十年風雨聲》。



年輕的司徒華愛國、愛民族，嚮往進步思想，曾深信共產黨會將中國帶向光明的未來，於是他積極投身社會運動，加入中共地下組織與學生組織。他曾寫過一首詩：「共泛激流不共舟，相思兩地競風流，紅旗插到廬峰日，慷慨同溫少小遊¹⁶⁵」，表明他希望香港回歸中國，共同邁向民主的理想；他唱紅歌、搖紅旗，投入與付出甚多，卻換來中共如此對待，無怪乎他的灰心喪志。在晚年重新省思學友社的這段歲月，他說：

對於「奪權」事件，我由最初的迷惘，到後來得悉更多國內政治運動的內情，由反右、文革、直到血腥鎮壓八九民運，經歷了二三十年時間的自我思索、反省、對比、印證，我找到了一條清晰的脈絡。我認識到，其根本原因是源自於中共內部傾軋的本性¹⁶⁶。

第三節、文憑教師薪酬事件

1952年司徒華畢業於葛量洪師範學院，為該校首屆畢業生，並隨後任職於紅磡街坊公立學校，教授英文，擔起養家之重任。事實上司徒華並不是一開始就立志從事教職，而是希望入讀工專，當海上電報生，他說：「因為我認為航海可周遊各地，增長見聞；而且船上環境清靜，正好讀書和寫作。兩者，都可以為做一個作家作準備¹⁶⁷」。

但他後來選擇投身教育界，華叔自述其中原由為：

¹⁶⁵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64頁。

¹⁶⁶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81頁。

¹⁶⁷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



那時，父親已患了不治之病—肝癌。讀工專，需時兩年，且要交學費，家境已不容許。入師範，我選了一年制的葛師，不需交學費而且每月可領得津貼。這樣，雖然當初對教育沒有甚麼認識和興趣，但入行後，發覺也是很有意義的工作，一做便做了整整四十年，成為了我一生唯一的職業，帶有事業意味的職業¹⁶⁸。

1966年《兒童報》停辦後，司徒華與中共組織的聯繫驟然停止。在此同時香港適逢六七暴動，社會動盪不安、急遽變化，如同第二章所提及，使得港英政府主動提高對社會民生議題的關注，而港人的公民意識亦被激起，壓力團體應運而生，爭取港人權益的社會運動相繼出現。在這段香港社會運動覺醒的時期中，司徒華領導了香港文憑教師¹⁶⁹發起「文憑教師薪酬事件」的抗爭，並且取得勝利，之後參與創立「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¹⁷⁰」，出任首屆主席，開啟了他在香港參與社會運動的腳步。

文憑教師薪酬事件始末

1973年的文憑教師薪酬事件，是香港教育、工運、社會運動史上，相當重要的事件，具有顯著的影響，把香港的社會運動推向一個新的階段。依司徒華說法，其重要性有三：

- 一、 這是跟港英政府抗爭中，最激烈而又取得勝利的一次。
- 二、 這事件以爭取權益與改革教育相結合，由站在教育工作最前線的教師，發出了改革教育的響亮呼聲；它催生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成為

¹⁶⁸ 出自司徒華，(1997)。附錄：中學畢業後的我，《捨命陪君子》。

¹⁶⁹ 香港的教師分為學位教師與非學位教師，依照有無四年制大學學位之取得而別。修習大專學院一至三年短期課程畢業者，授予文憑資格，為文憑教師。

¹⁷⁰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簡稱教協；Hong Kong Professional Teachers' Union），是一個由香港各級學校教師組成的工會，現有會員超過 80,000 人，是香港最大的單一行業工會及參與會員最多的民主派組織。其定位除了工會外，還是教育團體、社會團體和民間團體。

最強大的獨立工會與工運的中流砥柱。

三、 激起了很多人敢於和港英政府抗爭，爭取自己的權益。¹⁷¹



而文憑教師薪酬事件也是司徒華第一次參與社會運動，對他有很大的啟發，「我首次投身社會運動，自此勇往直前，是一生的關鍵。這場抗爭，尖銳、激烈、複雜、詭譎，留下了深刻難忘的記憶¹⁷²」。三十多年來他一直堅持在教協會中的工作，這可說是他在脫離中共組織之後，「重新找到自己生命意義的一個起點¹⁷³」，或可為其精神寄託。在這之後他積極投身社會運動，並更進一步的進入政界，為爭取香港民主而努力。

文憑教師爭取合理薪酬的緣起，在於 1971 年，政府為了要擴展中學教育、推行九年免費教育，卻不打算增加教育經費的支出，於是每位教師必須負責更多學生、負擔更多時數的教學課程，但並未能夠領取更多薪資。爾後，港英政府更組織公務員薪酬調查委員會，決議將文憑教師的起薪降低，原有的薪級制度也多做調整變動，令教師的權益受損。

香港教師李賜雄說：「將教師薪級脫離公務員總薪級表，頂薪點亦可能調低。脫離公務員總薪級表意味著：將來公務員調整薪金時，教師可能被摒除於公務員體制之外，不在考慮之列¹⁷⁴」。司徒華說，「政府接連做出對教師不利的政策調整，是明顯貶低文憑教師的地位，影響吸納優秀人才投身教育行業之機會，也必然影響未來的教育質素¹⁷⁵」。

¹⁷¹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140 頁。

¹⁷² 出自司徒華，(2009)。《明報》與我 50 年，《欄干拍遍》。

¹⁷³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141 頁。

¹⁷⁴ 出自李賜雄，〈罷課，罷課〉。載於《我的人生旅途-生活及工作紀趣（70 年代）》。

¹⁷⁵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142 頁。

如此的政策改變，首先引起羅富國、葛量洪和柏立基三家師範教育學院的學生會，批評減薪有辱教師尊嚴，並且發起罷課抗議。之後，事件越演越烈，香港教師界著手籌備由十三個教育團體組成的「香港教育團體聯合秘書處」，由時任小學校長的司徒華出任主席，號召集結各級單位學校教師與師範學院學生，發起請願、進行與政府間的談判。

聯合秘書處除了與政府進行談判斡旋之外，亦同時準備發動教師罷課抗爭，以表達對港府的不滿，與確保訴求能被政府所採納。1973年的四月至五月間，香港教師預定發起共三次罷課行動，日期分別訂於具有重要意義的日子：4月4日兒童節、4月13日黑色星期五和5月4日與5日，希望帶給政府壓力，迫使其撤回文憑教師的減薪方案。三次罷課活動的日期與口號訴求如下：

日期	口號與訴求
4月4日兒童節	為了教育下一代，教師們要以身作則，樹立榜樣，為反對不合理的事情而抗爭。
4月13日黑色星期五	訂於黑色星期五，表達極度的憤怒。
5月4日、5日	這兩天是香港舉行升中學考試 ¹⁷⁶ 的日期，而第一天是五四運動的54周年紀念。選定這兩個日期包含有紀念五四運動和反對升中試 ¹⁷⁷ 的涵義，也是最具威力的一次罷課行動。假如此次罷課進行則升中試將無法舉辦，將對全港約10萬名應考升中試的學生構成嚴重影響。

¹⁷⁶ 「升中試」即香港中學入學考試之俗稱，當時香港小學六年級學生不是人人都可升讀中學，必須此考試通過，方能甄選入讀官立中學、津貼中學、補助中學，及私立中學的政府補助學位。

¹⁷⁷ 由於「升中試」只以三科（中、英、數）的成績一次定生死，所以經常被人批評為「壞制度」。

表 4：文憑教師薪酬抗爭之罷課活動日期¹⁷⁸。



全港教師大規模的罷課行動引起港府的不安，於是開始採取措施以制衡抗爭行動，包括發動媒體輿論抨擊、與中共滲透介入等。在與政府的往復拉扯談判之下，司徒華進一步邀請了香港三位宗教領袖幫忙介入協調，包括天主教徐誠斌主教、聖公會港澳教區會督白約翰與中華基督教會汪彼得牧師，其目的是希望可藉助這三位德高望重的宗教領袖之幫忙，做為與政府談判的中介；另一方面，由於此三個教會所轄的學校眾多¹⁷⁹，因此教師們希望能夠得到這些領袖的支持。在 4 月 13 日所發起的第二次罷課規模龐大，全港教師上下同心，共有超過八成的學校響應，對政府造成極大壓力。

此次行動可說十分成功，迫使政府願意讓步，表示進行薪資談判之誠意，並希望聯合秘書處能夠撤回 5 月 4 日的第三次罷課行動，避免影響全港「升中試」的舉辦，而時任港督麥理浩也派姬達¹⁸⁰（Jack Cater）與秘書處主席司徒華進行私下協商。在幾經往來協調後，政府最終接受教師對於薪資制度的建議方案，即刻進行補薪，獲得絕大部份文憑教師的正面回應，原訂的第三次罷課抗爭也撤回，香港「升中試」順利舉辦。

落幕與反思

至此歷經 28 個月的文憑教師薪酬事件大致圓滿落幕，香港文憑教師們取得了勝利，與政府達成協議，成功爭取文憑教師薪酬重新與公務員總薪級表掛鉤，起薪點及頂薪點都增加了約百分之二十。綜觀整個薪酬事件的抗爭始末，教師們主動集結工會與壓力團體，發動罷課以至於最後獲得成功，在當時可說是具有劃時

¹⁷⁸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145 頁。

¹⁷⁹ 在 1960 年代，全港有近 300 間中學，近四分之一有基督教與天主教背景，由政府直接開辦的官立中學只有十來間（葉健民，2009）。

¹⁸⁰ 在港行政經驗豐富，為當時港督麥理浩最信任之官員。

代之意義。現今的港人普遍具有公民意識、政治教育也普及、對於民主具備一定程度的認知，但七十年代初期的香港，六七暴動風波稍息，港府方才對於社會政策稍做開放，在保守社會氣氛下發動如此大規模的抗爭、迫使政府進行談判，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但是司徒華及香港文憑教師們卻做到了。

司徒華說：「1973年的抗爭，是香港有史以來從未發生過的，當時多數一般人都不能理解和不接受爭取合理權益的行動，反而會指罵抗爭者是反政府分子¹⁸¹」。當時香港幾乎所有的傳媒都受政府管制，如同今日中共的情況，很容易塑造輿論、掌控輿論的力量，因此挺身而出的人都必須面對可能的抨擊、背負很大壓力。但文憑教師的抗爭在司徒華的領導下，反而能夠凝聚團結力量，成功做到「壓力越大，反抗越大」，使得文憑教師上下一心的自發集結。此外，也能夠妥善的運用策略，在與政府抗衡斡旋、見招拆招之間，站穩己方腳步，掌握有利情勢，「在戰略上先發制人、但在戰術上卻後發制人¹⁸²」。

文憑教師薪酬事件的勝利可說是場艱苦的逆境戰，也是司徒華人生中十分重要意義的一章。除了這是他第一次投入大型社會運動之外，總結這場抗爭的影響與成長，他說：

我總共學到了三點教訓：一、必須有堅忍不拔的精神，做好長期抗爭的準備，不可有畢其功於一役的急躁心態。二、團結是最重要的力量，全體團結一致的有力行動，可以扭轉輿論。三、要注意策略和戰術的運用，密切分析形勢變化，有助整個計畫的事前策劃行動；同時，必須每天審度形勢，加以補充、修訂、改變，部署行動¹⁸³。

¹⁸¹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166頁。

¹⁸² 同上書，168頁。

¹⁸³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166頁。




總和以上，筆者嘗試自行歸納文憑教師薪酬事件的影響：

- 一、 由領導文憑教師抗爭行動中所學到的經驗與體會，使得時任小學校長的司徒華更加堅定其投入社會運動的目標，並且在往後帶領大型組織或活動時能更駕輕就熟。
- 二、 司徒華在此次行動中出任聯合秘書處主席，並且主要負責領導行動。這確認了他在社運、工運界的地位，逐步建立自己的威信，而能夠在往後的政治生涯與民主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
- 三、 中共地下組織成員嘗試對聯合秘書處進行滲透，並干擾抗爭之進行。雖然最後中共的干擾未果，但對司徒華來說，這使其與中共之間關係之轉壞，再記上一筆。
- 四、 薪酬事件令香港教育界趨於團結，催生了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為香港第一個大型工會。抗爭結束後，司徒華向聯合秘書處會員募款，所得用做教協會籌備資金，以及往後會所經營之經費。
- 五、 文憑教師薪酬事件可說吹起七十年代香港大型社會運動的號角，使人民明白可以起而為自身權益受損向政府表示不滿，也讓港英政府了解必需重視人民需求，為往後社會運動發展開創新的局面。

第四節、教協會的成立與運作

現今的教協會除了擁有超過 80000 名會員之外，更是香港最大的單一行業工會及參與會員最多的民主派組織，同時具有工會、教育專業組織、社會團體和民間團體之成分。早在 1972 年，便開始了對於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的準備與組織之工作，組成籌備委員會，向政府進行設立工會之登記。教協會在當時可說為文憑教師薪酬事件最大的支持力量，串連全港教師，提供所需之資源。但事實上，



教協會在當時的背景下籌組實不容易，而領導如此大組織的會務運作與發展更是困難。本節嘗試探討教協會從籌組到成立發展之歷程，如何克服環境，並且茁壯發展。最後，最為重要的是，在創建與領導教協會的過程中，司徒華有著如何的成長及思想啟發，這將對他往後政治生涯帶來正面幫助。

香港的職工會環境背景

據司徒華所說，在當時香港的政治與社會環境，包括法令的限制下，要籌組獨立工會可說困難與挑戰重重，更遑論教育人員協會這種大型組織。而在工會的運作上也多見限制與種種不利因素，嘗試歸納如下：

- 一、雖然人民有組織工會的自由，但只要有七個人或以上，便可以在同一行業或產業中，成立另一個工會。所以，同一行業或產業中的僱員，很容易被分化而不能團結。
- 二、當時的僱主十分強勢，很容易利用種種藉口，去打擊工會和工會領袖，或進行拉攏收買。
- 三、沒有集體談判權，僱主不承認工會，工會沒有法定的途徑，去與僱主談判會員的權益，發動工業行動並非輕易。
- 四、大多數的工會都受到中共或國民黨的操控。這兩個政黨，有充足的資源和人力，去扶植受其操控的工會，獨立工會難與其競爭。
- 五、工會未能爭取和保障會員的權益，因此一般僱員都缺乏工會意識，參加工會的人數不多，工會只能收取很低的會費¹⁸⁴。

司徒華認為，獨立工會的建立確有其重要性，特別是對於當時的香港，獨立工會可說是保障和促進民主的最主要力量。他說：「獨立工會是有組織的力量、

¹⁸⁴ 出自司徒華，(2008)。香港獨立工會的道路和經驗—為教協會成立三十五周年而作，《青山不老》三言堂結集。

是意志和權益一致而團結的組織、是會員的代表而會員又是廣大市民的一份子，其權益符合社會整體的權益¹⁸⁵」。而在這其中關鍵便是工會的「獨立」與否，代表工會脫離政府的控制和影響，避免淪為當權者的工具。因此，縱然當時背景環境因素嚴苛，但在全港文憑教師的憤怒不平之下，司徒華等人仍然堅持創立教協會。

教協會的籌建與發展

教協會的籌建工作發起後，便開始招募會員，選舉會員代表，選舉理事等工作，時任小學校長與葛量洪師範學院校友會主席的司徒華自然列席其中，之後在正副主席的選舉中由於教師的支持而當選副主席，隔年原主席錢世年因故退出籌委會¹⁸⁶，由司徒華接任主席一職。司徒華明白，教協會是在文憑教師薪酬事件中孕育誕生，而艱苦鬥爭與動盪的環境可以激勵人心，使人自發的團結，但現在事件逐漸平息，教師們也各自回到工作崗位，因此該如何在暴風雨過後仍然維持組織的凝聚力、不斷發展協會事務，對抗如前所述的惡劣社會環境與不利制度，才是真正的困難與挑戰。對此司徒華提出他對於教協會草創初期，該如何組織與運作的兩方面看法：

- 一、在會務的發展上，首先要擴大教協會的會員招募，而會員數量的增加就等同於協會力量的增加。司徒華提出了「一、二、三、四¹⁸⁷」的口號，分別代表四個不同層次的目標，從官校教師至私校教師、小學教師至各級教師、最後到全港一百多萬的學生，都是教協會要團結的對象，希望

¹⁸⁵ 出自司徒華，(2002) 出自香港工運與教協會的經驗－阿拔·尚加學院演講詞，《滄浪之水》。


¹⁸⁶ 據司徒華回憶錄中所提及，錢世年加入教協會的目的是想參選市政局。1973年錢世年成功選上議員，便退出教協會之籌備。

¹⁸⁷ 「一」：當時一萬名的會員；

「二」：全港共兩萬官立中小學教師；

「三」：包括私校全港共三萬教師；

「四」：學生佔全港人口四分之一。



透過教育改革和提高專業精神，培育社會未來之英才。司徒華說：「團結全港教師，可以接觸全港學生；再透過全港學生，可以接觸到全港家長、接觸全港家庭，也就等於四百多萬人，我們要團結的，是全香港的市民¹⁸⁸」，可見教協會目標之遠大。

二、其次是教協會會務發展的策略，司徒華提出「農、輕、重」三方面均衡發展，這是以一個國家的發展必須兼顧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來做比喻，而這個概念直至今日仍然是教協會運作宗旨。教協會的「農業」代表會員權益，要使教師有職業保障，服務條件能夠改善。教協會的「輕工業」是提供會員的福利、文娛康樂等各種服務，此為聯絡會員的供求網絡，提供他們所需，他們便會主動與會接觸，建立起緊密的聯繫。最後，教協會的「重工業」代表推動教育改革、支持社會公義、參與社會運動等，此為教協會對社會之責任，也藉此建立社會地位和影響力。

教協會的運作與定位

司徒華所規劃的發展方針，使得教協會得以克服困難，運作漸上軌道，會員數也快速提升，這無疑是對教協核心成員的莫大鼓舞。1978年，教協會運用先前抗爭活動所餘留之款項，加上向會員的募款，以及幾年來經營打算的成果，買下了第一間屬於自己的會所，可說是意義重大的里程碑。有了根據地之後，教協會便得以開拓更多元化的發展，各種服務接連開辦，包括福利社、醫療、《教協報》、各式機構單位等。完善的服務與制度不僅吸引更多會員加入，也為教協會帶來豐沛的財政盈餘，得以自給自足不需對外依賴，是站穩腳步的其中一個關鍵。在往後的幾年，教協會又輾轉買下了其他的建物做為自有產業，目前擁有港九兩地共近四萬平方英尺的自置物業，為香港少數擁有獨立大型會所的工會。並且在一買

¹⁸⁸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172頁。



一賣輾轉之間累積許多盈餘，可挪作會員的福利使用與聘請更多職員。

面對教協會的快速發展，在服務會員、拓展教育理念之外，勢必將面臨更多社會角色之參與，這便是司徒華所說的「責任」。在七十、八十年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香港，改革呼聲四起，教協會身為全港最大職工會，擁有龐大會員、資金與人脈，無疑的將背負許多期待。特別是教協會的領導階層多已身居社會要角，影響力舉足輕重。因此教協會在對於自身與在社會中的定位，是一個甚麼樣性質的團體？在社會中站立如何的位置？便顯為一個重要課題。根據司徒華所說，他所希望的教協會，是先由「一個職工會、一個教育專業組織與一個民間團體」三者兼備的組織做起。以下分別描述：

一、在「職工會」方面來說，這可說是教協會的天職，必須妥善做到維護及爭取會員權益，而這分為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

- (一) 首先是全面性的，關乎大部分會員的權益。例如：改善薪酬和服務條件、縮班教師職業保障、推行小班教學、減輕工作負擔與工作壓力等等。
- (二) 個案投訴，這也是個不容易的業務。關於處理個案的部分，司徒華說：「不要看輕這方面的工作，因為全面性的權益，不易一時解決，數量也不多；個案卻幾乎無日無之，妥善解決了，可擴及全面，尤其是增強會員的歸屬感¹⁸⁹。」

二、其次是「教育專業組織」。由於教協會的會員，全都是教育工作者，而教育工作是一項極具社會性的專業，幾乎涉及每一個家庭，影響下一代的成長和社會的未來，對促進道德和經濟也很有關係。因此，提高會員的專業精神和專業水

¹⁸⁹ 出自司徒華，(2008)。香港獨立工會的道路和經驗—為教協會成立三十五周年而作，《青山不老》三言堂結集。



準，可說是教協會的一項重要社會責任。

三、「民間團體」。民間團體是必須遠離權勢，站在廣大市民的立場，支持社會公義。因此教協會要做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否則容易被拉攏、收買，甚或是被吞併。

當教協會能夠扮演好這三個角色後，接下來的目標就是投入社會、參與社運，甚至是從政，冀能為社會公民能夠有所貢獻，而這也是司徒華一直以來的理想。他這樣說：

我們從工運走到社會運動，再踏上從政之路，這是必然的發展規律。做為一個強大而有影響力的教師工會，教協會不能脫離社會運動，否則我們會變得孤立，就會慢慢萎縮。當然，教協會既是一個教育團體的工會，就不能忘本，要為教師爭權益、謀福利，致力推動教育改革。而作為一個民間團體，我們要支持公義，參與民主運動，甚至要從政，要在議會發聲，所以立法會教師功能組別議席，教協豈有不參選的道理？¹⁹⁰

教協會與司徒華的成長

今日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樹立了香港社運及工運史上十分輝煌的成就。教協會已然成為香港最具力量的職工會之一，也是教育界最大的團體，共有八萬多名會員，涵蓋香港九成以上之教育工作人員，深入各級學校，動員力量、組織實力等，都凌駕其他組織之上，包括那些擁有中共地下黨在背後支持的左派團體。觀諸教協會成功的原因，大抵不脫以下幾點：

¹⁹⁰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215 頁。



- 一、 規章制度完善，成員團結且各司其職，避免外力干涉；
- 二、 組織發展方針明確，會員向心力高；
- 三、 領導核心的結構完整、策略得體；

這些積累的經驗和樹立的傳統，主要歸功於司徒華的領導，能夠得到很好的貫徹和發揚，造就了今日教協會的樣貌。

在實際的會務發展與運作上，教協會可說是一直依照著司徒華所設定「職工會、教育專業組織與民間團體」的路線前進。歷年來教協會致力於教育工作的推廣與改革，曾發起或參與活動甚多，如：開辦「普及閱讀獎勵計劃」、推動課程改革、要求撤回香港學科測驗、爭取維持特殊教育津貼、減輕教師工作壓力計劃¹⁹¹等，為香港的教育與教師發聲。另一方面，司徒華說：「根據歷史的經驗，受到群眾支持的獨立工會，都是推動和保障民主的重要角色¹⁹²」。

在香港也是如此，教協會的發展與運作，成功影響了正在崛起的香港社會運動與公民意識，並在其中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提供正面能量。在當時的社會運動，諸如金禧運動、中文運動、抗議日本篡改教科書中侵華歷史¹⁹³等，都可見到教協會之足跡。另一方面，教協會亦進一步的角逐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席選舉，藉由實際的政治參與，為香港的政治進步與民主發展做實質的付出。

教協會由一個集中關注教師權益及教育問題的教育界組織，逐步介入其他社會事務。司徒華曾說：「多年來，教協會積極參與香港的重大社會運動，發揮不少影響力。在教育問題上，我們一馬當先、當仁不讓；在社會公義上，我們全力

¹⁹¹ 參考自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網頁，歷年教育事務。取自 <http://www.hkptu.org/ptu/index.htm>

¹⁹² 出自司徒華，(2002)。香港工運與教協會的經驗 — 阿拔·尚加學院演講詞，《滄浪之水》。

¹⁹³ 敘述於下一個章節。

以赴、協助支持，特別是推動民主運動¹⁹⁴」。今日的教協會在華叔數十年努力下，已成為香港民主運動的核心和主力，「民主黨是香港最強大的民主政黨，而教協會是民主黨最重要的伙伴¹⁹⁵」，同時教協也是香港支聯會背後最主要的支持力量，為保障自由法治與民主價值而奮鬥。

從教協會的創建、到司徒華為了穩固教協會基礎與發展，而訂立的發展規範、方針與願景，可看出他的匠心獨具，並能對大環境明確掌握，得以運用策略一一克服當時不利於獨立工會組織的社會環境與制度。除此之外，教協會也面臨過諸多挫折，比如受到來自港英政府的壓力與監視，以及中共的組織滲透等等，但總能在司徒華的策略與對組織成員的嚴格要求之下，將危機化解。而教協會的經營也創造許多盈餘，日後支聯會複製類似的模式，經濟得以獨立。因此有人曾說，如果司徒華不投入社會及民主運動改而從商，必定也是位成功的商人¹⁹⁶，而這或許也就是司徒華凡事全心全意投入，而能獲致最佳成果的寫照。

教協會是司徒華畢生的心血，而他在青年時期參與創建、領導的教協會，也成為他一生的轉捩點，更是全香港社運與工運發展的基石。司徒華過世後，所有評論幾乎都感佩司徒華與教協對香港的影響，香港政治評論人艾克思¹⁹⁷（林保華）說：

因為教協的實力，參與六四民主運動而成立支聯會；也是教協的實力，參與了民主黨前身港同盟的創立，也是這個教協，一直保有香港立法局（會）功能組別中的一個席位，發揮了自己的影響力...可以看出，司徒華對教協的重視，不但

¹⁹⁴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185 頁。

¹⁹⁵ 出自司徒華，（2002）。香港工運與教協會的經驗—阿拔·尚加學院演講詞，《滄浪之水》。

¹⁹⁶ 參考自黃德文，《我所認識的華叔》文中所述：「曾經與華叔合作開書局的蘇賡哲教授曾對我說，華叔如果投身於商界，他必能成為巨富，可見華叔的理財能力」。

¹⁹⁷ 艾克思，本名林保華，政治評論家，現居台灣。

是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對未來的擔憂，就是對香港未來的前途做最壞打算，即使民主黨、支聯會都發揮不了作用了，只要保住教協這個基礎（香港不可能連教師都趕盡殺絕），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¹⁹⁸。



最後，我們甚至可以說，司徒華造就了教協會，而教協會也造就了司徒華，這兩者結合為一時，便影響了今日香港社會的樣貌。1980年代教協會站穩腳步後，香港逐漸進入一連串社運興起、公民意識抬頭的風潮之中，加以回歸所帶來的社會與政治不安，使得司徒華決定投身政局，在教協會多年累積的實力，成為他角逐立法會選舉的最大資產。自此，司徒華成為香港的社運與政治領袖，帶領眾人往追尋公理正義與民主價值的路上前進。

第五節、投身於社會運動

文憑教師薪酬事件與創建教協會，開啟了司徒華投身香港社會運動、並且成為其中領袖人物的道路。當時的香港正醞釀著社會運動的風潮，公民意識浮現、社會也凝聚起力量，催生若干壓力團體。在這段期間中，司徒華參與了不少以爭取港人權益出發的社會運動，而如前所述，香港 70 與 80 年代由於中美建交與中國勢力抬頭等因素，而產生港人民族認同之意識，連帶的引發相關社會運動¹⁹⁹，這同時也可觀察司徒華本身愛國觀與民族意識之議題。

領導及參與這些工運與社會運動，司徒華成為港英殖民地政府的眼中釘，經常受到監視、滋擾，不斷被港府的喉舌及代言人抹黑攻擊，指他是中共的同路人²⁰⁰，但華叔則無所畏懼。這些工運與社會運動包括：金禧事件、中文運動、反對日本

¹⁹⁸ 出自艾克思，(2011)。《司徒華留下什麼“遺產”？》

¹⁹⁹ 參考自《香港身份認同的建造》。

²⁰⁰ 參考自蘋果日報專欄，《蘋論：與華叔一起走好民主每一步》。

篡改侵華史實與保釣運動等，分別描述如下：



金禧事件


金禧事件發生於 1978 年，起因於金禧中學教師發現校內財政狀況缺失，而後演變成學生靜坐罷課，教育司進而採取高壓手段封校，引發市民反彈、2 萬人集會抗議，轟動全港。在此事件中，教協會接獲金禧中學教師投訴，於是司徒華與教協積極介入，與政府交手對抗，最終爭議得以解決。司徒華說：「社會進步、是這事件得到解決的時代背景；而這事件得到解決，亦推動了社會的進步，兩者存有互動關係²⁰¹」。金禧事件是教協會在文憑教師薪酬事件後，經歷的又一重大事件，奠定了教協會在香港壓力團體中的威望，也更確認了司徒華在香港社會運動的領導地位。

金禧中學是由寶血會所創立，1977 年有教師懷疑校方財政處理不當，著手調查校內財政狀況，發現校方涉及扣押職工薪金與不當牟取利潤之情事。之後教師們向教署及律政司投訴校方斂財，並且發起全校師生靜坐罷課兩日，要求校方交代事件始末。在律政司宣布展開調查之期間，香港教育司向金禧中學全校教師發出警告信，指學生罷課必須由老師承擔責任，若再次有同類事件發生，便取消他們的教員註冊。事件至此，已牽扯到教師及學生的權益問題，於是教協會受教師之托介入，司徒華曾說：「假如校方對揭發貪汙的教師進行報復，教協會做為一個職工會，為了維護會員權益，決不會袖手旁觀²⁰²」。

事件越演越烈，校方接連向參與抗爭的教師發出警告信，並將 4 名學生處以停學，導致師生群情激憤。之後，香港教育署更進而宣佈關閉金禧中學，此舉引發全校師生與香港社會大眾的不滿。於是教協會向港督麥理浩請願，要求「先復

²⁰¹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217 頁。

²⁰² 同上書，219 頁。



校，後調查」，並且聯同學聯以及其他團體在維多利亞公園發起「金禧事件民眾大會」，全港共計萬人參與，向政府表達不滿，而這也是香港首次在維園舉行大規模集會。最後在群眾及輿論之壓力下，港督麥理浩委任一個由三人組成的調查委員會提出事件調查報告，成立五育中學供金禧師生繼續任教就學，並且撤銷對教師的警告信，自此金禧事件方為落幕²⁰³。對此，黃德文曾說：「華叔一士諤諤，不理輿論的污蔑，堅定地站在師生正義的一方，頑強地艱苦抗爭。他有勇有謀，組織力可媲美軍事行動，有板有眼，有攻有守，戰略戰術並重，最後贏得罕有的勝利²⁰⁴」。

金禧事件揭露了當時政府資助學校的不合理現象，促使當局不得不認真考慮修訂資助學校的條例²⁰⁵。而金禧事件也可以視為香港社會走向進步的開端，當時香港壓力團體開始出現，廉政公署亦初成立，故此種校方貪汙事件加上政府處理不當，自然引起社會反彈。教協會如同文憑教師薪酬事件一樣，在此事件中再度扮演重要角色，但這次有了其他壓力團體的支持，得以順利在維園舉辦萬人請願大會，和政府對抗。此萬人集會的進行，讓司徒華領略籌辦大型集會的經驗，對於活動的計劃與考量，都能夠確實掌握，造就了往後支聯會舉辦大型活動與抗爭行動得以複製成功之經驗。另一方面，司徒華在金禧事件中還認識了一批日後在教協工作和民主路上的戰友，也是一項重要的收穫。他說：

起初有一些學生反對我們接納政府另設五育中學的安排，他們認為這違反在金禧原址原校復課的原則。我跟他們說，你沒有發言權，我也沒有發言權，這件事應交由金禧的老師、學生及家長表決的，「到你喻咩？」一句話，他們再沒有話說。這批反對我們的大學生，後來在工作當中也認同了教協的理念，後來也走

²⁰³ 參考自司徒華，《金禧事件奠定教協威望》；與金禧流水賬，原載【學苑 - 金禧專號】。

²⁰⁴ 出自黃德文，(2008)。我所認識的華叔，《明報·世紀》。

²⁰⁵ 參考自維基百科，金禧事件條目。

來參與教協的工作，包括張文光、陳漢森、李焯佳、何良懋等²⁰⁶。



中文運動

若說金禧事件係維護教師與學生權益、反抗貪汙的社會運動，則中文運動即帶有較深層的民族意識與政治意義。中文運動的背景為，自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後即以英文為法定語言，雖然殖民地政府各種與華人有關的通告、告示多數都會譯為中文，但一切法律文件只有以英文書寫方具法律效力，因此與政府的文書往來只能以英文進行²⁰⁷。

在港人公民與民族意識崛起後，深感中文地位低落，英文教育亦不夠普及，於是起而爭取中文的法律地位。香港歷史上的中文運動共有兩次，第一次在 1969 年，主要訴求是向港英政府爭取在公務上使用中文的權利；而第二次是在 1978 年，由教協會聯合其他團體組成「中文運動聯合會」，訂立三大目標，喊出所謂「母語教育」口號。

一、督促政府貫徹中文為法定語文。

二、爭取中學以母語為教學媒介。

三、改進中文教學素質，同時關注英文教學的改進。

表 5：第二次中文運動三大目標²⁰⁸。

中文運動聯合會採取了一些實際的行動，來向政府傳達訴求，諸如：

一、寫作春聯，宣傳中文運動；

²⁰⁶ 出自司徒華，(2010)。《金禧事件奠定教協威望》。

²⁰⁷ 參考自維基百科，《中文運動》條目。

²⁰⁸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229 頁。



二、針對目前學校的中文教學情況進行調查，並且公布調查報告，包括：

- (一) 中學生使用非母語學習所遭遇的困難；
- (二) 中文地位受到壓迫的狀況；
- (三) 社會人士對中文運動的看法；
- (四) 普通話在香港推行的狀況等。

中文運動可說獲得正面效果，在《基本法》起草時期，中文在法律上的地位已然提升，香港的法律條文必須以中文書寫。中文運動提高了港人對於中文的認識，連帶的與港人對中國的民族認同情感形成往來之情感作用。司徒華認為語言與民族問題是相牽涉的，「一個人不能掌握自己的母語，也就無法承繼本民族的文化，從而培養出深厚的民族意識。語言是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反過來說，如能夠掌握語言，善於與他人交流，在交流中就容易培養出豐富的思想感情，並提高思考能力²⁰⁹」。

由中文運動可觀察出司徒華對於中國的情感表達，他希望香港可以維持與中國的情感聯繫，「中文運動同時涉及幾方面的關係，即語文、民族、中國人身份認同」、「中國人之間的接觸和溝通，是靠中文做為橋樑，這既是生活，也是民族問題²¹⁰」，這是他愛中國愛香港情懷的展現。由於香港的社會組成九成以上仍是華人，加以港英政府的統治策略並非採取高壓，而是對華人文化傳統維持相當尊重。當文化與生活習慣得以保留，則港人對於自己身為中國人而非英國人的認同意識便持續存在，到了七十年代內外因素的互動激發下，包含中國國際地位興起，與相關社會運動與社會菁英之推動，便興起一股民族意識的社會運動風潮。

²⁰⁹ 出自司徒華，(1987)。《解開死結，重視母語》1987年3月25日，立法局就是否成立一個中文基金的問題進行休會辯論之發言。

²¹⁰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233頁。



保釣運動與港人民族精神

保釣運動的發起亦和港人的民族意識有很大關聯。1970年代，首先是美國表示將釣魚台列島交給日本管理，接著日本政府覬覦釣魚台海域的經濟利益，因而聲稱釣魚台島之所有權屬於日本。此舉引起廣泛華人界的不滿，激起民族情緒，引發保釣運動的長期抗戰。而對於曾經歷抗戰時期、目睹日軍暴行的司徒華來說，日本強佔釣魚台無異是軍國主義的延續，中國人必須挺身而出捍衛自己神聖的領土與主權。

1970年代至今，世界各地華人包括中港台及華僑，集合數十個不同團體投入保釣運動，其中也包括了司徒華與教協會的參與。實際的行動包括政治遊說請願、發起集會抗議，以及出海登島的抗爭行動，而司徒華在政治與集會上付出許多心力，以及前往日本領事館抗議示威，教協會也於背後進行支援工作。雖然目前釣魚台主權爭議仍懸而未決，但保衛領土主權的決心已然展現，司徒華說：「在保釣問題上，香港市民充分表現了民族精神²¹¹」。然而北京方面對於釣魚台的態度卻持續的不明確，並未確實向日本行使主權表述與進行交涉，維持較為含糊的態度，甚至由美國之音的報導傳出中國當局禁止民間保釣人士出海前往釣魚島宣示主權的消息²¹²，無疑對民間的保釣運動形成傷害。

保釣運動四十年來的起伏，刻劃了香港人獨特的政治主體成長歷程。雖然直至今日，還沒有能改變釣魚台在國際定義上由日本掌控之事實，但這場運動對港台兩地新一代的政治啟蒙，有著重大意義²¹³。除了保釣運動之外，1982年日本官方修改其歷史教科書內容，刪去日本侵略中國的史實部分，用謊言造成再度傷害，引發華人圈極度不滿，激起港人起而抗爭，誓言維護國家民族之尊嚴。

²¹¹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242頁。

²¹² 出自《大陸保釣運動開始轉向？民間出海行為被中國政府嚴格壓制》，2011年美國之音新聞。

²¹³ 參考自安徒，(2012)。《勇士凱旋，反思保釣》。



事實上在七十、八十年代香港本土意識尚未崛起的當時，這代表一個政治上的意識突破，走出一條嶄新訴求民族主義、與對於中國的愛國情緒之路線，並且在之後面臨六四事件、香港回歸時，由於中共的暴政而分化形成「愛國卻不是愛政權」的矛盾現象。司徒華便是在如此現象中的重要人物。

司徒華說，當時的中文運動、反對日本教科書修改侵華史實，到保釣運動，都是本著民族主義情緒而出發，香港市民必須起而捍衛中國的主權與領土，這是愛國行為的展現。我們知道司徒華深摯的愛國情緒，透過其本身對社會運動的參與，以及教協會、支聯會的發展，他希望能夠傳播愛國思想，感染香港市民，繼續往他的理想之路邁進。

面對當時北京對保釣等議題的迴避，司徒華鼓勵港人從自我做起，身為中國的一分子必須挺身而出；加以文革、六四事件之後，對中共政權的失望，漸漸形成了一種「建設富強民主中國從香港做起」的價值觀與思潮。政治評論家安徒²¹⁴曾提及，在香港人的想像中，可說是種「自外於中國，卻又比中國更中國」的情緒：

當兩岸自號代表「中國」的國家政權都腐敗無能，以致喪權辱國，人民以「民族」之名，向「國家政權」「將軍」(checkmate)，的確是一種批判力量的表現方法。香港過去自外於兩個中國政權，所以更便於以沒有具體訴求對象的「民族」之名發話。這是香港人特有的「中國想像」，或者可以名之為一種「第三中國」的自我想像，它會比兩個「中國」更「中國」地去表達獨特見解²¹⁵。

筆者認為，這或許就是以司徒華為代表的香港愛國主義所努力的成果，嘗試

²¹⁴ 安徒為筆名，實為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羅永生。

²¹⁵ 出自安徒，(2012)。《勇士凱旋，反思保釣》。

「以香港為中心，提出中國未來發展的藍圖」。同樣的，在往後司徒華所投入的香港民主運動上，也可以看出相似軌跡與脈絡。



第四章

司徒華與香港民主運動的發展



前言


1980年代開始，由於中英談判與《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確認了1997年香港回歸之時間表，令香港面對史無前例的政治力量重組，激起港人對於回歸的想像，思考其政治未來，以及「香港往何處去」。於是各種意識形態相繼爆發，包括民族主義、社會主義、保守主義、民主思想等，並化約為具體行動，影響香港其後的政治與社會發展²¹⁶。港人自1949年中共建國以來，目睹了中共一連串政治鬥爭中，對於人權的迫害與法治的踐踏，因此當九七回歸在即，港人對於中共能否真正容許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及是否仍能保有法治與人權等問題，產生疑問與自覺。於是香港形成一股必須建立完善制度，以確保一國兩制、高度自制得以實行，不會遭受中共打壓的意識，而這樣的「制度」便是民主。

司徒華曾說：「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中，民主最為重要。因為只有民主的政制，才能促進和保障自由、人權和法治。否則，即使已有的，只不過是統治者的恩賜，是隨時可以被削減和剝奪的²¹⁷」。在港人追尋民主的運動中，當時已身為教協會主席與多個社會運動領導人，肩負社會菁英重任的司徒華自然也是其中要角。

他首先的投入這場戰役之中，數十年來持續奮鬥、努力不懈，使他被稱為香

²¹⁶ 參考自馬嶽，(2012)。《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

²¹⁷ 出自司徒華，(2002)。香港工運與教協會的經驗－阿拔·尚加學院演講詞，《滄浪之水》。



港民主運動的先驅、以及香港「殿堂級」之政壇人物²¹⁸。在司徒華的政治意識中，他相當樂見香港的回歸，這是植基於本身的愛國主義之上，因為他認為香港本為中國的領土，港人自然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雖然他對中國共產黨的獨裁專制是失望的，1989年迫害人權、血腥打壓民運的「六四事件」更讓他徹底與中共決裂，但他仍然希望能透過香港民主運動的發展，進而往「打倒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的理想邁進。他說：

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香港民主運動也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一部份。兩者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倘若，中國沒有政治改革而走向民主化，香港政制要超越現況而進一步民主化，沒有甚麼空間。中國民主運動的道路，是崎嶇、曲折、艱苦、漫長的，香港民主運動的道路也如此²¹⁹。

香港回歸前的過渡期，是司徒華進入政壇的初試啼聲，他投入立法會的教育界功能界別選舉，進而當選成為議員，一做就是十八年光陰。接著又接受北京之委任，成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其後歷經爭取「八八直選」、「六四事件」、籌組港同盟和民主黨等，他帶領教協會與其他團體全心的投入，是香港最早出來爭取民主的人之一。

蘋果日報社論提及：「在司徒華二十年議會及選舉生涯中，未曾嘗過敗仗，協助民主派擊敗無數強勁政敵，為泛民在香港政治影響力打下雄厚基礎²²⁰」。本章節將逐一檢視司徒華在香港回歸前的過渡期中，投入民主運動及參與政治的心路歷程，並探討六四事件對其民族主義情緒造成的影響，而投射到實際的政治行為上，引導出支聯會的建立。最後是司徒華領導多個民間組織的團結，形成香港

²¹⁸ 出自香港成報社評。

²¹⁹ 出自司徒華，(2006)。香港回歸後九年多以來的變化，2006年9月15日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演講講稿。《弦斷誰聽》。

²²⁰ 出自2011年1月3日蘋果日報專欄，《帶領泛民打下雄厚政治基礎，全面直選，力爭到底》。

民主黨及民主派的雛形，迎向香港回歸的路程。



第一節、司徒華的民主理念


談到香港的民主運動和司徒華的參與，就不得不先探討司徒華本人對於民主制度以及香港爭取民主的思維，如此方能在本文大框架之下，進一步了解他投身政治的心態與軌跡。

由文獻中可發現司徒華對於香港政治的民主理念線索，簡言之就是普選，他認為平等的政治參與權利是人權中最為重要的一環，人民有選擇自己政府之權利，而非霸道的一黨專政、人民只能接受政府的決定，無法改變。有了民主的政治制度之後，其他諸如法治、人權與自由等權利，才能夠受到保障，否則就像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一樣，給你的東西隨時可以收回，一切以政府意志為主、利益優先，因為不存在力量可以跟政府相抗衡。事實上香港回歸後直至今日，民主運動的主要重心都在爭取普選，但在北京、特區政府與《基本法》的重重設限之下，追尋民主政治制度的道路可說十分困難，司徒華說這是條「艱苦的民主路」。

司徒華表示，他理想中的民主政治制度模式，應該包含以下幾點：

一、一人一票的普選制度。有普選，不一定有民主，例如新加坡；但沒有普選，就一定沒有民主。

二、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互相制衡。權力就是腐蝕，絕對的權力就是絕對的腐蝕。只有三權分立的制衡，才能防止腐蝕和出現絕對的腐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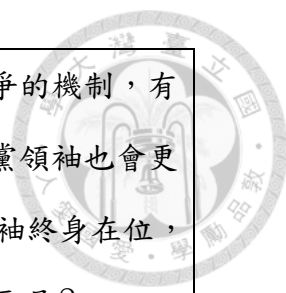
<p>三、多黨制。容許不同理念的政黨存在，自由競爭，容許人民有選擇執政黨的自由。不是一黨專政，即使中共有所謂民主黨派，只不過是傀儡和花瓶。</p>
<p>四、軍隊必須國家化而非屬於政黨或政權，軍隊真正的作用是保護人民、捍衛國家。中共是「黨指揮槍」，軍隊是屬於黨而不是國家的，軍隊成為了維護鞏固一黨專政的工具。一些不民主的國家，很多是靠政黨或政治人物指揮的軍隊，發動政變而奪取政權。</p>
<p>五、新聞、出版、言論的自由。有人比喻，這是三權分立之外的第四種制衡的力量，代表人民對行政、立法、司法進行監察，推動國家社會的進步。</p>

表 6：司徒華對於民主制度的看法²²¹

此外，以下是司徒華所認為民主制度的優點：

<p>一、培養人民對國家社會的歸屬感，使他們真實感覺到是國家社會的主人。如此一來人民自然會愛國、愛社會，不必你天天向他們灌輸強調。</p>
<p>二、有既定的方法、途徑、程序，去解決矛盾、紛爭、異見，使之互相融合，達成共識，不致激化、爆發尖銳衝突，能夠維持持久的和諧穩定。</p>
<p>三、能夠不斷自我完善。現存的民主制度，是不斷地發展和自我完善而來，但還未「止於至善」。目前一些最民主的國家的民主制度，都是經過不斷的自我完善而發展過來的，往後仍需與時俱進。中共常常說要自我完善，但始終完善不了，還繼續腐敗下去。這是因為沒有民主，沒有民主是無法自我完善的。</p>

²²¹ 出自司徒華，(2007)。甚麼是愛國？甚麼是民主？2007年7月27日香港民主促進會及公共專業聯盟座談會講稿，《煙雨平生》。



四、培養出優秀能幹的政治人才。民主政制是一個自由競爭的機制，有競爭，才有進步。在民主政制中，政黨可以替換執政，政黨領袖也會更替，做得不好，就要下台。假如一個政黨永遠執政，一個領袖終身在位，甚至可以隔代欽點承繼人，這樣，怎會出現群雄並起的局面呢？

表 7：司徒華認為民主制度的優點^{222,223}。


透過以上文字，於是我們了解司徒華所追尋的民主理念，也明白他之所以傾畢生努力投入，並且進入政壇，由裡而外爭取民主的原因，「民主」是為司徒華愛國精神的表徵與手段。他認為在香港爭取民主的首要目標，是要避免回歸之後在獨裁專制中共政權統治下，自由、人權、法治出現倒退之情況，並確保「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之承諾得以維持，香港持續的繁榮、安定與進步，是為「不撤退、反倒退」之精神展現。1987年司徒華在立法局針對《代議政制發展檢討綠皮書》動議辯論之發言，可做為他對香港爭取民主政治與普選制度的一個歸納，節錄如下：

在我們面臨的歷史大轉折中，沒有直選，就不會有民主政制；沒有民主政制，就不會有真正的港人治港；沒有港人治港，就沒有高度的自治；沒有高度的自治，就不能徹底實現一國兩制；不徹底實現一國兩制，只會一國一制，就沒有安定繁榮。有些人說，民主不等於直選，直選不等於民主。但我可以回答，有直選未必一定有民主，假如沒有直選的話，一定沒有民主。

一、民主政制是人權、自由、法治的保障……在有民主政制的地方，人民便實實在在享有這些權利；在沒有民主政制的地方，這些權利便像畫在牆上的餅。

²²² 出自司徒華，(2007)。甚麼是愛國？甚麼是民主？2007年7月27日香港民主促進會及公共專業聯盟座談會講稿，《煙雨平生》。

²²³ 同步參考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245頁。



直選是最基本的平等的政治權利，連這個最基本的平等的政治權利也沒有，其他的權利還有甚麼保障？……現在，主權將要回歸祖國，民族恥辱洗刷乾淨，香港同胞便也是國家主人翁的一分子，我們應該享有的人權、自由和法治，理所當然有一個民主政制來保障，不再靠別人恩賜。

二、資本主義社會，必須有一個資本主義的民主政制。請看一看，有那一個繁榮安定的資本主義社會，是沒有資本主義的民主政制的呢？一些經濟落後的國家，在謀求建立起民主政制，來促使國家富強，如菲律賓。……一些本來沒有民主的國家，經濟發展了，都在爭取民主，使政制與經濟發展相適應，如南韓。民主政制，是促進經濟發展的一種動力。

三、民主政制能加強全民的歸屬感，加強整個社會的凝聚力。實踐是最重要最有效的教育，尤其是公民教育。……昨日有人引用九龍城一位區議員的民意調查，來說市民的政治意識淡薄，我奉勸他們以後不要引用。這調查可創幾項世界紀錄：（一）發出三千多份，只收回五十二份，不到百分之二，回收率之低是破紀錄的。（二）回收率這樣低，統計學上根本就不承認，但卻煞有介事地發表，面皮之厚是破紀錄的。（三）那麼多人還去引用，也是破紀錄的。更可笑的是，調查的結果是反直選的。

四、民主政制可協調社會內部矛盾，是避免社會內部矛盾激化，使社會內部矛盾，按共同遵守的規則去解決而不致引起動亂的最好方法。沒有這樣的協調解決矛盾的途徑，安定只是表面的，矛盾只是潛伏著，激化起來，便會變成爆發的火山。

五、權力和平轉移的最好辦法。……民主的選舉，在目前人類社會中，是權

力和平轉移的唯一最好途徑²²⁴。



最後，司徒華對於民主的追尋與夢想之終極目標，是在香港的普選制度、民主政治發展成熟之後，進而激發中國的民主政治改革，讓中國整體政治局勢變化，進而發動改革、結束共產黨一黨專政，共同邁向民主中國。

第二節、參與民主運動與投身政治

根據前文所述，香港的民主發展首先是由港英政府所推動。1984年政府發表《代議政治綠皮書：代議政治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提出開始在香港啟動代議政治之改革，其中也提及香港立法局最終會引入直接選舉議席之部分。之後，港英政府接連開放區議會、市議會與區域市政局之部分直選，對此許多香港市民自發組織壓力團體，參與對於代議政治、全民普選，與在《基本法》中確立民主政治制度之要求。在此民主運動發展初期，司徒華與教協會扮演推動者之重要角色，由於教協會為當時全港最大職工會，擁有最強動員能力，與充足之資源，在司徒華帶領下一直視爭取民主政制為己任。在政府發表《綠皮書》後，教協會聯同香港其他數十個民間團體召開大會，針對此次政改方案提出意見，希望要求政府進一步的還政於民，推動直選。

此次的會議可以視為香港市民首次能夠團結一心，對於切身政治議題的未來提出己見，向政府表達訴求。是對應政府首先提出政改方案之後，民間跟進爭取民主的第一步。

²²⁴ 摘錄自司徒華，(1987)。沒有直選，就不會有民主政制。司徒華於立法局對《代議政制發展檢討綠皮書》意見動議之發言，《十年風雨聲》。



進入政壇

隔年的 1985 年，對司徒華來說是踏入政壇的第一步。他獲北京之邀出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之委員；同年他又投入首次開放民選的立法局功能界別席次選舉，而晉身立法局。這兩件大事的同時降臨，對他可說意義重大，代表能夠在當時最主要兩個政治舞台上，為港人爭取民主改制，而今日《基本法》法中可說有著部分關於民主制度、保障法治與人權的條文，都得歸功於華叔與李柱銘之努力。另外，投身政壇也包括其個人體會之增長，在當選議員進入政府建制後，更接近權力核心，司徒華獲得新的視野；而到北京參加《基本法》草委會也使他得以與背景各異的人共事，在中國內地的經歷與見聞幫助他更為確信自己的信念，時年他 54 歲。

在 1980 年代初，香港民主意識初步開展，教協會以全港最大工會之姿積極參與其中，而時任教協會主席與小學校長的司徒華則同時成為香港工會及教育界之代表人物，因而變成中共欲拉攏的對象²²⁵。司徒華先是被邀請到北京，參加《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儀式的觀禮，再進而被委任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之委員。此委員會負責起草《基本法》之條文，邀集成員包括香港及內地菁英人士，但香港民主派中只有司徒華與李柱銘兩人被北京所邀請，這也是司徒華首度與李柱銘相識，往後兩人共事數十年，同為香港民主運動的領導人物。當時司徒華雖然已對中共失去信任，但仍然抱持著一絲微薄期待，他希望透過進入草委會，能夠實際的為爭取一個民主回歸的香港《基本法》而努力。

司徒華說：「參加草委，可以爭取一個比較合理民主的《基本法》，對香港有

²²⁵ 八十年代中英談判及開始制訂九七回歸後的政制安排時，中、英雙方竭力拉攏華叔及其他本土社運領袖，軟硬兼施希望華叔等加入他們的陣營，好讓自己在談判中能打民意牌向對方施壓。參考自蘋果日報專欄，(2010)。《蘋論：與華叔一起走好民主每一步》。

利，所以我們願意參加，不論有多大成效，都希望盡自己最大的努力²²⁶」。華叔秉持著對香港的愛，與對民主政治的渴望，因而願意拋下對中共的成見，繼續背負港英政府對他「中共同路人」之指控，進入北京籌組的草委會，為港人權益發聲，要求民主政制。

現居美國的中國知名美學家高爾泰²²⁷曾說：

在草委會的一次宴會上，即席發言者，多為黨中央背書，言畢眾人鼓掌支持，一如人大政協的場面。司徒華先生起立，講了一個老國王尋找繼承人，最後發現只有全民直選國王，才能長治久安的故事。話音落下，眾人面面相覷。整個『白虎堂』上，一片鴉雀無聲。我想像那個景觀，不由得肅然悚然。我覺得那個畫面，應當永留青史²²⁸。

華叔明瞭自己勢單力薄，起的作用也許不大，但縱使成效有限，司徒華與李柱銘仍然在草委會中堅持為民主所努力，向北京爭取普選，就是希望能讓港人與世界聽見，了解香港正在追尋一個民主的政治制度。

同時，在港英推動代議政制改革下，香港立法局首次增加功能界別議員之民選席次，而司徒華把握此次機會，以其在教協會與香港社會中廣泛的影響力，決定參選此次選舉之教學界功能界別，而晉身立法局議員，一做就是十八年。司徒華表示，決定參選的原因是他認為這是他的職責，身為最大工會教協會之領導，自然應該在此香港回歸、北京承諾未來將由港人治港之前夕，挺身而出參加選舉

²²⁶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252 頁。

²²⁷ 高爾泰為中國知名美學家，前後任職過敦煌文物研究所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並且在蘭州大學與南京大學等學校任教。一生多次遭受批鬥，包括在文革與六四事件當中，後來在司徒華的幫助之下到美國定居。

²²⁸ 出自高爾泰，(2008)。我所知道的司徒華，《青山不老》三言堂結集。

進入政府建制，以確保港人治港之實現。



在立法局議員全屬官方委任的年代，司徒華就一直努力爭取普選，此次代議政治政改方案可說露出一線曙光，儘管此次立法會選舉並非他所堅持的全面普選，但他卻不介意成為第一屆功能組別立法局議員，尋求進入政府建制，透過在立法局內與教協會「內外互動，內外呼應」，以發揮最大的影響力。從這裡可以看出他願意以務實態度，一步一步的往理想前進，而這也呼應了他先前所提及「鬥爭不可有畢其功於一役的急躁輕敵之心態」。香港星島日報曾有過一段評論，摘錄如下：「當年司徒華做不做議員，他堅守的原則，不是即時的直選與否，而是絕對不肯在就職誓詞中效忠英女皇，結果成功令港英當局提供另一版本的誓詞供選用。由此可見，司徒華務實爭取民主，目標不變，技術上可以妥協²²⁹」。

民促會成立與爭取直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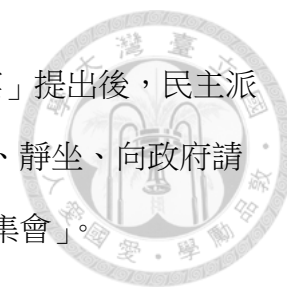
1986年，香港數十個社運及壓力團體決議聯合為爭取香港民主與直選制度發聲，組成「民主政制促進聯合委員會」，即民促會，是第一個民主派聯盟，做為領導和推動民主運動的主要組織，也是日後香港泛民主派之前身。民促會成立之後，司徒華與李柱銘成為主要的領導人，召開「爭取民主政制高山大會」，共上千港人參加。大會通過「一九〇方案²³⁰」，訂出1988年立法局議席要有一半由直選產生的目標，即「八八直選」之爭取。這是香港歷史上首次由公民提出一個具有民主前景的政治訴求，由於當時在港英政府推動下，市議會與區域市政局選舉已經逐漸開放，於是香港民主派希望把握此機會，進一步的爭取全面直選。

如第二章提及，民主派「八八直選」的訴求，事實上面對許多障礙，包括來

²²⁹ 出自星島日報，(2011)。《政壇掀風雨，一生走我路》。

²³⁰ 此由190人簽署通過的「190方案」，內容主要包含兩點：一、立法機關成員不少於一半由直接選舉產生。二、行政長官由全港一人一票普選選出。

自港英政府、來自北京，與來自香港社會內部。在「一九〇方案」提出後，民主派前後發起多次行動以傳達爭取直選的訴求，諸如舉辦政治論壇、靜坐、向政府請願等，更曾發起上萬港人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爭取八八直選集會」。




1987年，港英政府對其所提出的代議政治改革，發表《1987年代議政制發展檢討綠皮書》，就香港代議政制的發展作出檢討，並向市民諮詢對1988年於香港立法局引入直接選舉議席的意見²³¹，這或許可視為對民主派要求直選的回應。接著政府委託民意調查機構成立「民意匯集處」，進行公眾對於直選意見之民意調查，同時香港民主派與保守派也針對八八直選議題展開辯論。爾後，民意匯集處指稱其調查結果顯示「有七成市民反對八八直選」，但這明顯與民主派蒐集獲得22萬餘民眾簽名表態支持八八直選、以及其他民意調查機關所執行調查之結果有甚大差異，引起社會廣泛之質疑。

對此，司徒華與李柱銘均表不滿，決議各自帶隊前往北京與倫敦進行訪問遊說，向雙方政府實際反映香港人民的意願，希望他們能夠重視港人盼望直選的心聲。另一方面，時任立法局議員的司徒華也多次在議會殿堂上表達爭取八八直選之訴求，同時也對「民意匯集處」所做之調查方式與調查結果提出質疑與反駁，他表示這是身為民選議員所應該盡的責任。在立法局對於「民意匯集處報告書」的動議辯論上，他對於報告書的結果表達不滿，希望政府提出新的調查方案，並提出訴求，節錄如下：

主席先生，我向你和行政局建議：

- 一、聘請獨立顧問公司，對《報告書》進行評估，以供你和行政局參考，並向市民交代。

²³¹ 參考自維基百科，八八直選條目。

- 
- 二、就八八年是否應舉行直選，進行全民投票，以取得最準確的真正民意。
- 三、只要撥開雲霧，以公正無私的立場和排除干預的勇氣去評估，《報告書》已有足夠的資料去確定，民意正如八四年《白皮書》所說：『絕大多數的香港市民贊成在八八年立法局有一定數量由直接選舉所產生，而到九七年則有頗多由直接選舉所產生的議席』。
- 四、因此，行政局必須在《白皮書》中，作出在八八年舉行立法局直選的決定²³²。

另外，司徒華曾對時任港督衛奕信（David Clive Wilson）於1987年之「施政報告」提出評論，評論中除了表達對八八直選之訴求，也包括質疑民意匯集處的調查方式與報告之公信度：

《民意匯集處報告書》，我認為是不公平的，有很大的誤導性……把八八直選排列到最後，與其他的三種選舉並列，擾亂視線，分散注意，製造矛盾，以此去分散縮小支持八八直選的百分比。我們要問一問：為甚麼要厚此薄彼？政府曾再三強調的公正的立場何在？²³³

同一時間，代議政治的啟動引起社會上各種支持與反對的聲音出現，特別是親中共、偏向保守派與建制派的社團與組織，他們提出各種反對代議政治、特別是反對直選的論點，包括所謂「經濟繁榮論」、「公民教育論」、「違反中英聯合聲明論」、「銜接論」、「循序漸進論」等²³⁴，與民主派產生了辯論與交鋒。反對派的聲音表現在社會上，也出現在議事殿堂內部，司徒華自然義無反顧扛起重擔，對

²³² 出自司徒華，（1987）。不要歪曲市民對「八八直選」的立場，司徒華於立法局對民意匯集處報告書和監察委員報告書動議之發言，《十年風雨聲》。

²³³ 出自司徒華，（1987）。評論一九八七年的港督「施政報告」，《十年風雨聲》。

²³⁴ 出自代議政制發展的大倒退，司徒華於立法局對《代議政制今後的發展白皮書》動議辯論之發言，《十年風雨聲》。詳細反對論點不加詳述。



反對派與保守派所提出的論點進行辯護與反擊。

經過香港社會各界情緒高昂之激辯後，1988年政府表示諮詢調查工作完成，發表《代議政治今後發展白皮書》，表示「雖然市民對在立法局於三年後加入若干直選議席此項原則，表示支持，但是在實行時間上則有歧見，政府決定在1991年採用直接選舉方式，選出十名立法局議員²³⁵」。如此決定令香港民主派十分不滿，認為政府忽視民意，並且表示這是港英與北京妥協下的結果。後來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在回憶錄中證實，1987年民意匯集處之調查報告確實是中英雙方遵循私下之共識，刻意扭曲民意，以獲得談判籌碼的結果²³⁶。雖然最後1988年的立法局選舉並未能夠有直選議席，但民主派對於爭取八八直選的努力，不但加深了港人對於民主政治的認知，在與保守派的攻防辯論中也是一場公民社會中政治參與的示範，並且間接催生了1991年立法局選舉中總共18席地方直選議席之開放，是為「九一直選」，民主派在此次選舉中贏得勝利，稱其為「香港民主政制路上象徵性的一步」。

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出直選議題上，在那些反對派、保守派背後所代表的，事實上亦是北京的意志之展現。當時中方正與港英就香港回歸與《基本法》議題進行談判，而香港的回歸亦已成定局，因此北京積極的在香港展開佈局，拉攏工商界人士，培植親共建制派政黨與議員，加上原本就存在的地下黨組織，漸漸形成強大完整的掌控力量。對此，司徒華心裡十分明白，回歸後香港的民主進程最後還是必須看北京的意思，因此他說了「二十年在野」之概念，表示香港民主前路是漫長且崎嶇的，回歸後一切政治事務與決策權都掌控在特區政府、掌控在行政長官手上，即使行政長官直選了，但背後仍然有人大常委會、有北京的控制與干預。但縱使如此，香港發展民主還是不能停止，要靠點滴腳步積累，要靠自己

²³⁵ 出自香港政府，(1988)。《代議政治今後發展白皮書》

²³⁶ 出自 Chris Patten, 《Not Quite the Diplomat: Home Truths about World Affairs》.

努力爭取，只有建立公民社會與健全的群眾運動體系，「先使得中國本身民主化起來，香港才能貫徹民主」，這就是司徒華的堅持與理想，盡其一生在這條路上奮鬥。



第三節、六四事件與支聯會的創立

1989年的六四事件，成為司徒華一生的轉折。由於中共血腥鎮壓民運，司徒華與李柱銘共同表示「不為一個盡失人心的政府做事」，而一起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正式與中共決裂。他們在香港創立「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即支聯會，為香港最大和最具聲勢的反共民間組織；其後更參與成立香港民主同盟，正式和北京抗衡，宣示爭取民主改制、為六四事件平反的決心。

我們知道，司徒華在早年時期曾受中國共產黨宣傳之進步改革思想影響，因而嚮往共產黨的「新民主革命理論」，更曾實際加入中共在香港的地下黨組織，並參與創建、領導學友社的活動，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帶領中國走向繁榮昌盛的希望。雖然之後曾受中共的欺騙與利用、令他感到失望；並且這些年來也耳聞目睹許多內地的風風雨雨，諸如反右、文革、批鬥等，這些事件裡中共的迫害人權與缺乏法制精神在在讓司徒華看清中共的本質。

不過，在1980年代香港公民意識興起之時，司徒華仍然對中共寄有一絲期望，希望能夠藉由他自身的努力，向北京爭取到一個回歸後仍能保有法治與人權、並且擁有民主政制的香港《基本法》，這也是他之所以應允參加《基本法》草委會、並且私下與中共人士保持接觸的原因。司徒華在他的回憶錄中表示：

我和中共斷絕了組織上的關係，但我仍未採取決裂的態度，心中還是對中共有一些期望。有時，一些中共人士仍會私下找我，瞭解我對一些社會問題的看法，

我亦不吝提出見解。甚至在一九八五年，我首次參加立法局教育界功能組別選舉時，也私下跟新華社方面打招呼，聽取他們的看法，回應是支持我參選²³⁷。



因此政治評論家桑普也曾在他的文章中評述：「司徒華的心態上與中共若即若離，行為上與中共藕斷絲連²³⁸」。

但在六四事件之後，司徒華不但正式與中共決裂，更走上畢生反對共產黨一黨專政的道路，未曾再踏上其熱愛的祖國大陸土地，為其一生中影響最鉅事件之一。蘋果日報專欄曾評論：「他堅持用自己的下半生，走這條爭取民主中國的不歸路，更成功帶領支聯會過渡九七，令香港成為中國土地上，唯一數以萬計市民可採取公開形式悼念被中共屠殺的無辜生命之地方，也為華叔贏得海內外民運人士的崇高敬意²³⁹」。如此大的轉折其中來由究竟為何？而又該如何嘗試解釋司徒華的心路歷程？便是值得探究的課題。

六四事件與司徒華心態轉變


1989年4月中共前總書記，也是中共黨內開明派代表的胡耀邦病逝，知識分子與大學生基於對他的懷念而發起悼念活動，但活動在短時間內迅速擴大，許多市民百姓也加入聲援，演變成爲要求反貪、批評政策與時局，與要求向政府對話，並開始在天安門廣場聚集抗爭，成爲中共自建立政權以來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接著更引發了全國性的示威遊行，是爲八九民運。司徒華表示從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集結時，就相當關注這場運動，而民促會也主動前往北京表示支持與聲援。

由司徒華在八九民運初期的行動與言論，可看出他對這場運動之寄予厚望，

²³⁷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101頁。

²³⁸ 出自桑普，(2011)。司徒華的中共情意結，《開放雜誌》網路評論。

²³⁹ 出自蘋果日報，(2011)。2011年1月3日蘋果日報社論專欄，《耗盡半生爭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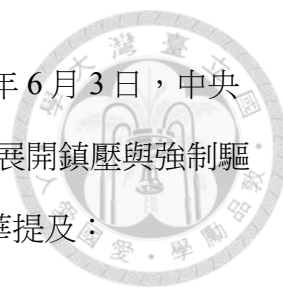


由於運動規模之大、參與人數之多，並且群眾提出反貪、解決經濟問題，以及直接與領導人對話如此單純之訴求，或有機會成為打開中共政治改革之門的一記鐘聲，自此往司徒華理想之中國進步道路邁進。因此司徒華對八九民運極為看重，他的民族愛國情緒升高，同時投以大量關注，而這或許也可以部分說明了，日後中共對於如此單純的學生運動採取血腥鎮壓給司徒華所帶來的衝擊、震驚與難受，因為他對中共存在的最後一絲信心，竟然被用如此殘酷無情的方式給摧毀，對他來說是無比的痛心與憤怒。

時間到了 5 月底，天安門廣場前聚集的群眾快速增加，達到 10 萬多名之譜，而北京政府卻宣布戒嚴並進一步調動軍警進入北京城，這代表政府不但不重視人民表達訴求，反而將其視為對中央權力之挑釁，希望藉由高壓強硬手段鎮壓而結束這場群眾抗爭運動。香港市民對此感到十分憤怒，在當時港人已經歷過社會上數次抗爭與群眾運動之洗禮，公民意識顯然趨向成熟。他們樂見北京的學生與知識份子發起改革之訴求，起而為爭取權益而努力，但沒想到在北京的他們卻遭受如此對待。因此港人也均起而表態支持北京的學生運動，在司徒華、李柱銘等人領導下，發起一連串支援北京民運的遊行、請願活動，包括 5 月 21 日的百萬人上街，此或許為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遊行²⁴⁰。而在 21 日遊行當天最後於跑馬地集會時，民促會宣布將擴大組織、籌募人力與經費，繼續支援北京民運，聯合其他多個團體成立「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司徒華當選主席，並且這成為他餘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隨著支聯會成立，同時北京學運的狀況快速轉變，而司徒華也緊盯情勢發展，全力投入支援工作，協調佈署工作、聯繫人員、募集資金，與舉辦遊行活動等。據司徒華之描述，在那段時間裡，他投身支聯會的工作甚至優先於在教協會

²⁴⁰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297 頁。



的工作處理，可看出其對於北京民運的重視與付出程度。1989年6月3日，中央下達清場令，預先調集的20萬人軍隊開進北京城，真槍實彈的展開鎮壓與強制驅離，爆發嚴重血腥衝突，造成死傷數以千百計²⁴¹的慘劇。司徒華提及：

6月4日凌晨，軍隊開始屠城，我感到極端震驚和無限悲憤，從未有過的哀傷，但又竟然哭不出來。那夜我沒有睡過，全晚都在看電視，定睛盯著螢光幕，當時有很多香港記者仍在北京，他們拍了很多現場的畫面，即時傳回香港播出。我看著那奔馳的坦克、掃射機槍的士兵、群眾推著裝載死傷者的板車、攔阻坦克前進的無名英雄…極端的震驚和無限的悲憤，填滿了胸膛、腦子、血管、整個身體。我從未有過這樣沉重的哀傷，卻流不出眼淚，只咬緊牙關，握緊拳頭²⁴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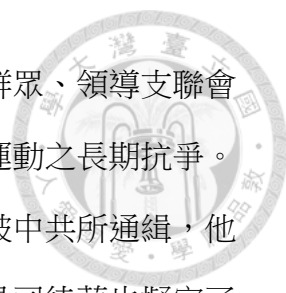
從上述文字段落間，處處可看出司徒華的血淚，複雜情緒充滿其中，包括：驚訝、憤怒、哀傷、疑惑…等，應是筆墨所無法形容。六四的血腥鎮壓、「中國人槍殺中國人」，用軍隊、機槍、坦克去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與民眾，如此令人難以相信的慘劇，引起廣大國人與國際間譁然，各界紛紛出現抗議聲音，發起遊行抗爭等活動，國際上也對中國此次事件的處理方式表達不滿。由這樣的觀點看，相信我們可以理解華叔身為愛國之士與民運先鋒，他對此巨大的反應；也應能理解他與中共決裂，傾其餘生之力要為六四「平反」、要反對中共一黨專政與爭取民主之決心。此時儘管全港市民陷於悲傷之中、司徒華亦情緒甚為震盪，可說瀕臨極點，甚至於6月4日當天的「黑色聲討大會²⁴³」上，由於過於激動而暈倒。

然而他卻仍然能夠保持思考，不被情緒影響決策，將憤怒轉移到對六四的聲

²⁴¹ 根據許多資料顯示，關於在六四事件中學生群眾與軍警、甚至是新聞從業人員之傷亡數字，其實並沒有一個正式的官方統計。由於北京中央刻意壓低事件之嚴重程度，封鎖新聞與資訊，甚至有湮滅證據焚燒屍體的動作，因此造成各方所提出的死傷數字統計多有出入。

²⁴²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300頁。

²⁴³ 自八九民運開始後，原訂每周日舉行支援北京民主運動的全港市民集會，在5月21日與28日，都有百萬人上街遊行。但在6月4日慘案發生後，原訂的集會便改為「黑色聲討大會」。



討與民主的爭取上，成為一股力量，使他得以繼續領導香港的群眾、領導支聯會的運作與組織，維持原訂腳步與計畫，繼續投入支援中國民主運動之長期抗爭。而在另一方面，他也明白許多八九民運中的領頭人物，目前定被中共所通緝，他們四處逃難、處於危難當中，若被中共捕獲肯定下場淒慘。於是司徒華也擬定了策略，運用他能掌握的所有資源去幫助這些人，這也包括了後來的「黃雀計畫²⁴⁴」秘密拯救行動。


透過以上對相關文獻之分析與描述，司徒華嚴以律己的性格已稍微呈現，加上凡事做足規劃依循策略之原則，這是他由投入社運、領導教協會等，數十年所累積的經驗體會。在六四事件中，縱使遭受如此大的打擊仍能堅定信念，或許對他而言又是一次的成長。

六四事件對司徒華來說，是其一生之轉捩點，他拋棄了原先所有一切對中共的信任與期待，轉而傾其全力與中共對抗。在中共血腥屠城、鎮壓民運之後，司徒華與李柱銘表示退出《基本法》草委會之工作，但北京方面並未批准他們的退出，反而於稍後的人大常委會中高調宣佈解除二人之草委資格，更點名司徒華是支持學運的「黑手」，這可說是中共與司徒華雙方正式決裂，而華叔在往後的生命裡亦不曾再次踏上他熱愛祖國之土地。探究這轉折的其中原因，中共對民運無理殘酷的血腥鎮壓或許是其中一層因素，但更多的或許是因為情感與心理上受到極大打擊的緣故。以下嘗試歸納分析：

一、六四事件可說讓司徒華看清了中共的本質，便是權力第一，不容任何挑戰，

即使是手無寸鐵的、本性善良的、成千上萬的人民，一樣被視為可清除。在

²⁴⁴ 黃雀行動是秘密拯救、運送 1989 年六四事件中被通緝民運人士的行動代號，「黃雀行動」在 1989 年 6 月中下旬展開，直至 1997 年前才正式結束，共救出約 300 人，其中包括吾爾開希、柴玲、封從德等民運人士，也有解放軍、公安人員等。黃雀行動的細節極度敏感，許多涉及的人物、細節，多年來一直沒有曝光。



司徒華文中提及，當年鄧小平說過一句話：「殺他二十萬人，保持二十年穩定²⁴⁵」，這表示權力高於一切，而生命則有如草芥，在黨的面前二十萬條命也不值一提。另一方面，中共的政府、軍隊都以「人民」為名，口號「為人民服務」，但六四當天「人民」解放軍竟然反過來屠殺人民，這是何等諷刺！因此司徒華說他對中共已不再存有任何期望，從此他的愛國之心與中共切割，他仍然熱愛中國，但這不等於愛黨或愛一個特定政權。

二、司徒華幼年時期曾經目睹日軍侵華，迫害中國軍民與戰爭的殘酷，對他留下十分深刻的心靈傷痕，也喚起他的愛國之心。但這次不同，六四事件是中國人屠殺中國人，遠比日本人屠殺中國人還令人難以接受、更為天理不容。而這一切只因為人民起而為自己權利發聲，中共政權感受到挑戰，竟引起同胞相殘，這是民族的苦難。筆者認為，這遠比司徒華年少時所經歷過的更為深重，所以他才更堅定自己持續在這條路上奮鬥的意志。

三、司徒華一直到八九民運剛發起時，對中共都還存在著一絲信心，但中共卻可以不顧一切的，竟然在全世界媒體、人民面前屠殺手無寸鐵、無辜的同胞，事後還企圖湮滅證跡，並對媒體下達封口令，想要掩蓋這段歷史事實。司徒華說：「六四軍隊屠城，是我始料未及。我知道，即使要鎮壓民運、鎮壓民主，也估計不會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用那殘酷、那大規模的手段，出動軍隊、坦克，用機槍掃射。這些令人沒法想像的，他們全都做了。用其他手法暗地壓迫人民，隨時都會出現，但明目張膽，做出那種殘酷、泯滅人性的事，我心中的痛，是泣血椎心的²⁴⁶」。司徒華或許感到自己被欺騙、或許感到自己無知，他一直以來都與中共打交道，認為自己對中共有相當的了解，卻沒想到北京政府竟然可以做出遠超過任何人想像的殘暴行為，而自己卻曾經嚮往

²⁴⁵ 出自司徒華，(2009)。〈殘酷的本質〉。載於《欄干拍遍》。

²⁴⁶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310頁。

如此的政權，那種彷彿心靈挖空的空白，是最沉重的痛。



支聯會的創立與展望

如前所述，支聯會是於 1989 年 5 月 21 日，在香港人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百萬人大遊行中宣布成立，由民促會聯同其他團體合併改組而成。司徒華從支聯會初創就擔任主席直到他逝世，前後共二十一年，他將此視為終生職志，甚至在退下立法會和民主黨的工作後仍然堅持支聯會的工作。因此我們可以說支聯會的從無到有，一直到今日的運作，都歸功於司徒華的領導。而支聯會也可視為是司徒華意志的代表、擴展與延續，司徒華透過支聯會將他的愛國情感、平反六四的決心，與爭取民主中國的目標，傳遞感染香港市民，將有志之士團結起來一同奮鬥，也讓新一代的年輕人不要忘記六四的教訓及經驗；而在司徒華過世後，支聯會也承載著華叔的遺志，依循他所擬定的方針持續揚帆前行。

支聯會以「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為五大工作綱領，希望延續對中國民主運動的關注，爭取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在中國早日實現。司徒華認為，「平反六四」是中國走向民主的第一步，不僅是要還死難者公道，而是政府必須承認鎮壓人民的錯誤，如此才能夠真正做到往民主開放改革。支聯會每年都於維園舉辦六四燭光悼念集會，也舉辦遊行與其他相關活動，諸如：清明節獻花、復活節民主傳訊、中秋民主燈火行動(前名：中秋民主花燈)、除夕集會與年宵攤位等²⁴⁷，希望透過這些活動將民主的意志傳佈全港。另一方面，自創會以來支聯會亦堅持支援民運，因應國內民運人士的處境，並關注維權人士被打壓之情況，進行動員及聲討。支聯會幫助了許多在中國內地面對苦難的民運人士，將他們送往海外，以逃離中共的迫害，許多受過司徒華幫助的人，都十分的感念這份恩情。

²⁴⁷ 參考自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網站。



每年 6 月 4 日的維園六四燭光集會是支聯會最重要的一項活動，而支聯會也將燭光集會視為其責任。這個活動是「平反六四」精神之傳承，每次都有數萬港人參加，由主席司徒華帶領著，在維園各舉一盞燭光，悼念六四事件中死去的人士。司徒華說，維園的燭光代表了兩個意義，第一是由於六四悲劇而流下的眼淚、第二個是盼望中國能走向民主的光明。香港是目前中國土地上唯一可以公開紀念六四的地方，而這就是支聯會在推動民主工作上特別的意義，希望讓全香港、全中國、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忘記六四事件的發生，以及中共政權的殘酷，並且盼望未來有朝一日得以在神州大地上，紀念六四。

支聯會的運作至今二十多年，由於其宗旨、綱領與實際行動，都與北京的意思「對著幹」，因此被中央及特區政府視為眼中釘，曾多次與司徒華進行對話，希望他解散支聯會、或者是停止舉辦六四紀念活動，並且也試著進行實質的阻撓與施壓。面對特區政府的打壓及政治滋擾，司徒華卻十分有信心，他說，「支聯會的成功，是在於民眾基礎鞏固與支持，他們每年都自發的來參加六四紀念活動，政府難以干預」、「一旦特區政府刁難我們，反而挑起民眾的憤慨與反抗，參與的人數只會更多²⁴⁸」。司徒華經歷數十年與政府交手的經驗，無論是港英政府或是北京，甚至是中共地下黨；再加以八十年代領導社運、教協會的經驗，司徒華得以評斷情況做出最佳決策，令支聯會在困難處境中持續運作，塑造出同樣不屈不撓的傲骨精神。

據司徒華所述，支聯會能夠平穩過渡香港回歸、並持續運作至今，必須歸功於支聯會平反六四、爭取民主的精神宗旨，這是民主本身的力量。此外還有三點經驗，嘗試描述如下：

²⁴⁸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331 頁。




- 一、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是義務工作者²⁴⁹，他們都另有正當職業，支聯會中上至主席下至各部門成員都沒有任何利益報酬，他們秉著相同的信念，來到支聯會一同努力。這是很重要的概念，也是司徒華所強調的，搞民運社運的人必須要先有穩定的經濟基礎，必須能夠三餐溫飽，如此一來才不容易被收買，組織成員也才能夠團結。
- 二、支聯會的財政來源獨立，有嚴謹的財務制度，自給自足，這是從教協會得來的經驗。支聯會當初是以有限公司註冊而非社團，如此才能夠接受捐款，而捐款也成為支聯會最主要的經濟來源。每年支聯會都會舉辦募款活動，例如元宵寫揮春、中秋民主夜、維園燭光集會等，司徒華更是會帶領重要人士出訪歐美，宣傳香港爭取民主的意志，亦向華僑募集所需款項。
- 三、支聯會領導結構穩定嚴謹，組成一個常務委員會，成員來自多元之背景，包括：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區議會議員、大學教授、商人、工人、大專生等等，兼容各年齡層、各職業別的經驗與思想智慧，但各種意見又能夠被多元接納，可說為全面性的組合。

總和以上，支聯會的各方面運作，乃至於組織性格，可說處處見到司徒華的影子。政治評論人艾克思曾評述：

二十年來香港支聯會的團結與堅持，與司徒華嚴格的個人操守以及長遠的戰略眼光是不分開的。嚴格的律己律人，保持了支聯會的道德高度而被人敬仰…每年紀念「六四」的遊行與燭光晚會已形成制度，到現在已經開花結果。近來香港

²⁴⁹ 全支聯會只有一位受薪職員，負責日常工作。

「八十後」青年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有相當程度就是這樣的傳承教育的結果！²⁵⁰



最後，對於「平反六四」，司徒華盡其一生努力，縱使到他生命結束為止，這個理想仍然沒有能夠實現，但香港以及香港市民著實改變了許多，為爭取民主政制建構一個公民社會化具備的環境。司徒華生前表示，他並不在乎是否能在有生之年見到「平反六四」的那一天，因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先生，都沒有看見自己的信念的實現」。他認為堅持理想、勇敢前進，不輕言放棄，才是人生的重點與意義，這樣，「信念雖然沒有看見成功，卻成功了自己的生命」。就有如他曾說過的名言「成功不必我在，功成其中有我」，意即「不計較成功時，自己是否仍然活着而看得見；計較的是，當事功完成的時候，其中有我的一分的努力²⁵¹」。

然而，由於對此理想的大愛，司徒華也表示了自己的期望。他認為六四最終一定會平反，因為民主是世界政治的潮流，被認為是最適合的政治制度，因此全人類必定都會投入民主懷抱，中國也不能例外，只是時間早晚問題。他點出了一個時間：2022年，由於這年是中共第五代領導集團即將交班的時刻，此時已經沒有強人了，革命建國元老勢力也已減弱，黨內部的權力鬥爭必定會比2012年更為激烈。司徒華說：「在這權力鬥爭中，或會有一方，利用『平反六四』，來打擊對手，提高自己的聲望。這一方，大多是手上沒有鎮壓六四的血漬的²⁵²」。

在另一方面，現階段中國社會逐漸開放，中西思想交流，傳播媒介的快速發展、許多年輕人出國留學也有了新的體驗和思想衝擊。我們可以看到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有了公民意識的醒覺，是一個慢慢進步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到了2022年將更為壯大。司徒華認為，成熟發展的公民社會加上政府內部的權力鬥爭，當

²⁵⁰ 出自艾克思，(2010)。《高風亮節司徒華》。

²⁵¹ 出自司徒華，(2009)。〈答有關六四〉。載於《欄干拍遍》。

²⁵² 出自司徒華，(2009)。〈13年後六四或會平反〉。載於《欄干拍遍》。

兩者結合時，或許就是「平反六四」與政治改革的契機。



第四節、民主黨成立與香港回歸

民主黨的成立

八九民運與六四事件對香港社會造成很大衝擊，也使得港人對於回歸中共統治感到恐懼，於是更多的人起而參與政治、關心自己的前途，香港市民整體政治意識更為提高，接受更深一層政治化之洗禮。另一方面，八八直選爭取行動的失敗，令香港民主派人士決議重新統整組織，以壯大力量。因此 1990 年在李柱銘倡議之下，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正式成立，由李柱銘出任主席，而司徒華則為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和黨鞭。據司徒華自己表示，這段期間的工作上，他與李柱銘有個默契：港同盟的工作由李負責，而華叔則多投入於支聯會事務。這是由於司徒華認為自己「較為了解政治運作與中國共產黨」的緣故，但雖說如此，教協會仍然出了許多的資源給港同盟，而司徒華也代表港同盟在直選戰場上挑戰對手。

由於八九民運的效應，使得港同盟除了來自原本民主派之外，也集結了來自六四事件後反對北京政權的聲音，同時包括在港的親國民黨人士等，成員可說來自各方各界。香港民主同盟並非預設為政黨組織走向，而是香港民主派人士在爭取八八直選落空後，希望就 1991 年的三級議會選舉(香港區議會選舉、市政局選舉及立法局選舉)，建立屬於民主派的聯合基礎陣線，集合力量投入這些選舉之中。

在 1991 年立法局的首次地區直選，司徒華決定由功能組別議席轉戰直選議席，以代表更多的選民意，這是他首次「打直選的仗」。選舉的結果，港同盟果然發揮預期的團結力量，加上八九民運衝擊與蘇聯東歐共產政權解體影響，港同盟在

總共十八席的直選議席中，拿下十四席，得票率超過九成，為議會中第一大黨。親中人士與黨派在此次選舉中全數落敗，港同盟再加上其他民主派如匯點的戰果，在立法局中總共取得二十三個席次，民主派在議會中佔有絕對優勢。



觀察此次選舉的成果，可解讀為港人面對著回歸的未知，以及八九民運被鎮壓的影響，對於政治議題的投入與民主政制的關注都顯著提高。此外，九一直選過後，香港政黨政治急劇發展，許多以參與政治為目的之組織與團體紛紛成立，也代表香港往公民社會的發展又再進了一步。司徒華認為，此時港人的民心顯然是傾向民主的，也因此港同盟挾著廣大民意，在議會為市民發聲，影響政府施政決策，並且持續的爭取全面直選。

1991年選舉的結果令倫敦感受到香港市民日漸高昂的民主情緒，再加以在談判桌上北京的壓力也越加沉重，於是英國決議於1992年派遣未曾與中方打過交道、同時也是時任英國首相馬卓安（John Major）好友的政治老手彭定康，來港出任末代港督一職，負責推行香港回歸前的新一波政改措施。彭定康甫上任即採強人作風，不與中方妥協，他提出新的政改方案，被視為具有不低的民主成分，利用了《基本法》的灰色地帶來盡量擴大公眾政治參與的空間，主要體現在1995年的香港立法局選舉制度上（詳見第二章）。此政改方案令政壇又掀起一波討論動議，民主派與保守派各擁立場，同時亦令北京大表不滿，要求英方撤回此案。

在北京與香港親中派的壓力夾擊下，民主派為了爭取彭定康政改方案的通過，感到必須再一次的整合力量，以拉攏偏中間路線之溫和派勢力。1994年，港同盟與壓力團體匯點合併成「民主黨」，司徒華則為常委，但亦扮演「黨鞭」之角色，他說：「這個職位主要是管黨的紀律，尤其是議會中黨內議員的紀律²⁵³」。民主黨

²⁵³ 出自司徒華，（1997）。〈「鞭」與「也」〉。載於《捨命陪君子》，三言堂結集。。

的章程中並未明確描述黨鞭的職權範圍，因此司徒華謙遜的說他並沒有甚麼權力，但事實上司徒華在黨內一直保持著很高的影響力與地位，是維繫著民主黨與泛民主派團結、黨內各派系得以整合的一股力量。



香港迎向回歸

香港回歸的前幾年，整體政局與政治情勢大抵以彭定康政改方案爭議、中英雙方十七輪談判，以及對於普選的爭取為主。司徒華除了持續投入教協會、民主黨與支聯會的事務運作，也在立法局中多次就政治事務與普選發言，還前往美加等地募款與爭取僑胞支持，可說是全心投入、鞠躬盡瘁。

1995 年的立法局選舉彭定康不顧中方反對，堅持根據政改方案而舉行，包括降低選民年齡限制，與新增「新九組」的功能界別，讓整體香港的選民數量大為提升，接近直選的條件。民主派在此次選舉中囊括共 31 個席次，仍然大勝當時北京極力培植與拉攏的親中派，民主黨仍然為第一大黨，司徒華說，此次選舉結果再次表示了香港市民的心聲。

但北京不能接受如此的結果，決定推翻此次選舉，放棄「直通車」，不讓 1995 年選舉這批議員過渡九七到特區立法會，而另外設立「臨時立法會」取代之。對於北京違反中英聯合聲明，推翻原有立法局之行為，民主派表示強烈抗議，拒絕加入臨時立法會，絕大部分的民主派立法局議員為反對臨時立法會，於 1997 年 6 月 30 日集體辭職「下車」。也因此從 1995 年立法局選舉到 1997 年香港回歸的這段期間，民主派盡其全力希望維持穩定的政治過渡，民主運動的焦點也放在反對直通車被毀和臨時立法會之上。

對於彭定康，司徒華對他頗有正面評價，認為他的確為香港開拓新氣象，無

論是實質的施政，或是其個人行為操守與施政風格，都影響香港至今。對於他的政改方案，司徒華有過這麼一番說法：



我覺得他的政改方案，對香港人爭取民主有相當大和深遠的影響。雖然最後被北京的臨時立法會推翻，但已對香港人有很多啟發和思潮影響，讓大家認識到立法會的議席和遊戲規則，可以透過不同的方法和手段爭取，為 2009 年泛民主派的政改方案，奠定了基礎²⁵⁴。

九七回歸，是香港近代史上最為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象徵著政治轉移、權力更迭，香港回到既熟悉又陌生的中國懷抱，百多年來的殖民政治就這樣走入歷史。對司徒華來說，這更是他盼望已久，民族情緒滿懷的時刻，他說：


我一直支持回歸。有人曾這樣質疑我：你既反對一黨專政，為甚麼又支持回歸呢？我的回應是：我生於斯，長於斯，老於斯。因民族的恥辱，受庇於殖民地，未能與祖國的同胞們共赴苦難，心中有愧。我願意與他們一起，共同奮鬥，爭取美好的明天²⁵⁵。

在民族情感的另一方面，他也心心念念著香港的民主、法治與社會，希望九七之後能有一個平穩的過渡，在自由、法治與人權上，都能夠維持香港回歸前之高度水準，這也就是「不撤退、反倒退」的精神。

最後，以司徒華 1994 年於立法局就「1995 年立法局選舉的具體安排」所進行二讀辯論時之發言，作為他在香港回歸前對於民主及直選發展期望的總結：

²⁵⁴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281 頁。

²⁵⁵ 出自司徒華，(2007)。〈我讀「疾風驟雨中」的周南〉。載於《煙雨平生》。



今天是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三年後便是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九日，香港百多年來的殖民地歷史只剩餘一天，再過兩天，香港便變成特區。主席先生，今天是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九日，這是歷史性的關鍵日子。說它是歷史性的關鍵日子，並不是說三年之後便須面對一大變化，而是今天本局要以香港人的名義作出一個決定，這決定反映出香港人究竟以何種態度面對九七。我們將是屈膝、叩頭、爬行朝向九七，抑或是挺起胸膛、無所畏懼捍衛「一國兩制」、「高度自治」而走向九七呢？今天不單是香港歷史性的關鍵日子，對於立法局每一位議員來說，也是歷史性的關鍵日子。這日子反映出他是否憑著良知來反映港人的意願，代表港人的利益去投票；抑或是昧著良心向權勢投降，為著個人的政治、經濟利益而投票？我相信香港以外的人是不會了解本局組成的複雜成分，一旦本局作出決定，他們就認為是反映了港人的意見。我們每一位議員都應本著良知去反映港人的意願，代表港人的利益而投票，不要使全世界的人從今天本局的決定就認為香港人是自暴自棄，自己不願意要民主的，自己願意甘心屈膝、叩頭、爬行的²⁵⁶。

²⁵⁶ 出自司徒華，(1994)。〈以甚麼態度面對「九七」〉。載於《十年風雨聲》。

第五章

司徒華與香港民主的答案



前言


九七回歸後，香港主權正式移交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依照《基本法》之原則而行使治理。雖然在中共的承諾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自治權限確實高於其他內地省市或行政區，但在香港內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體制矛盾衝突很快顯現出來²⁵⁷，對於港人來說，分隔百年的文化、經濟、思想，所形成的差異也逐漸發酵。

在實際的政治制度方面，特區政府同殖民政府般，採取行政主導之制度走向，立法會的權力經由《基本法》之設計同樣被限縮，難以對行政權形成制衡。回歸後首年的「臨時立法會」由於多為親中人士組成，因此對於行政長官之施政措施可說是積極支持與配合²⁵⁸。而 1998 年的立法會選舉，也由親中建制派取得優勢，立法會依然保持向特區政府傾斜之趨勢。另一方面，中共在《基本法》的制訂上就已經表示不希望香港走向一個成熟政治社會，有蓬勃的政黨政治與公民思想發展，以避免「過於快速」之民主發展對特區政府維持執政之穩定造成影響。基於以上總總原因，不管在香港特區政治體制或是選舉制度上，都有著不利民主發展的設計（如同第二章所提及），甚至選舉改採有利小政黨發展的比例代表制²⁵⁹，進一步的造成泛民主派分裂，香港的民主發展可說實質的陷入了困境之中。

²⁵⁷ 參考自鄒麗泳，(2006)。《「一國兩制」下香港政黨發展—民主黨個案研究》。

²⁵⁸ 參考自劉兆佳，(2000)。〈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設想與現實〉。載於劉兆佳主編，《香港二十一世紀藍圖》，(1-36)。

²⁵⁹ 詳可參閱香港選舉制度相關研究論文或書籍，本文不加以詳述。



面對著回歸後諸多不利民主發展與深化的因素，以及泛民主派本身的危機，對於司徒華與香港民主派來說自然無法接受。他們表示必須加快爭取香港民主政制之腳步，這對於現狀的香港政治來說才是最好的制度；並且在另一方面，香港民主派人士對特區政府「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之承諾，亦抱持不信任之態度，特別是對於特區政府背後的中共政權，司徒華說他對於中共太為了解，他要極力避免「港人治港」變成「黨人治港」之情況。


因此司徒華在此時亦持續扮演重要角色，以其身為多個重要團體的主席、擔任立法會議員職務，以及在民主黨中的精神領袖地位，肩負起繼續推動民主發展、維繫民主派團結，與持續向政府對話、爭取改革的責任。

本章即是在探討香港回歸後，面對著《基本法》與北京管制所塑造之不利環境，司徒華如何繼續的和政府斡旋，領導壓力團體繼續為爭取民主與普選而努力；而同時華叔年歲也漸高，在他生命的晚年是如何堅持理想，在政壇與民主黨內發揮影響力，並且寄爭取民主之期望予後人。最後，是香港民主發展的未來展望，而在今日我們所見的社運、民運當中，又看的出多少司徒華的影子？

第一節、回歸後民主發展的困境與重生

民主黨的分裂與民主發展之困境

1997年香港正式回歸、主權移交，成為中共中央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北京以回歸前「另起爐灶」成立的臨時立法會過渡九七為正式的立法機關，於是在次年的立法會選舉中重新「上車」，「打倒臨時立法會」，便成為民主黨與其他民主派成員的首要目標。



如第二章所述，回歸後的香港在立法會選舉方式上做出諸多改變，包括採行比例代表制、選舉委員會與功能界別制度上也有所改變，使得香港的民主空間大幅縮小，對民主派亦為重大打擊。《基本法》中規定了香港回歸後首三屆立法會的組成方式，而 1998 年的立法會選舉，總共要選出 60 名議員，選舉方式如下：

- 一、20 名直選議員由五個地方選區選出，採比例代表制；
- 二、10 名議員經選舉委員會選出；
- 三、30 名議員由功能界別團體選出。

民主派打著「重返立法會」之旗號參加回歸後第一屆的立法會選舉，由於司徒華等人在總辭「下車」之後，仍然堅持經營選民與維持服務處之運作，因此司徒華與李柱銘、何俊仁²⁶⁰等泛民主派戰將在地區選舉中再次獲得勝選，實現了重返立法會之承諾。不過受制於選舉制度設計的框架，民主黨縱使獲得大量選票支持，在直選議席中擁有 43% 得票率，但最後只取得了 9 個議席²⁶¹。雖然加上選舉委員會與功能組別之選舉結果，民主黨共佔 13 席，在議會中仍為第一大黨，但加上其他政黨如前線，泛民主派此次總計僅取得 20 席，其餘 40 個席次多為親中黨派所掌控，泛民主派在立法會中不再佔有優勢。

到了 2000 年的第二屆立法會選舉²⁶²，司徒華再次參選而連任，這是他最後一任的議員任期。此次選舉中，民主黨僅拿下 12 個席次，較 1998 年時少了 1 席，而泛民主派總共拿下 21 席，可看出選票與席次分散到其他新興的政團組織，這是民主黨的分裂徵兆。

²⁶⁰ 何俊仁，現任立法會議員，他自 1995 年當選為立法局議員起，便一直連選連任至今。為香港學運社運資深元老，也是民主派重要人士，曾擔任民主黨主席，以及支聯會秘書。

²⁶¹ 參考自維基百科，《泛民主派》條目以及《1998 年香港立法會選舉》條目。

²⁶² 《香港基本法》明定第一屆立法會的任期是兩年，故 1998 年產生的立法會議員於 2000 年進行改選。



在選舉制度之外，其他政治制度上的變革，也不利於民主及改革的推行，舉例如下：

- 一、行政主導的體制，政府施政核心權力以行政長官為主，這樣的政治設計是為了穩固特區政府的管治。而立法會的權力也被限縮，比如：法案必須經過行政長官簽署方能成為法律；而立法會的提案也必須經由行政長官同意²⁶³。
- 二、區議會恢復由特區政府委任之制度，行政長官一人可以委任超過一百名區議員，佔區議會總議席五分之一。而其必然為親政府建制派人士，此有助於政府在地方的管控與布局。
- 三、董建華將擁有獨立財政與土地，可說權力甚大的市政局以及區域市政局解散，由政府收回市政財政預算權及市政用地使用權，此即俗稱的「殺局」²⁶⁴。兩個市政局的議員是由民選產生，而民主黨佔有多個議席，對特區政府來說是個威脅。政府為了打擊民主黨而將之解散，失去兩個市政局的議員資源，對民主黨誠為重大打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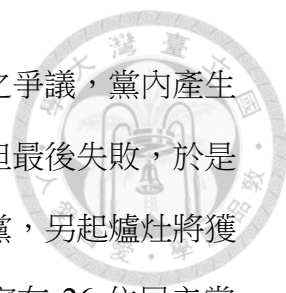
當年民主黨成立之時，是港同盟聯合「匯點」，加上學運人士結合而成。因此黨內形成三股不同勢力：相對比較保守和右傾的原港同盟人馬、中間偏左的原匯點成員、以及激進的左傾學生勢力。這複雜的組成結構與不同勢力派系之間的隱藏摩擦，就成為日後分裂的導火因子。

2000年前後，民主黨內部出現實質危機，董建華政府裁撤兩個市政局之打擊，造成民主黨內新生代議員參政之路無法發展²⁶⁵，主流派與少壯派之爭執由此而起

²⁶³ 參考自劉兆佳，(2000)。〈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設想與現實〉。載於劉兆佳主編，《香港二十一世紀藍圖》，(1-36)。

²⁶⁴ 參考自丘偉國，(2007)。《急推；緩進：回歸前後香港民主路程》。

²⁶⁵ 競逐兩個市政局的議員職位，在當時是新生代政治人物的一個從政起點。



²⁶⁶。加以面對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因資源分配、選舉名單排名之爭議，黨內產生內訌、路線分歧²⁶⁷。少壯派蘊釀爭奪權力，爭取分拆名單競選但最後失敗，於是引發一波退黨潮，因其認為在比例代表制下，出走投入新建政黨，另起爐灶將獲得更大機會。2002年4月，少壯派領袖陶君行與馮智活等人，宣布26位民主黨黨員投入「前線」；少壯派議員鄭家富及陳偉業稍後於12月底宣布退黨，至此少壯派幾已全面退出民主黨²⁶⁸。

民主黨在政治與選舉上受到《基本法》與特區政府的諸多限制，黨內亦是危機四伏，包括路線分歧、黨爭內耗、成員出走等問題接踵浮現。面對內憂外患侵擾，民主黨在議會內監督政府、爭取民主與直選的力量就被削弱了，再加上特區政府行政權集中，議會又由親中派得勢，由民主派推動的民主政治改革便陷入了瓶頸。

但在另一方面來說，香港人民的公民意識、公民力量在這十年中卻不斷提升，在資訊開放、教育普及，與壓力團體努力等因素下，群眾政治及民粹主義(populism)抬頭，民眾對於自身權利開始行使保護和追求，民情與民意扮演越來越為重要之角色²⁶⁹，創造出一個政治社會的環境。於是，儘管香港的民主在回歸初期缺乏明確的進展，但公民意識樹立、民主思想蔓延，壓力團體也發起多次具體的抗爭行動、捍衛自由與人權，加以立法會議員持續的反映民意與向政府爭取更高的自主權，這都對政府行政主導之管制權威形成挑戰。最後，香港民間蓄積已久的力量，就在特區政府接連政策失當、經濟疲軟不振，以及SARS疫情爆發等一連串重大社會事件的衝擊下，於2003年對於政府《基本法》23條立法之反彈聲浪中，一次

²⁶⁶ 參考自鄒麗泳，前述書。

²⁶⁷ 參考自維基百科，《民主黨》條目

²⁶⁸ 參考自鄒麗泳，前述書。

²⁶⁹ 參考自劉兆佳，(2000)。〈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設想與現實〉。載於劉兆佳主編，《香港二十一世紀藍圖》，(1-36)。

而具體的顯現出來。



2003 年七一遊行

2003 年的「七一遊行」是香港回歸後最大規模的一次市民抗爭活動，甚至可說是回歸後香港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在第二章曾提及引爆「七一遊行」的背景因素，這超過五十萬人上街抗議，向特區政府「投不信任票」的遊行可視為香港市民長久以來對政府、對現狀不滿的一次爆發，而民主派也希望藉此全港民意高漲之時，突破特區政府設下的重重限制，為陷入瓶頸、停滯不前的民主政制腳步添加新的動力。

司徒華在談及 2003 年的「七一遊行」時說：

《基本法》23 條立法，它剝削香港既有的自由、人權，假如通過的話，香港在民主、自由、人權、司法都會出現大倒退。這是香港人奮起反對令香港倒退之條例的一個重要行動...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推行這項立法時，那種醜惡的嘴臉和手段，激起香港人的憤怒，加上政府處理「沙士」危機時，所表現的無能管制和帶來經濟不景氣，令市民對特首董建華所帶領的特區政府，極度失望²⁷⁰。

2003 年 7 月 1 日，超過 50 萬的香港民眾在民主陣營的號召之下，自發的上街遊行，高呼「反對廿三、還政於民」口號，同時也提出「董建華下台」的訴求。香港人民對於政府的不滿與對自由、人權與民主的渴望，可以從這次遊行的訴求中看出：

老懵董下台，掃把頭下台，梁錦松坐監

²⁷⁰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284 頁。

非典危，港人更危；生活難，自由更難；人心險；廿三更險； 疫症多，狗官更多
董建華，你玩夠未？下台造福香港地
通過 23，香港唔易生

表 8：2003 年「七一遊行」中香港市民所提出之口號與訴求²⁷¹

七一遊行造成香港社會很大的衝擊，也吸引了國際社會關注。北京了解到挑戰目前香港主流民意並非上策，於是決議將 23 條立法的程序擱置，爭議方告落幕。另一方面，董建華政府管制失敗所引起之民怨，令其民意掉到低點，使得北京必須重新思考特區政府的管治路線，在維持政局穩定的前提下，董建華政府於 2005 年請辭下台，由曾蔭權接任特首。

七一遊行可說是沉寂了一段時間、已經降到低點的香港民主運動，獲得重生的轉捩點，七一遊行的成功使港人了解到只要挺身參與和爭取，就有機會得到更多的政治空間，促成政策改變。另一方面，七一遊行所帶來政治與社會環境改變，也為香港民主派注入新生命，更多爭取自由與人權的民間組織成立、更多訴求民主的遊行活動舉辦，甚至隔年的 6 月 4 日的紀念「六四」燭光晚會，參加人數都創新高。2004 年區議會選舉中，民主派立即重新得勢，他們利用時機提出 2007/2008 年行政長官、立法會「雙普選」的訴求，令特區政府、甚至是北京，必須就這個議題做出回應，引起各政治勢力的角力，以及港人對香港民主發展更加明確的認知。

七一遊行產生了一股效應與衝擊，往後幾年港人對政治參與的心態更為積極，

²⁷¹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285 頁。



從原先消極被動的自由保衛戰，轉化為進取式的爭取民主集體行動²⁷²，帶起新一波爭取民主與普選之訴求。鄒麗泳在其文中提到：

香港政治學界普遍認為，2003年「七一遊行」是歷史性變局的開始，象徵行政主導制度破產及制度發生問題，港人求變訊息相當清楚，2004年「七一遊行」則產生結構性轉變。2003年「七一遊行」混雜著反基本法 23 條、不滿政府、經濟下滑及民生社會等訴求，2004年升高層次為「還政於民」及「雙普選」，這種持續性大規模民主運動已形成結構性變化，「七一」變成香港的政治圖騰²⁷³。

司徒華於 2003 年 8 月接受《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之訪問時，提到他對於「七一遊行」後續效應的看法：

七一大遊行以來的事，很難說是危機，沒有危險。只可以說是對香港政治權力的一次大衝擊，使很多人接受一次民主的洗禮，開始反思許多問題。為甚麼在一國兩制下會發生這樣的矛盾呢？因為一方面中央沒有干預，沒有壓制香港人的要求與上街遊行，另一方面有人不遵守一國兩制原則，強制推行二十三條，破壞香港法制，激起市民的憤怒。因此，這次抗爭，是捍衛一國兩制而不是反對一國兩制²⁷⁴。

由以上言談中，仍然可以看見司徒華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交織的思想，他關心香港的民主，也關心中國的政制發展，在談論香港民主的時候會嘗試將中國與一國兩制等相關的框架帶入，呈現出他濃厚的民族主義與愛國視野。

²⁷² 出自鍾庭耀，（2003）。香港中文大學與香港大學民調中心之民意調查報告。

²⁷³ 出自鄒麗泳，前述書。

²⁷⁴ 出自司徒華，（2003）。〈民主派的策略與前景〉，《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對司徒華之訪問稿，2003年8月。載於《江山無限》。



第二節、司徒華晚年的堅持

卸任立法會議員

時序進入 2000 年代，回歸後的香港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或民生等方面，都還在尋求穩定與調和發展，但香港的民主化以及香港市民的公民意識卻已經在過去 20 多年間有著長足的進步，這都必須歸功於司徒華、李柱銘等一群民主先鋒，在很早之前就洞悉時勢，挺身而出為香港爭取民主而努力。面對一個年輕崛起的公民社會、政治社會，此時的司徒華卻已悄悄來到古稀之年，自覺年事已高的他，雖然在心態上作出一些調整，稍微減輕其工作負擔，卸下立法會議員的職務，但他仍然堅守教協會與支聯會的崗位，每年依然出席六四燭光晚會及年宵寫揮春活動，持續保持在政壇的影響力，追尋他的理想。

談及十八年立法會議員生涯，司徒華表示他「鞠躬盡瘁，貫徹始終」，並且無愧於心。也的確，十八年來司徒華在議會殿堂、在街頭，為香港市民發聲、爭取權利，與政府對話和抗衡，挺直腰桿，屹立不搖。司徒華的這些付出，港人都牢牢記在心中，也因此司徒華未曾在選舉中嘗過敗績，成為民主黨維持影響力的重要功臣。司徒華說，他以教學為畢生志業，而擔任立法會議員則是他社會服務與工會活動的一部份，並不是視為進入政壇或是成為政客的一種觀念。

2004 年，司徒華決定不再參選議員，他說：

其實，在 2000 年的那一屆，我已有意不再參選。經考慮，回歸未久，會引起諸多猜測，於是終於決定再多做一屆。2004 年，我為甚麼不再參選呢？自量年紀已老，不是主要原因。除了立法會外，我還有不少其他的社會事務：支聯會主席、

教協會監事會主席、民主黨的中委和中常委、葛量洪教育學院校友會主席兼三間屬校的校董會主席、1973年文憑教師事件時成立的教育團體聯會秘書處主席。除立法會議員外，其他的職務至今仍然擔任，這已是不輕的工作²⁷⁵。



而司徒華在談及其所肩負這麼多的職責，選擇先放下立法會議員一職之理由，他說了以下三個原因：

一、立法會議員的職務，消耗時間最多，而且往往消耗了那麼多的時間，卻得不到絲毫相應的效果。形格勢禁，不是你個人的努力就可以改變得那必然的、與己願相違的效果。尤其是那冗長的會議，硬著頭皮去聽許許多多不願入耳的言論，很覺煩厭。所以，這是我所有公務中，最不樂意去參與的。

二、這職位，很多人趨之若鶩。我不做，爭著去做的大有人在。那麼，缺我一個不缺，多我一個不多，便讓他人去做好了。

三、這職位，有名譽和金錢作報酬。我把名譽和金錢放棄了，有所損失，毫不利己，他人不能責怪我。至於其他社會活動的公職，全是毫無回報的義務工作。正因為是「義工」，義不容辭，不能像立法會議員職位那樣安心坦然辭掉²⁷⁶。

而筆者認為，或許這也與司徒華年歲漸大，加以香港政治情勢緊縮、香港民主派面對持續的分裂危機有關，雖然其本人在著述中表示此並非主要原因，但仍然不可忽視其對司徒華的重要影響。

2005年政改方案爭議

²⁷⁵ 出自司徒華，(2007)。〈「望斷天涯路一條」〉。載於《煙雨平生》。

²⁷⁶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391頁。

七一遊行所帶來的後續效應，促使董建華政府下台，由曾蔭權接任。曾蔭權的政治作風較為圓潤，也較為親民，他積極處理董政府所遺留的政府管制失當之問題，加以港人願意給曾蔭權嘗試機會，因此開啟特區政府新的治理局面。《基本法》中規定，香港於 2007 年，也就是回歸十年後，可就政治制度做檢討與修正，於是 2007、2008 年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要求便開始出現，政制改革成為民主運動的主題。2005 年，曾蔭權上任後不久便發表《政治發展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即「五號政改方案」，就 2007 年與 2008 年行政長官與立法會選舉提出修正建議。此政改方案引起社會廣泛對於爭取普選的討論，司徒華與民主派認為此方案是假改革之名，卻是實質的民主倒退。

主要具有爭議內容如下：

特首選舉委員會人數由 800 人增至 1600 人。
選舉委員會第一界別（工商、金融界）、第二界別（專業界）、第三界別（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等）各由 200 人增至 300 人；第四界別則大幅增加區議員人數，與原有的立法會議員、鄉議局代表、港區人大及政協等，合共 700 人。

表 9：「五號政改方案」對於 2007 年行政長官選舉方法建議之部分內容²⁷⁷

議席總數由 60 席增至 70 席，分區直選議席由 30 席增至 35 席。
功能界別議席由 30 席增至 35 席，當中的「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由 1 席增至 6 席。

表 10：「五號政改方案」對於 2008 年立法會選舉方法建議之部分內容²⁷⁸

²⁷⁷ 參考自《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及二零零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 - 建議方案》，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網站。

²⁷⁸ 同上。



對於曾蔭權政改方案的爭議內容，司徒華表示其反對表現在幾個方面：

- 一、新增的五個「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是由區議員中選出，但區議員仍有議席採委任產生，並且「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並未提及明確之選舉制度，包括採行一人一票或是一人多票制。如此一來行政長官可透過區議會中之委任議員而影響選舉結果，親共人士或可囊括全部新增議席，有選舉不公之議。
- 二、直選議席增加五席，但選舉制度仍然採取大選區比例代表制，如此一來親共政黨仍可以就其目前獲得選票之比例，在新增議席中取得一定的席次，依目前親共政黨約可獲得四成得票率推測，新增五席中應可取得兩席。重點在於，假使此方案獲得通過，未來政府可能依此模式逐步修改選舉辦法，增加「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以及直選議席。政府可以打著「循序漸進」民主改革之口號，但實際上卻是矇騙人民，因為等比例增加議席（親共人士可確定獲得之席次較多），亦即民主派保有之議席比例漸漸流失，等到民主派在議會中低於三分之一席次，便失去了修改法案之否決權，特區政府得以恣意修法。
- 三、在此政改方案中，只提及 2007 年與 2008 年選舉辦法之建議，對港人關心的普選時間表未有明確說明²⁷⁹。

總和以上，政改方案非但未往普選之目標前進，反而讓政府得以控制更多的議會席次，表面上「穩定漸進」的推動民主改制，事實上卻是利用制度盲點欺瞞港人。因此司徒華與民主派堅決反對「五號政改方案」，並再次發起市民上街遊行，要求政府廢除區議員委任制，提出真正的普選方案與時間表。司徒華說此次大遊行不但繼承了 2003 年七一遊行的精神與意義，並且將其深化擴展，影響港人的民

²⁷⁹ 參考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287 頁。

主意識，繼續壯大公民力量。



五區總辭風波

雖然 2007 年、2008 年雙普選的理想未能實現，但港人對於爭取普選的意識更為升高，在往後的數年中，普選議題持續的為香港民主政制發展之主軸。北京感受到港人民意之氣氛，2007 年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相關決議，提及香港可以於 2017 年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另外可以於 2020 年普選立法會之決定；而另一方面，2007 年選舉中當選特首的曾蔭權，在其第二任期開始不久，即再次提出《政制發展綠皮書》，為關於 2012 年特首與立法會選舉的政改方案。其中雖然仍否定 2012 年的雙普選計畫，但對於 2017 年普選的期望與要求，則帶有正面的意像。

北京與特區政府提出的逐步民主政改方案，亦在香港社會掀起一波波的討論，對此司徒華則表示，必須持續的關注、監督政府，以確保真普選得以實現。面對普選的爭議，此時香港政局再次產生動盪，政治風暴迎面而來。首先是泛民主派中的激進派提出「五區總辭」，發起立法會議員一同辭職，藉此向北京當局表達普選訴求，是一個相當激烈的抗爭手段。

「五區總辭」是香港泛民主派的公民黨與社會民主連線（社民連）兩個政黨於 2009 年聯合發起的政治運動，是指在五個香港立法會選區中，每區均有一位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辭職，產生五個空缺席位，然後按照香港《立法會條例》必須進行補選。公民黨與社民連以爭取「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作為選舉主題，他們希望補選能採取單議席單票制，如此令全港市民參與投票，成為變相的直選。假如五位泛民主派參加補選的議員勝選，代表他們所提出的 2012 年雙普選議題獲得相當的民意支持基礎，此次補選便成為對於 2012 年雙普選的「全民公投」，希望藉此行動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造成壓力，也引起國際關注。



對此「五區總辭」的行動，司徒華原持開放態度，表示或許支持，甚至還在民主黨內部諮詢會議上提出自己屬意的議員名單，以作為民主黨對社民連提議之回應。但不久之後華叔的態度急轉而下，變成公開表示他不支持五區總辭，也不支持民主黨參加此行動。最後五區總辭在建制派杯葛、政府表示不會參與投票，以及民主黨的消極參與下，只有約五十萬人參與投票，投票率僅僅為百分之十七。

司徒華對於五區總辭態度轉變之原因，據其個人所述，是在經過一段時間觀察之後，所做出的決定。其中包括幾個面向：

- 一、五位議員一次辭職是個賭注，假使議員辭職後無法在補選中取回議席，泛民主派將會喪失在議會中的 21 席政制否決權。
- 二、建制派議員可能杯葛此次選舉，或者是不參選。而政府也可能表示反對此次補選，認為其不具任何法律效力。如此一來要是投票率未達五成，即喪失公投之意義與公信力。
- 三、五位議員參與補選所需花費金額達數千萬，而議員辭職亦會造成助理與工作人員失業之問題。如此一來可能造成民眾的不諒解，有浪費公帑之議。
- 四、司徒華認為，此次社民連提出五區總辭的目的，是想藉此提高在泛民主派中的聲勢，並且搶奪民主黨的地位，才會採行如此激進的方法。

事實證明，司徒華的預測準確，根據當時的民調結果，近六成香港市民反對五區總辭，支持者不足三成²⁸⁰，而在親中黨團與政府的夾殺下，實際參與投票的香港公民數目更少，不到兩成。最終，只有公民黨、社民連參與今次五區總辭，泛民其他黨派民主黨、民協、街工、職工盟等均沒有參加。五區總辭並未達成預

²⁸⁰ 參考自維基百科，《五區總辭》條目內容。

期中的公投效果，但五位辭職的議員通過補選，仍然重回立法會。



司徒華說：「我反對『五區總辭』，是不同意它的手法，並不同我和民主黨放棄原則²⁸¹」。司徒華公開一呼，表示不支持五區總辭，使得民主黨在主流派與少壯派的紛爭中通過決議，此次行動採取消極態度，維持一貫的平穩作風。由此可看出雖然司徒華已年近八十，並已淡出政壇多年，但在黨內仍然保有崇高的影響力，當民主黨面對危機或爭議的時候，華叔還是會挺身而出，做大家的靠山，指引方向。另一方面，從這個事件中也看出司徒華準確的政治判斷力，由於他決定不支持激進的五區總辭，維持溫和平穩的路線，促成民主黨得以在之後的政改方案上，與中央達成共識，取得更多普選空間，並且具體提升了民主黨的民調支持度。

對於司徒華在「五區總辭」風波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星島日報社評專欄曾提及：

當「民主黨」備受「公民黨」和「社民連」壓力進行「五區請辭公投」之際，司徒華挺身反對未談判即攤牌，破解公社兩黨的捆綁策略，成功挽狂瀾於既倒，促成溫和「民主派」與中央破冰，令蹉跎多年的政制民主化終於得以向前踏步。司徒華這個行動，在民主派陣營中爭議極大，反映他無懼逆境的政治勇氣²⁸²。

香港政治評論家及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張志剛²⁸³也說：「沒有司徒華的壓陣，恐怕民主黨的領導層很難頂得住少壯派的壓力，堅持抵制五區公投

²⁸¹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432 頁。

²⁸² 出自星島日報 2011 年 1 月 3 日社評專欄。《政壇掀風雨，一生走我路》。

²⁸³ 張志剛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是香港著名的評論員、時政專欄作家、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現任香港發展論壇總幹事，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



民主黨與政改方案

在「五區總辭」風波蔓延的同時，2007年由曾蔭權提出的關於2012年行政長官與立法會選舉之政改方案，也進入諮詢與交由立法會表決的程序。當時肺癌嚴重已在接受化療的司徒華再次發揮影響力，在背後策劃與帶領民主黨與政府達成協議，最後立法會通過經由民主黨修正過後的政改方案，並於2012年選舉中實施。時任特首曾蔭權說，「通過政改方案，司徒華功不可沒」，他力爭黨友及市民認同，為香港政治突破困局推出重要一步。而這同時也被視為是民主黨與中央關係的破冰，但其他泛民主派政黨則指其為欺騙選民、背棄爭取2012年雙普選的承諾。

此政改方案大抵延用2005年五號政改之結構，在許多層面都可看出雷同之處，包括：行政長官提名機制、選舉委員會的委員人數及組成、立法會議席數目、「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方案、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和其存廢問題等。但此次中央選擇向民主黨諮詢政改意見，民主黨三名核心成員何俊仁、劉慧卿²⁸⁵及張文光²⁸⁶與中聯辦副主任李剛會面，被視為是雙方關係的一大突破²⁸⁷。民主黨在北京主動釋出善意下，提出對於2012年政改的改良方案，並且表示如果北京能就民主黨的訴求做出立場說明，則民主黨願意支持經改良的政改方案。說明如下：


普選的定義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載明的普及而平等原則。2020年實行全面普選立法會，全面取消任何形式的功能組別選舉。

²⁸⁴ 出自張志剛，(2011)。《思入風雲：鬥爭老手》。載於2011年1月4日東方日報社論專欄。

²⁸⁵ 時任民主黨副主席，現任主席。

²⁸⁶ 民主黨創黨資深成員。

²⁸⁷ 此為自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首次有民主派成員與中央政府官員作正式接觸。



全面普選前按循序漸進原則進展，2017 年行政長官選舉放寬提名門檻，2016 年立法會選舉只增加直選議席並取消分組點票。

表 11：民主黨希望中央能接受的訴求²⁸⁸

2012 年立法會新增的 5 席「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連同原有的 1 席「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全部開放投票，使在傳統功能組別未有投票權的市民能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其代表（即全港選民一人有兩票）。

取消區議會的所有委任議席。2012 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加入全數 400 多位民選區議員，並保持提名人數不多於 150 人。

表 12：民主黨所提出的改良方案²⁸⁹

在雙方往來協談磋商、互相試探底線下，政府最終開了綠燈，接納民主黨的修改建議，而民主黨亦於黨內會員大會上表決通過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正式發表《告全港市民書》宣佈對政改方案投支持票。最後 2012 年之選舉均依照修正過後的政改方案進行，為香港的政治又寫下新的一頁。

在政府所提出關於 2012 年選舉的政改方案中，如同 2005 年之方案，並未對 2012 年雙普選做出承諾，也未清楚交代 2017 年之行政長官與 2020 年立法會的選舉方式，以及功能組別存廢問題。因此曾引起泛民主派不滿，認為政府再次罔顧民意，表示強烈抗議，與將對政改方案投反對票。但在民主黨退一步與中央妥協、提出修正方案後，亦引起泛民主派中出現不同之聲音，激進民主派如社民連，即強烈批評民主黨與中央妥協是出賣民主、出賣港人，與欺騙選民，堅持及要求無

²⁸⁸參考自香港民主黨官方網站，(2010)。2010 年 5 月 24 日，《理性溝通對話，建立政改共識 — 實現 2017 行政長官和 2020 立法會的終極普選》。

²⁸⁹ 同上。



條件撤回政改方案。

縱使面對諸多批評與反對意見，甚至是泛民主派的再次分裂危機，司徒華仍然堅持推動民主黨修正後的政改方案，他說：「我不希望重蹈 2005 年政制改革的原地踏步，因為這次我看準了時勢，認為中方會接受我的建議²⁹⁰」。當時正處於一個政治權力風起雲湧的時期²⁹¹，面對香港強烈主流民意對於普選與民主的訴求，以及未來兩年可預見的政治事件，極度了解中共思維的司徒華認為北京一定會有所動作，希望打破香港多年以來的政治僵局，這就是民主黨的契機。因此在「五區總辭」風波過後，眼見中方願意與民主派溝通，他準備與構思了對於此次政改方案之修正建議，並與民主黨高層人士商談相關策略，授意民主黨主席何俊仁與北京交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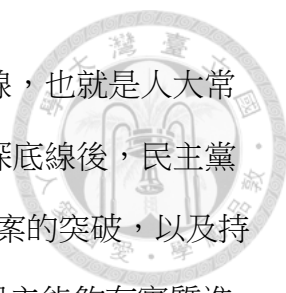
如前所述，在五區總辭中民主黨保持溫和路線，不參與總辭與提出公投訴求，是司徒華登高一呼的成果。而正因如此，使得北京認為民主黨願意理性溝通，在希望突破僵局時候便找上了民主黨，張志剛曾表示：「民主黨不參加五區公投是一種策略考慮，這策略是要為民主黨留一條跟中央談判和溝通的後路，也就是後來換取了中央的妥協，而民主黨也取得政改方案的命名權²⁹²」。中聯辦副主任李剛邀請民主黨核心成員會面，可說是一個讓步，司徒華與相關人士認為機不可失，在雙方都有意破局的共識下，利用這個機會，爭取對香港、對民主黨都有利的政制發展。

²⁹⁰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437 頁。

²⁹¹ 根據司徒華與時任民主黨主席何俊仁的看法，當時港中雙方與國際政治環境上，有幾個方面可能使得中共願意採取動作，突破香港政制困境。

1. 曾蔭權第二任期開始，他應會希望藉由政改方案的通過來提高其公信力。
2. 國際上也關注香港政改之發展。
3. 香港的治理是台灣問題的示範，如果政改方案未妥善面對，台灣問題可能會趨於複雜。

²⁹² 出自張志剛，前述書。



司徒華以其對中共的了解，認為即使北京讓步也必有其底線，也就是人大常委會所說的「還不可以談論香港將來的安排」。於是在來回試探底線後，民主黨希望能夠在一定的框架之內提出要求，極力爭取 2012 年政改方案的突破，以及持續就 2017 年與 2020 年的終極普選目標與政府對話，以求香港民主能夠有實質進展。

在民主黨對於政改方案的修正提議進行表決時，司徒華也公開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假使否決政改方案，香港的政制就原地踏步，假如通過了，起碼多了三樣條件。第一、直選方面增多五席；第二、功能組別多了五席，近乎直選的區議會選舉，是由選民投票出來；第三、廢除區議會委任制²⁹³」。時任主席的何俊仁也說，民主黨將會持續爭取雙普選，這是不會放棄的終極目標。民主黨在此時必須先打破政治困局，爭取一個階段性的、有實質進步的成果，並要在未來十年，進行持續和長久的民主抗爭。

民主黨在 2010 年的《告全港市民書》中表示：

在繼續爭取 2017 和 2020 落實真正的雙普選，包括取消功能組別的同時，亦不要放棄取得階段性的實質進步成果。2012 修訂方案使立法會擴大了民主成份，可使香港突破現時的政治僵局，使未來的民主抗爭有更大的空間和更有利的條件…困在僵局中面對不斷惡化的社會撕裂，只會使支持民主的主流社會羣眾感到無力和厭倦，從而捨棄對民主的長期支持。這對香港的長遠民主發展是不利的²⁹⁴。

民主黨的政改方案修改建議雖然引起泛民主派中不同的聲音，甚至遭受抨擊，但也的確為停滯的香港政治開展了新的局面，實質的提升了民主黨的民意支持度，

²⁹³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435 頁。

²⁹⁴ 出自香港民主黨官方網站，(2010)。2010 年 6 月 23 日，《告全港市民書》

上升 3.8 個百分點至 15.8%²⁹⁵，最重要的是開啟了與中央溝通的契機，香港建制派政黨也表示日後或有與民主黨進行合作之機會。



總觀以上從「五區總辭」到政改方案的風波，縱使司徒華已身抱重病，到了生命最後階段，但他在民主黨中依然具有十足影響力，這兩件近代對於香港民主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中，都看的到華叔背後操盤的身影。司徒華與中共交手多年，相當清楚如何與北京打交道，而投身社運的經驗也使他看出社民連在五區總辭中是想打激進牌，搶佔在泛民主派中的地位。於是他冒著泛民分裂、甚至黨員退黨的風險，做出不參與五區總辭及與中共協商的決定，而事實上若非司徒華首肯，是民主黨任何一位領導都不敢作出如此「大膽」決定的²⁹⁶。

從事後發展的成果來說，可看出司徒華政治眼光之精銳，使民主黨擺脫激進派的打擊，走出新的局面。但這其實是司徒華一貫政治路線之展現，他曾經說：「民主黨會走一個『理性、務實和有公信力』的在野黨路線，積極監察政府，又繼續與特區政府及中央保持溝通、對話²⁹⁷」。這也是司徒華從參與社運到參政，一直以來的原則與行事方式，他理性、堅持，妥協而又不妥協，分寸的拿捏他有十分自信的掌握。因此，或許我們可以說，司徒華不但是香港民主的先驅，也是香港民主的先知。他早已為眾人設立了目標、樹立榜樣，他的精神與經驗累積，就是香港民主運動參與者的參考書。

在司徒華過世後，失去這麼一位扮演民主運動堅毅基石角色、並擁有一錘定音影響力的強人，該如何堅持發展，抗衡諸多外在與內在之不利因素，便是民主黨乃至於香港政局要面對的挑戰。

²⁹⁵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436 頁。

²⁹⁶ 參考自東周網，(2011)。《司徒華傳奇一生 — 反對公投，政改一錘定音》。

²⁹⁷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442 頁。



第三節、後司徒華時代的挑戰

2011年1月2日，司徒華不敵癌症侵襲，於威爾斯親王醫院離世，終年79歲。據在場親友描述，華叔的遺言是對支聯會義工說：「我愛你們」，並且表示將他火化後的骨灰一半撒在海中，北望神州祖國大地；另一半撒在歌連臣角火葬場的花園，貼近香港。這也表示了他對中國、對香港，與對民主志業的大愛精神，至死不渝。

司徒華的喪禮採取基督教形式舉辦，追思會在尖沙嘴的浸信會堂進行，安息禮拜於聖安德烈堂舉行，許多香港民眾前來弔唁，送華叔最後一程。但由於政治因素，特首曾蔭權與政府官員並未前來參加葬禮，僅由曾蔭權率領6名官員參加了葬禮前的公祭，以及公開表示哀悼之意。而在六四事件中受過司徒華幫助的民運人士包括王丹、吾爾開希等，在北京壓力下均被港府拒絕，無法來港悼念司徒華，唯獨呂京花一人參與了司徒華追思會以及葬禮，成為唯一能夠到香港民主領袖司徒華喪禮的海外民運人士。據呂京花表示，作為得到司徒華和支聯會營救過的晚輩，她來香港就是為送司徒華先生最後一程，她說：「華叔對我們這麼大的幫助，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自始至終在支持天安門母親。真是滴水之恩都湧泉相報，何況這麼大的幫助²⁹⁸」。

司徒華畢生致力推動民主與平反六四，堅持理想與人格操守，是爭取人權、民主和自由之社會運動的中流砥柱。司徒華的具體影響力實非筆墨所能輕易形容，他在香港近代政治史上可說是巨人般的存在，即使在晚年淡出政壇、病魔纏身，但仍然發揮影響力，帶領民主黨衝出了新的局勢。在司徒華過世後，民主黨與香

²⁹⁸ 出自美國之音新聞網，(2011)。2011年1月28日，《香港各界參加民主先驅司徒華葬禮》。



港民主及政制發展，正式的進入了後司徒華的時代，面對香港政局動盪、泛民主派分裂與建制派夾擊等危機，在達致真正民主與普選的路上，還有許多挑戰要面對。失去了這位舉足輕重的人物，今後香港甚至是中國的人權民主運動，將何去何從？

司徒華過世後，政改方案效應持續的蔓延，香港政壇呈現一種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的趨勢²⁹⁹。其中包括了泛民主派的分裂與鬥爭、建制派與民主派的組黨風潮與互相角力、北京及特區政府與香港政經關係變化，以及國際勢力的介入等。然而，在後司徒華時代，變化迅速、高壓籠罩的政局中，香港政壇已難找到如司徒華般，擁有如此江湖地位與人格操守，加上政治眼光獨到的人物，因此司徒華所留下政治資本的傳承便顯得相當重要。

在今日的香港社會，擁有高尚風骨與情操，真正為民為理想而奉獻的政治家少之又少，大部分人都是只為一己之利，而在五光十色的誘惑中迷失自我，許多政治醜聞由此而來。或有者，因為傳播媒體發達，加以選舉制度之設計，為了爭取選票與支持度而走上激進之路的團體或是人物也日益增多，但他們往往流於巧言令色，甚或互相攻訐、損耗社會成本，並非真正為了大眾利益而出發。司徒華說這種情形是「中議會毒」，即貪戀權力和物質，容易與當權者妥協，犧牲自己的原則。就是由於親身的經驗，曾有人因為貪財、貪權或貪色，而走偏了路，最後眾叛親離、自毀前途。因此司徒華也如此說：「我經常告誡身邊的戰友和朋友，千萬不要沉迷金錢和美色，否則會被腐化，甚至會棄掉原先的理想，更甚者會出賣戰友、朋友，最後被揭發，落得聲名狼藉³⁰⁰」。司徒華一生的人格為社會大眾樹立了榜樣，是他所留下一個重要的資產，但真正能夠體會且效法的人卻少之又少。

²⁹⁹ 參考自劉夢熊，(2011)。《指點江山：後司徒華時期的政治演變和建制派的因應策略》。

³⁰⁰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467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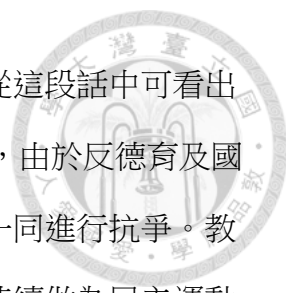
筆者認為，在現今如此的政治環境下，政客們的醜聞從不間斷，而懷抱理想與抱負的人反而被埋沒、出不了頭，這是經年累月大環境改變使然。要扭轉如此情形，則必須眾人有所自覺，能做到潔身自愛，有如司徒華所說的遠離誘惑與謹守本分；另一方面，政壇中有影響力的人也要從自身做起，扮演眾人的榜樣。如此或許能夠達致更好的政治環境，讓年輕且有理想的人有機會能為社會做出貢獻。

另一方面，司徒華生前參與創建、領導，且最為重視的三個組織：教協會、支聯會與民主黨，往後運作的方針與策略為何，亦是值得探究。司徒華為這三個組織規畫方向，也留下許多資源與社會成本積累，這是他前瞻眼光之成果。而這三個組織如何在急劇轉變的形勢中，運用他所留下來的資源，傳承精神與能量，持續爭取香港的民主理想，便是組織接班領導人面對的課題。根據司徒華的規劃，教協推動工會運動，支聯會推動社會運動，而民主黨則推動議會內外的政治運動，這三大運動「三位一體」，互相結合，合作無間，如此香港民主運動的推行就可以暢順。因此在司徒華過世前，他曾經分別見了教協前會長張文光、支聯會副主席李卓人和民主黨主席何俊仁，當面作最後的囑咐³⁰¹。

司徒華過世後，在社會情境轉換下，教師激情不復以往，因此教協會被稱為沉寂的睡火山，無復當年呼風喚雨的前進工會氣勢³⁰²。教協會是司徒華生前創立最滿意的組織，一度走在社會最前線，參與八十年代許多社會運動，爾後挾龐大資源也成為九十年代社會運動的靠山。司徒華在過世前對張文光說：「守住教協比一切都重要，就算支聯會不運作，民主黨失去議席，只要教協這個全港最大獨立

³⁰¹ 出自明報專訊，(2011)。《教協支聯民主黨，華叔留最後叮嚀》

³⁰² 出自鄒頌華，(2011)。《香港觀察：後司徒華時代的民主運動》。



工會仍在，要人有人，要錢有錢，就有東山再起的可能³⁰³」，從這段話中可看出司徒華對教協的重視與寄望，是香港基層的強大力量。2012年，由於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爭議，教協會再次站上最前線，與各個團體及群眾一同進行抗爭。教協會能否藉此機會重新凝聚組織運作，扮演稱職職工會角色，持續做為民主運動之後盾，值得觀察。

支聯會可說是司徒華愛國民主精神之傳承，也是司徒華堅持擔任主席到最後一刻的組織。支聯會警惕香港人不可忘記六四中共的殘酷，並且對抗中共的淡化與洗腦，使得一代代的香港人都可以挺身對抗中共暴政的一面。華叔過世後，支聯會內部領導階層面臨老化問題，是否有人能夠將司徒華的民族主義火炬傳遞下去，為平反六四與中國民主而持續努力，並且走出新的局面，是現在組織領導者的首要挑戰。而在支聯會的路線方面，目前新一代的香港青年人多數已經是六四之後出生的新一代，他們有較深厚的香港認同意識，有論者言：「對新一代來說，他們沒有經歷過六四的激情，六四事件是一件純粹的血腥罪行，而今日的中共政權在新一輩心目中亦毫無合法性可言³⁰⁴」。因此，支聯會一直以來由愛中國情結而出發的精神，在新社會時局的變遷下，或有需要調整的地方。組織的老舵手們必須更多的傾聽香港社會年輕一輩的聲音，並且體會香港主體精神，以避免支聯會漸漸與社會脫節。

對於民主黨而言，面對黨內退黨風暴持續醞釀，與社民連及人民力量之狙擊，民建聯又挾政府力量持續壯大，可說是內外夾擊之危機。目前泛民中所謂激進民主派崛起，包括公民黨、社民連等，正積極的培養政治新秀。這批新人都是「六四事件」之後出生的人物，跟目前民主黨主要骨幹人物為「六四」時期進入政壇的情況有所不同，民主黨可說面對著政黨老化，因此民主黨的接班與換血便是一

³⁰³ 出自明報專訊，(2011)。《教協支聯民主黨，華叔留最後叮嚀》。

³⁰⁴ 出自 Edkin，(2013)。主場新聞評論，2011年5月27日，《六四廿四，支聯會的分岔點》。

個問題。



民主黨的發展路線在司徒華去世後依然會維持「平反六四」，以及爭取終極普選之目標，但也必定面臨選擇，是要繼續走司徒華在五區總辭與政改方案之後所堅持的理性溝通路線，還是要有所變更以突破新局？然而，目前激進民主派已經有公民黨、社民連與人民力量等存在，而且他們也積極發展並鞏固勢力，因此往激進的方向走似乎不可作為。失去司徒華這位策略家，民主黨可說「講激不如人民力量，政治人物不如公民黨，建港不如民建聯³⁰⁵」，面對進退兩難的嚴峻局面，著實考驗領導人智慧。

司徒華嚴於律己的道德操守、堅定不移的意志力，以及開展社會運動與政治鬥爭的策略³⁰⁶，是他留給後人的典範。他曾經表示何俊仁與劉慧卿將會是民主派很好的領導人，在今日來說，他們是否真正繼承了司徒華的政治遺產，並且能夠承接華叔的使命，仍有待評估。放眼未來，後司徒華年代的民主派人士，能否以更大的智慧妥善處理這些諸多問題，令民主事業在建制高壓中有所前進？還是在不斷分合中寸步難行？另一方面，民主黨如何運用司徒華的策略，做到領導社運壓力配以議會力量，聯合內外呼應，確保北京與特區政府落實 2017、2020 的雙普選承諾³⁰⁷，達成民主發展的目標，或許是眼前最重要的任務。

³⁰⁵ 出自 yauyat，(2012)。《立法會選後分析》。

³⁰⁶ 出自艾克思，(2011)。《司徒華留下什麼“遺產”？》。

³⁰⁷ 參考自黃志偉，(2011)。信報專欄，2011年1月29日，《後司徒華年代與政黨政治發展》。

第六章

結論



在本文的前述章節，首先說明了香港近代的民主運動發展與其背景，接著再嘗試將司徒華的人格、精神思想、價值觀、民族主義，與行事軌跡等，代入香港背景，以歷史時間線作為主軸，回顧司徒華參與過的團體及社會活動，由他的幼年時期抗戰經歷起始，再包括其求學歷程、參與學友社、愛國與社會運動、六四事件、進入建制，與回歸後的政改紛爭等，從歷史的軌跡與經驗，分析、觀察司徒華一生走來的諸多體驗，其認同、抉擇、策略思維與價值觀之建立。嘗試了解歷史與環境的轉變如何對司徒華之思維建構造成影響；而同時司徒華的各方面特質又如何影響香港政治社會的各個層面。

基於前述諸多不同的脈絡框架，本章探索司徒華之生命歷程，包括他的民主思維、民族主義、人格與堅持等，對於所謂「司徒華式」的民主與愛國等，這些精神究竟為何？香港各界研究與其本人的記錄中，司徒華的智慧與精神具有如何特色？又，與司徒華抱持不同理念的人帶有甚麼看法？

本章同時回應促成本研究開始的若干問題，包括反國民教育科、反洗腦、佔領中環運動等香港近代社會運動與抗爭，是否可以視為是 80 年代以降，一脈相承民主運動之延續，深受司徒華等民主先鋒影響，而又走出屬於今日港人不同的道路與面貌。筆者嘗試總結數十年的努力過後，今日香港民主取得如何的成果？而面對未來諸多不確定因素，香港民主又有如何的發展契機？民主派與香港的政商菁英們能否善用司徒華所留下的政治遺產，或許可為後續研究之探討面向。



第一節、綜觀司徒華一生與回顧

司徒華離世後，香港信報社評曾表示：「不論政治上的左中右團體及社會上不同階層，都對司徒華的離世表示哀悼，在香港的政治人物之中，能夠在身後獲各方推崇的人物為數不多…一路走來，司徒華都站在香港政治爭議的風眼，經歷了大大小小不同的風波，有他這種政治歷練的人物，在香港也難找第二人³⁰⁸」。

基於信報的說法，司徒華可說是近代香港最具代表性、影響力，同時也帶有爭議性的人物之一。其一生由民主、中國、香港、信念與堅持等數個方面價值概念所貫串，彼此在司徒華身上形成緊密的連結，而這些也是司徒華最深刻的核心信念與關懷。由司徒華的作品論述與其人生選擇軌跡中都可以體會這些價值觀的表述、衝擊、矛盾到轉化，而他的信念與行動成為一種典範，對於香港、對中國最終民主政制的藍圖亦是由此過程中建構。

以下嘗試從各個不同面向，提出一個脈絡性統整的個人看法：

司徒華的民主思維

在前述章節中，曾探討司徒華對於民主的看法，與其認為香港是如何的需要民主政制。由司徒華的著作與言談中知道，他嚮往的民主政制理念即為普選，即平等的政治參與權利，而非一黨專政政體。此外，如同表 6 所述，加以三權分立、多黨制、新聞媒體言論自由，以及軍隊國家化而非政黨化等，司徒華由英國與西方政治體制所學習到的，具備現代民主價值之政制設計，如此方能構築一完善且穩定的民主政治環境。

³⁰⁸ 出自香港信報社評。2011 年 1 月 3 日，《懷斯人也 — 悼司徒華》。



司徒華曾說：「只有民主的政制，才能促進和保障自由、人權和法治。否則，即使已有的，只不過是統治者的恩賜，是隨時可以被削減和剝奪的³⁰⁹」。前述表 7 整理了司徒華對於民主制度優勢的觀點，也是他極力爭取民主與普選的原因。從眾多的資料中推測，以民主為中心價值的思維，再伴隨著對自由、人權與法治等之追求，形成在當時環境下司徒華民主思維的主要脈絡，影響港人在面對「九七回歸」的諸多不確定性所帶來之壓力下之認知構成，即必須建構一種自保制度，穩固與政府相抗衡之力量，以確保一國兩制、高度自制得以實行，避免中共可能的政治打壓。

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認為，司徒華對於民主政制的追尋、信念與價值觀，對於港人而言形成了一種典範，塑造出民主的象徵符號。而這其中包含幾個面向：

一、爭取民主是要有一份不屈不撓的毅力，不要因挫敗而退縮，亦要經過多年都仍會繼續堅持對民主的追求，正如華叔由七十年代開始到離世前的最後一天都還是心繫香港和中國的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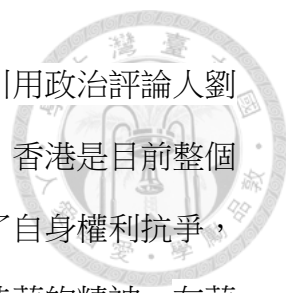
二、爭取民主在不同時期是需要採取不同的策略，亦會在不違背大原則下願意妥協以實踐目標，正如華叔在最近的政改爭議中，支持民主黨提出及接納政府方案的改良版本，終令香港民主發展取得一點向前的空間。

三、民主政治需要的政治人材必須是不為私利，不戀棧權位、一心為公的人，這正是華叔一生的寫照³¹⁰。

可見司徒華的民主思維與信念，影響了現代香港政治局面的演變與整體民主

³⁰⁹ 出自司徒華，(2002)。香港工運與教協會的經驗－阿拔·尚加學院演講詞，《滄浪之水》。

³¹⁰ 出自戴耀廷，(2011)。《司徒華與香港民主文化》。



文化之形成，他用自己的生命去體現民主精神。有如本文先前引用政治評論人劉青所說，香港在某種程度上已然成為中國爭取民主政治的基石，香港是目前整個中國領土上唯一擁有自由言論的地區，因此港人不只在香港為了自身權利抗爭，也成為關注中國人民人權與政治問題之一股力量，而這即是司徒華的精神。在華叔過世之後，他所樹立的典範與民主信念的符號，亦持續傳承並改變一代一代的香港人。

司徒華的民族主義

由司徒華的作品與自述可得知，其熱愛中國與民族主義之情懷，是除了民主之外，貫徹一生的中心思想。由幾個方面的具體行動可以看出，包括早年積極投入相關民族色彩之社會運動，到晚年不再競選立法會、淡出政壇之後，仍然堅持從事最具民族精神的支聯會工作，擔任主席帶領組織，並親自出席所有悼念活動等。

司徒華的民族主義精神可說與其出身密切相關，童年抗日戰爭的經歷塑造他愛國情緒之構成，並對他一生造成重大影響。或許可以說，不同出身會塑造不同的思維與行為選擇模式，司徒華的愛國思想與中國觀，使得他一生都會往具有民族精神的方向作價值選擇，關懷他認為是善的議題，包括推動愛國思想教育、其對六四的關懷、投入愛國運動、民主思維帶有中國主體思想等等。在五區總辭爭議中他選擇與中共妥協，部分泛民人士亦指稱此實際為其愛國主義思想所致。而觀察同是香港民主先驅、司徒華長年戰友的李柱銘，自小接受英國教育，為大律師背景，思維模式較偏英美走向，在他身上就無法發現如此濃厚的中國認同與民族主義思想，面對部分議題時便與司徒華產生意見分歧³¹¹。

³¹¹ 根據司徒華回憶錄與相關文獻，李柱銘與司徒華是「偶有歧見、目標一致」。政治意見上的歧見最明顯表現在 2010 年五區總辭中李支持激進方案，與司徒華各持己見；另一則為 2010 年政改方案風波。詳見《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



司徒華青年時期是熾熱的民族主義者，他身在香港卻也熱愛中國，渴望整體國家的富強。求學時期曾嚮往中共的進步思想，並實際投身中共組織，希望能為國家盡一己之力。而在 1970、80 年代他亦參與許多帶有民族主義色彩之社會運動，透過對這些運動的投入而宣揚其中國情感。例如中文運動時他曾提及：「中文運動同時涉及幾方面的關係，即語文、民族、中國人身份認同…這既是生活，也是民族問題³¹²」。


華叔始終支持香港回歸中國，散佈其中國思想與情感，希望港人能夠認同中國，並將自己對於民主政制的信念與愛國思想相結合，期望透過香港的民主政制發展進而影響其心中祖國之政治變革，一同邁向進步繁榮。司徒華的此種民族主義思潮，在 1970、80 年代的香港塑造一股意識形態，不同於近年愈發增長的香港本土主義，筆者認為這也是造成今日港人身份意識歧異的一個原因。

六四事件後，司徒華與中共決裂，因此他果斷劃分自身的民族情緒，將愛國與支持中共政權做出區隔，加以面對日益艱困的現實政治環境，漸漸形成了一種「建設富強民主中國從香港做起」的價值觀。政治評論家安徒認為，這是港人一直以來「自外於中國，卻又比中國更中國」情緒之延伸，在司徒華順水推舟下，嘗試「以香港為中心，提出中國未來發展的藍圖」，以本文研究之脈絡，總和來說形成所謂「司徒華特色」民主與民族主義的概念。

身份認同意識

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觀察到，以司徒華為代表的第一代香港人與目前新生代港人之間，對於中國認同的歧異之處。第一代港人如司徒華，他們多為中國移民，

³¹²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233 頁。



自然具有濃厚的中國主義思想，雖然身在香港但仍是以「中國」為主體，因此他們認同中國、也認同香港為中國的一份子。他們或許反對中共，但其只是反對中共對於香港的政權與統治方式，也反對中共對於中國的統治方式，因為這與他們想像中的中國理想發展背道而馳，其中並未有身份認同之衝突存在。

而在新一世代的港人身上則會發現「香港人」或「中國人」的認同矛盾，由文獻研究表示³¹³，此可說是近年政治社會環境轉變的複雜因素所造成的不同歷史記憶，而形成之思想分歧。包括：香港本土意識的上昇、國際化的政社經濟環境、對港府的信心與認同等等，影響了所謂「香港性」之崛起，形成以香港為核心的主體思維。九七回歸之際，面對中國的制度缺陷、人權狀況及國民素質低落等，激起了港人的「恐共」意識，「香港性」發展更為強烈，而在回歸後一國兩制的體制下，更加深了新世代港人之認同分化³¹⁴。

新一代港人的思維主體是香港而非中國，但香港的「中國性」仍然存在，此種「血緣與文化相通的中國人」的象徵意象，除了在第一代港人身上之外，也根植於某些地方，在面對環境變遷或是危機之時，便會顯露出來，希望藉由香港的超越中國，而維繫對於自身身份的認同，避免九七之後被中國所全盤掌控。這也就是新一代港人極其矛盾與衝突的身份意識問題，這些認同的差異，也表現在新世代港人對於司徒華政治決策的批判上。

對於司徒華等第一代港人來說，他們反對共產黨，並在民族議題上採取強烈的表達，就是他們中國主體意識的表現，如同安徒所說，是認為自己「比中國更

³¹³ 包括馬傑偉，(2002)。《香港人的身分認同論述》、王家英、尹寶珊，(2007)。〈香港市民身分認同的研究〉、鄭宏泰、黃紹倫，(2002)。〈香港華人的身分認同：九七前後的轉變〉、羅崗，(2001)。〈想像香港的一種方式〉等。

³¹⁴ 參考自爽報專欄，(2012)。《爽通識：香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

中國」之情緒。但對新一代港人來說，香港的主體意識使得他們認為自己「只是比西方更了解中國」，但我們「不是中國」，這便與司徒華等第一代港人形成思想歧異。



同前所述，目前的新興民主派希望利用更具國際性的新興自由民主制度，把香港當成一個平台，用西方或外來的概念去形塑香港的中國意識，把中國從主體轉變成客體，希望達成共同協調之發展，並且化解矛盾的身份認同意識。

不同的看法

司徒華的一生充滿風雨及爭議，本文主要從他的視野出發，以此作為探討與研究之基礎框架，對不同於司徒華脈絡的思維與概念則較少提及。然而這些來自不同黨派與團體的聲音，是除了政府壓力外，司徒華所面對的最重要挑戰，它們集中表現在司徒華的情感與認知方面，特別是民族主義與中國情感，為兩者最主要之分歧點。

如前提及，不同的出身會影響個人一生思維之構築與行動選擇模式，司徒華與李柱銘便為顯著例子。將之放大來說，目前香港政局中，許多在殖民地成長、沒有抗戰經歷的新生代與自由派，他們講民主、講人權，但不談民族主義、也不談中國，於是和司徒華的中國認同產生了分野。這些人主要是香港社運人士，或是泛民中的激進派，甚至是所謂「港獨份子」³¹⁵，在近年香港本體意識與「本土化運動」崛起後，開始對司徒華的民族脈絡、甚至是民主思維與信念產生質疑和批判。

根據這些說法，他們提出所謂「泛司徒華主義」，圍繞在司徒華的愛國情

³¹⁵ 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2007年「香港、台灣、澳門、沖繩民眾文化與國家認同國際比較調查」》，有獨立傾向的香港人大約佔 25%，不認同獨立的約佔 64.7%。

結，對「司徒華特色」民族主義進行批判，認為他在香港的民主作為，卻由中國本位之思想出發，這是「輕視本土、忽視本土，甚至犧牲本土」。對司徒華的批判大約包括以下類似之內容：



- 一、 中國優先於香港（香港有原罪，必須先協助中國才可自救，否則是自私不義）。
- 二、 中國可信（相信可以從極權政府手中得到民主自由）。
- 三、 敵視本土（所有本土優先，保護本土的行為都是歧視中國，是自私不義）。
- 四、 中國利益重於香港（在面對問題時會以中國本位思考，忽略香港更需要協助）³¹⁶。

另一方面，即使在深受「泛司徒華主義」影響的香港泛民主派中，亦是不斷面對分裂與分歧意見之紛擾。這些聲音主要認為華叔過度強勢，堅持己見，甚至「唯我獨尊」³¹⁷，對香港民主運動形成壟斷。到了司徒華在五區總辭，與政改方案風波中堅持幕後領導，引起部分泛民人士抗議、甚至民主黨成員退黨³¹⁸，這些議論便達致一種高峰，在華叔過世後仍為輿論之重點。

至於親政府建制派人士，雖然一直以來也對司徒華及民主派抱持質疑態度，但或許不是在於其人格或民族主義思維等方面，而是在於實質的政治、經濟利益層面，加上意識形態之問題。在這兩年政改方案風波中，司徒華授意民主黨與中共中央達成共識，被視為是民主派與北京的破冰，而建制派一直以來對司徒華的反制聲音也出現轉變跡象。

³¹⁶ 出自 1/8 蒲人，(2013)。《「救港計劃」與泛司徒華主義》。2013 年 3 月 28 日於香港高登論壇。

³¹⁷ 出自無待堂，(2012)。《除了通過「他們」，沒人可以到民主那裡去》。

³¹⁸ 黨內改革派在 2010 年 10 月 2 日組成新組織新民主同盟，並且在同年 12 月 19 日宣佈退出民主黨。



香港一直以來都是個受西方文化薰陶、中西兼容並蓄的多元社會，縱使在今日本土意識崛起的香港，司徒華的觀點與思維不被所有人認同，特別是他強烈的民族主義與中國思想，甚至支聯會在民意轉變下也開始加入「香港精神」之訴求。但司徒華對香港民主所做出的貢獻是不可否認的，他的人格與為人處事精神亦樹立楷模典範。

司徒華的政治智慧


司徒華的生命可說以爭取民主普選、平反六四為目標，他自述：「我活著的目的，是使自己能為其他人、為國家民族做有意義的事³¹⁹」。根據本文研究，筆者認為，他一生帶給香港最顯著之影響，除了民主思想與政治建設、以及中國民族主義脈絡外，或許就是他的人格與行為典範，再加上政治智慧。司徒華的人格操守與意志，為社會為理想奉獻之精神，在前文已多有提及，但華叔的政治智慧與眼光，更是他留給後人的重要政治資本，可資後人作為楷模效法。

妥協與務實的抗爭策略是司徒華在政治及社運參與中，所一直秉持的態度。由文獻中可知，司徒華是堅守原則的人，但他深知妥協的重要性，一意孤行並非政治行事之上策。從司徒華回憶錄中可推知，在不同的情境下，華叔會察言觀色、審時度勢³²⁰；而曾與司徒華在中共地下黨共事、並長年認識的梁慕嫻亦曾提及，司徒華的政治策略是妥協而又不妥協，縱使面對批評質疑、譴責謾罵，一次次在妥協與堅持之間分寸的拿捏與決策眼光精準³²¹，最後得以獲致一定成果，可說是他政治智慧的展現。

³¹⁹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458 頁。

³²⁰ 參考司徒華，同上書。

³²¹ 出自梁慕嫻，(2011)。《華叔的經驗影響深遠》。2011 年 9 月 6 日開放雜誌。



從文憑教師薪酬運動、金禧事件，到近年民主黨政改方案爭議中，都可以看到華叔對於妥協的策略性選擇。特別是 2010 年的政改方案爭議，在司徒華選擇與北京各退一步的策略下，民主黨得以與中央達成共識，透過務實溝通與談判，通過增加民主成份的改良方案，為陷入困局的民主黨注入活水，也為停滯的香港政治開展新的局面。

梁慕嫻說：「群眾運動必須取得成果才能繼續前進，妥協的政治藝術是華叔留下的一份寶貴遺產³²²」，或許可以做為司徒華政治抉擇的最佳寫照，這也同時反映在華叔「循序漸進」的民主爭取思維上。司徒華的政治眼光是長年以來的經驗累積成果，其中方寸進退與策略的巧妙運用是高明的智慧展現，可為香港民主運動參與者的模範。

司徒華的人生觀

若要探究司徒華之人生觀，最佳方式就是由其作品的字裡行間探尋。推究其本人對一生的看法，應是抱以平靜心態面對。其自謂「澹泊明志」，認為每個人都是歷史長流中的一份子，來自不同地方但歸於一處。在知道自己不久於人世之前，華叔說了一段話，可視為對其一生的作為與信念下了總結：

我不知道自己還剩下多少日子，只覺無悔今生，活著一天，就奮鬥一天，一如過往，堅持自己的理想…事實上，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先生，都沒有看見自己信念的實現。看不看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終身堅持，這也正是我一向所秉持的：成功不必我在，功成其中有我³²³。

2001 年，司徒華 70 大壽時，曾與朋友和詩以自壽：「劍氣未闌驚髮白，高樓

³²² 出自梁慕嫻，同上書。

³²³ 出自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序。

獨上不吹簫。百年血淚凝慕轍，望斷天涯路一條」。此首七絕實則蘊意深刻，詩句中亦道出其一生理念與人生觀。華叔自己解釋如下：



第三句的「百年」，有兩個意思。其一，是過去的一個世紀。這世紀，是一黨專政的政權，從興起、極盛、以至衰落、崩敗的過程，充滿血淚。這是歷史上最大的騙局，以理想、階級和民族為幌子，欺騙了無數人們的熱血和生命。其二，是一個人的一生。我這一生從這個過程走過來，體驗得其血淚和欺騙性。那經驗是寶貴的，確立了更堅定更鮮明的人生路向。

這兩個「百年」，奠定了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世界觀是：人類的歷史，必定走向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人生觀是：一個人活著的目的，是讓你的活著，使別人得到幸福和快樂，自己也因而感到幸福和快樂。這樣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已引領我走過了幾乎整整一生。展望生命的終極，也必將循著這軌跡走下去。「望斷天涯路一條」，必將只會在這一條路走下去³²⁴。

第二節、香港民主的今日與未來

今日香港政局

香港的民主發展直至今日，縱使尚未有真正的普選，在許多方面也仍受到《基本法》與北京的牽制，同時部分制度、法令規章、選舉方式等亦待精進。但過去近 30 年來的民主運動的確爭取到了一些成果，若沒有司徒華、李柱銘等民主先鋒的投入，今日香港政治呈現何種樣貌無法預測。如同香港中文大學副教授馬嶽所言，香港政制或許會趨向保守，而社會也更封閉、更不自由、更不公平³²⁵。

³²⁴ 出自司徒華，(2007)「望斷天涯路一條」，《煙雨平生》。

³²⁵ 2012 年特首選舉的選舉委員會人數已經由先前的 800 人增加至 1200 人。



回頭看本文最早所提出的問題意識，透過本文對相關文獻與資料之研究探討，可以得知近年爭取民主直選、法治，與訴求權利等運動，包括「反國民教育科、反洗腦」、「爭取雙普選」、「佔領中環」等，都是由 80 年代的社會運動與民主運動所一脈相傳，與司徒華關係密不可分，深受民主先鋒人士的思維脈絡影響。具體來說，近 30 年來的民主奮鬥過程使得今日香港能擁有一個相對開放且自由的政治環境，也帶來了整體社會與人民思想上，帶有民主成分的轉變。說明如下：

政治方面

政治上所取得的成果前文已多有提及，亦有比較分析，在這裡做總結性的敘述。首先是確保了香港回歸後的高度自治，以及自由、獨立法治、資本主義等制度得以延續。目前香港已經有著區議會的直選，而立法會也有一半議席經由直選產生³²⁶，這是民主運動人士多年鏗而不捨，與政府斡旋磋商逐步爭取而得來的。至於行政首長雖然仍是由選舉委員會選出，但選委會人數也逐漸增加，嘗試擴張代表性，往直選的方向努力。如同司徒華所說的，香港目前正在一個循序漸進的民主政制爭取過程上，政府體認到民眾對於民主的渴望，正與民間嘗試取得共識，未來的目標便是立法會與行政長官的普選。在司徒華過世後，爭取真普選的重責大任便落在香港民運新生代的肩上。

社會方面

過去 30 年來的香港社會，逐漸走上現代公民社會的發展，具體可見的變化有幾個方面：諸如抗議事件增加、社會多元化以及社會政治化等，分述如下：

一、抗議事件增加 – 根據資料顯示，自 1984 年起的 20 年間，香港的社會衝

³²⁶ 2012 年的立法會選舉，總共 70 個議席中，地區直選佔有 35 席。



突、集會遊行次數均逐年上升，顯示了港人對於自我權益保護意識，以及社會參與的意願有所提高。

二、社會多元化 – 隨著社會開放，資訊發達與教育普及，人民所關心的事務與議題也快速增展，並實際投入參與，香港邁向更為多元化的社會。

三、社會運動政治化 – 如前文提及，香港人民體會到透過政治參與，或有機會可以改變社會或政治現狀，因此逐漸產生社會運動的政治訴求，而這又特別表現在特區政府管制失當之時。資料顯示，民眾普遍認為近年政府施政低落，信任度不佳³²⁷，因而必須透過抗爭運動進行訴求傳達，要求政府回應與改善³²⁸。

四、本土意識興起 – 面對回歸前後中共政權的壓力，香港民眾逐漸興起本體意識，部分人士倡議與中國作出區隔，普遍港人對於自身「香港人身份」的認同亦有提升跡象。於是香港社會產生如同司徒華的中國思維派，與新興本土派的分野，為目前香港值得關注之社會現象。

香港民主的未來

2012年梁振英當選新任香港特首，由於他所領導團隊之施政與個人行為上爭議不斷，因此香港民眾對於梁的支持度始終偏低。根據香港大學民意調查，目前（2013年6月）香港人民對於梁振英的施政評分為46.2分（見下圖2）³²⁹，可說是不及格之成績，而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不滿意度高達51.1%，滿意度僅有19.9%³³⁰，此為香港歷任特首中表現之低標。此外，再加上他與泛民主派的互動不佳，因此民間不斷存在要求梁下台之聲音，在其任內之社運與抗爭行動亦相當多，可說是存在許多管制之危機。

³²⁷ 出自香港大學民意網站，(2013)。《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滿意程度》。

³²⁸ 參考自葉國豪，(2005)。《政治機會結構與社會運動：香港解殖後的轉變》。

³²⁹ 出自香港大學民意網站，(2013)。《特首梁振英評分》

³³⁰ 出自香港大學民意網站，(2013)。《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滿意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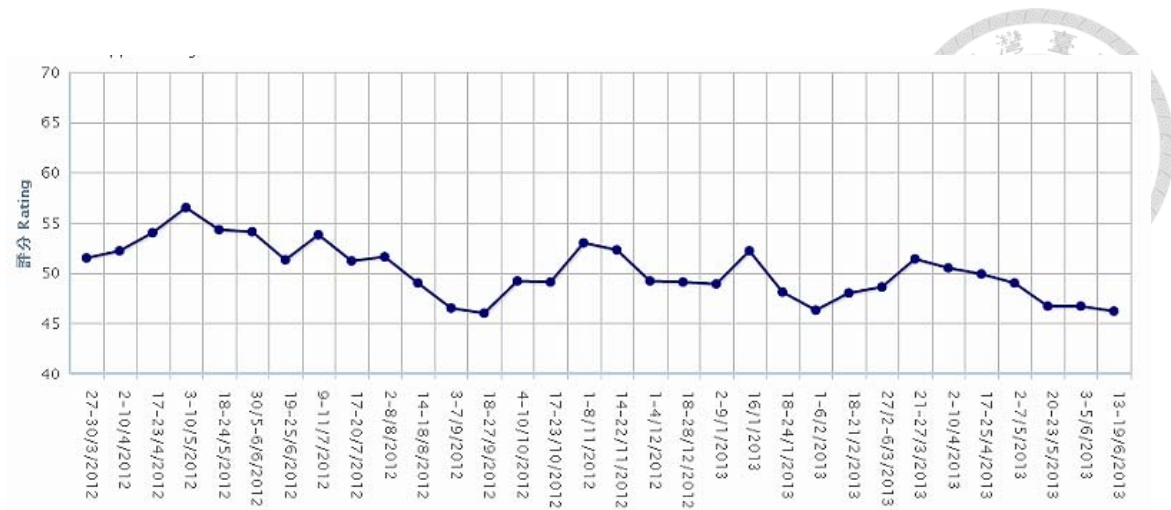


圖 2：香港人民對於梁振英任內之施政評分

對此，泛民主派認為必須確保普選推行，同時化解目前內部分裂的危機。因而在 2013 年成立「真普選聯盟」，由泛民主派團體聯合社會團體組成，以學界做為召集，希望能藉此拉攏更多中立人士參與，向政府傳達香港民主的迫切性和香港市民爭取普選的決心。真普選聯盟的成立或許是香港泛民主派在歷經分裂後，首度再次結合，指向共同之目標，即 2017 行政長官選舉與 2020 年立法會選舉的「雙普選」，同時避免中共採取行政長官預選機制等「假普選」之手段。人民力量主席劉嘉鴻表示：「真普選聯盟」是希望建立一個平台，讓擁有不同想法的黨派將分歧減到最低，帶動香港市民努力往普選邁進³³¹。

香港的民主政制是司徒華畢生最關注的理想之一，華叔曾表示，希望透過香港的民主發展，進而影響到中國整體政治改革，如此兩者方能一起發展起來，達成富強中國之目標。對於華叔此種願景，政治評論家林修祺說：

這是一種「香港結」包涵在「中國結」中的情感傳遞，（司徒華）主張香港民運以「爭取中國民主」為主體，而「爭取香港民主」為方法…於是「愛國民主運

³³¹ 出自 BBC 中文網，(2013)。《香港政黨成立真普選聯盟促雙普選》

動」成為「香港民運」的主流³³²。



但事實上，司徒華也明白目前中港之綜合情勢，在香港爭取民主對整個中國的影響不大，他曾在開放雜誌的專訪中表示：

我覺得香港民主對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影響並不大。我們對此是很小心的。中國十三億人，是香港人口的二百倍，中國民主要靠中國人自己的努力，香港人只是為自己的自由而奮鬥，沒有人想到為中國人去爭自由。到底香港人爭民主對中國有無影響？我不知道，因為消息都被封鎖，大陸人對香港究竟知道多少？毛澤東講內因是主要的，外因只能通過內因起作用。香港對中國只是一個外因，最終還是要中國內部因素起作用，民主才能有進步³³³。


或許說中國民主運動的道路，是崎嶇曲折、艱苦漫長的，即便如此，司徒華仍然堅持向前，不言放棄。但司徒華過世後，在今日香港本土意識興起的背景³³⁴下，司徒華式的精神勢必面臨修正，過往在香港訴求中國民主的思維路線，似乎已無法完全適應現今政治社會局勢。新生代的民主運動參與者強調以香港為主體，從香港本土意識出發，植根於此，是為「香港命運共同體」之概念，而非與中國民族主義相連結。

林修祺認為，2010年泛民主派中激進份子提出五區總辭的「變相公投」，就是企圖開創一個香港「住民自決」的原型；而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更是一場「本土化運動」，顯現出新生代港人對本土的認同提高，對於政府過度「中國化」的渲染產生反感。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中，許多訴求本土的口號與政綱出現，

³³² 出自林修祺，(2013)。《反對派「佔中」運動的新動向與特點》。香港鏡報論壇 2013年5月號。

³³³ 司徒華，(2003)。民主派的策略與前景，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之訪問。載於《江山無限》。

³³⁴ 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 2013年的報告《2013年「中國人」認同指數》，香港人對於自己是「中國人」的認同指數下降到自2008年以來最低。



可以看出建立香港本土情感和主體意識成為目前香港民眾與政治的主要訴求。這股風潮甚至影響了支聯會，在原有「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五大綱領之外，開始加入「香港精神」的口號概念。支聯會主席李卓人更表示，2013年的六四燭光晚會將不會採用「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的主題口號，改為「平反六四、永不放棄」，以避免「愛國」與「愛中共」畫上等號之誤解。

後司徒華時代的香港，整體政局與社會都面臨相當大的變化，香港本土意識或許逐漸成為主流，而社會運動亦不斷重構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今年正值「七一遊行」十周年之際，目前香港民主運動最清晰的目標便是爭取雙普選，面對港中之間複雜關係的牽連，香港民主派與特區政府、中央政府間的抗爭仍會持續存在，泛民主派能否團結一致，又司徒華的政治遺產與智慧能否被後繼新生代效法，或許是一個關鍵。

香港城市大學副研究員嚴飛認為，未來的十年，也就是2023年，或許可作為檢視回歸後香港政制發展的時間點。因為這是香港回歸後的第25年，也就是北京當年承諾「回歸後五十年不變」政策的中間點，同時這時候香港的雙普選理應經過四至五年之操作，可以沉澱心思檢視成果³³⁵。另一方面來說，這個時間點也與前文所述，司徒華所認為的2022年平反六四之時刻表不謀而合，屆時中共第五代領導集團交班，公民社會的發展加上政府內部權力鬥爭，塑造出新的政治環境，兩方重大事件之間的交集將產生如何的政治變化，香港的政治菁英們又如何延續其影響力，也值得後進研究者持續觀察。

³³⁵ 參考自嚴飛，(2011)。「香港大陸化，還是大陸民主化」。《二十一世紀》，2011年12月，128期，15-22。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Jan Morris 著，(2006)。黃芳田譯，《香港 1840-1997 大英帝國殖民時代的終結》，
96。臺北市：馬可孛羅文化。

丁新豹，(1997)。〈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載於王賡武編，《香港
史新編（上冊）》，59-130。香港：三聯書店。

王家英、尹寶珊，(2007)。〈香港市民身份認同的研究〉。《二十一世紀》，101，
115-127。

丘偉國，(2007)。《急推；緩進：回歸前後香港民主路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
共行政與政策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南投。

古淑美，(2010)。〈本土論述 2010 研討會：新社會運動〉。載於本土論述編輯委員
會、新力量網絡主編，《本土論述 2010：香港新階級鬥爭》，p.68-69。台北市：
漫遊者文化。

石之瑜，(2003)。《社會科學方法新論》。台北市：五南出版，p.182-183。

朱燕華，(2000)。《民主之路：東亞經驗對香港民主化的啟示》。香港：香港大學
社會學系。

吳江，(1997)。〈香港文化認同問題〉。《廣東社會科學》，1997 年第 4 期，22-23。

呂大樂，(1997)。〈香港故事：「香港意識」的歷史發展〉。載於高承恕、陳介玄編，
《香港：文明的延續與斷裂？》頁 1-16。台北：聯經文化出版

呂大樂，(2008)。〈號外：一個香港文化的故事〉。載於呂大樂（主編），《號外三十套裝—林青霞》。香港：三聯出版。

呂大樂、吳俊雄、馬傑偉，(2010)。《香港·生活·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李正義，(2000)。《香港民主機制的發展》。出版資訊不詳。

李美華等（譯），(1998)。Earl Babbie 著，《社會科學研究方法（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下冊》。台北，時英出版社。

李美華等（譯），(1998)。Earl Babbie 著，《社會科學研究方法（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下冊》。

李歐梵，(1998)。〈兩部香港電影 — 戲仿與預言〉。《世界電影》，1998，(04)，34-47。

周平，(2006)。《香港政治發展（1980~200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周蕾，(1997)。《寫在家國之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林泉忠，(2008)。〈「九七回歸」與香港華人的認同問題〉。載於張啟雄主編：《時代變局與海外華人的族國認同》。台北：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

金擘路，(2010)。〈香港作為一種立場〉。載於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新力量網絡主編，《本土論述 2010：香港新階級鬥爭》，p.201-208。台北市：漫遊者文化。



郎友興，(2002)。〈精英與民主：西方精英主義民主理論述評〉。《浙江學刊》，2003，
(06)，71-78。

香港政府，(1984)。《代議政治綠皮書：代議政治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香港：
政務印書局。

香港政府，(1988)。《代議政制今後的發展白皮書》。香港：政務印書局。

香港政府，(1992)。《施政報告 - 香港的未來：五年大季展新猷》。香港：政務印
書局。

凌文海，(2010)。〈殖民地時期傳統左派對「港人身份」的認知與感受〉。載於本
土論述編輯委員會、新力量網絡主編，《本土論述 2009：香港的市民抗爭與
殖民地秩序》，p.53-60。台北市：漫遊者文化。

凌鋒，(2003)。〈香港民主運動在回歸後的發展〉。《北京之春》，1999年3月號，
29-31。

翁松燃，(1985)。〈一國兩制芻論 — 概念、性質、內容、困難和前景〉。《九十年
代月刊》，191，12月號，30-40。

馬嶽，(2010)。〈政改三十年的世代政治〉。載於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新力量網
絡主編，《本土論述 2010：香港新階級鬥爭》，p.95-103。台北市：漫遊者文
化。

馬嶽，(2010)。《香港政治：發展歷程與核心課題》。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
太研究所



馬嶽，(2012)。《香港 80 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香港：香港城市大學。

馬嶽，(2012)。《香港 80 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高金鈴，(2004)。《香港回歸前後的身份認同觀察》。國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高雄。

高爾泰，(2008)。〈我所知道的司徒華〉。載於《青山不老》三言堂結集。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

張弘遠等譯，(1997)。Jonathan Dimpleby 著，《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The last governor: Chris Patten and the handover of Hong Kong) 》。台北：時報文化。

張家偉，(2000)。《香港六七暴動內情》。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

張順洪等，(1997)。《大英帝國的瓦解-英國的非殖民化與香港問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張慧瑾，(1997)。《中共香港政策之研究：「一國兩制」之分析》。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俊升，(2004)。〈「論說六七 - 恐左意識底下的香港本土主義、中國民族主義與左翼思潮」之評析〉。《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24。

陳雲，(2007)。〈香港人真的需要民主嗎？〉。載於《民主戲一場－香港文化與現實政治》，171-174。香港：花千樹出版公司。

陳雲，(2010)。〈政改三十年，民運無了期〉。載於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新力量



網絡主編，《本土論述 2010：香港新階級鬥爭》，p.105-114。台北市：漫遊者文化。

陳慧兒、林祺娟、潘麗瓊，(2011)。《功成必有你在：華叔紀念集》。香港：快樂書房有限公司。

黃德文，(2008)。〈我所認識的華叔〉。載於《明報·世紀》，2008年11月20日刊。

葉俊麟，(2001)。《菁英理論應用於政策制訂過程之研究：以我國國民卡方案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論文，台北市。

葉健民，(2009)。〈殖民統治與愛國學校〉。載於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新力量網絡主編，《本土論述 2009：香港的市民抗爭與殖民地秩序》，p.53-60。台北市：漫遊者文化。

葉國豪，(2005)。《政治機會結構與社會運動：香港解殖後的轉變》。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新竹。

葉凱，(2004)。〈身份的認同—對金庸小說及電影的文化解讀之一〉。《二十一世紀》，31。

鄒麗泳，(2006)。《「一國兩制」下香港政黨發展—民主黨個案研究》。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台北。

劉兆佳，(1993)。《過渡期香港政治》。香港：廣角鏡出版社。

劉兆佳，(1997)。〈「香港人」或「中國人」：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 1985-1995〉。《二十一世紀》，7，43-58。

劉兆佳，(2000)。〈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設想與現實〉。載於劉兆佳主編，《香港二十一世紀藍圖》，(1-3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劉兆佳，(2000)。《香港 21 世紀藍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劉兆佳、關信基，(1993)。〈香港市民的取向－香港人對政治權威的態度及殖民地政權的認受性〉。《香港廣角鏡月刊》，1993 年 9 月號，90。

劉佳玲，(1997)。《「香港/人」的顯影拼貼—析論「家」與「身份認同」的香港電影論述》。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曼容，(2009)。《港英政治制度與香港社會變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鄭宇碩，(1995)。〈香港的立法局選舉-九一選舉回顧與九五選舉佈署〉。載於鄭宇碩、雷競璇主編，《香港政治與選舉》。香港：牛津出版。

鄭宇碩、盧兆興，(2007)。《九七過渡：香港的挑戰》。香港：中文大學。

鄭宏泰、黃紹倫，(2002)。〈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九七前後的轉變〉。《二十一世紀》，73，71-80。

蕭全政，(1995)。〈一九九七前夕的香港在兩岸政經關係中的角色〉。載於蕭全政編，《台灣新思維：國民主義》，頁 287。台北：時英。

錢其琛，1997。〈關於香港回歸的若干問題〉。載於《求是》1997 年 12 期，12-13。

鍾庭耀，(2003)。香港中文大學與香港大學民調中心之民意調查報告。

羅崗，(2001)。〈想像香港的一種方式〉。《二十一世紀》，65，64-73

關信基，(1998)。〈香港政治社會的形成〉。載於劉青峰等編，《轉化中的香港：身份與秩序的再尋求》，109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嚴飛，(2011)。〈香港大陸化，還是大陸民主化〉。《二十一世紀》，2011年12月，128期，15-22。

司徒華著作部分

司徒華，(1987)。〈不要歪曲市民對「八八直選」的立場，司徒華於立法局對《民意匯集處報告書》和《監察委員報告書》動議辯論之發言〉。載於《十年風雨聲》。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

司徒華，(1987)。〈代議政制發展的大倒退，司徒華於立法局對《代議政制今後的發展白皮書》動議辯論之發言〉。載於《十年風雨聲》。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

司徒華，(1987)。〈沒有直選，就不會有民主政制〉，司徒華於立法局對《代議政制發展檢討綠皮書》意見動議之發言。載於《十年風雨聲》。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

司徒華，(1987)。〈評論一九八七年的港督「施政報告」〉。載於《十年風雨聲》。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

司徒華，(1987)。〈解開死結，重視母語 — 1987年3月25日，立法局就是否成立一個中文基金的問題進行休會辯論之發言〉。載於《十年風雨聲》。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



司徒華，(1994)。〈以甚麼態度面對「九七」〉。載於《十年風雨聲》。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

司徒華，(1995)。〈有關「臨時立法會」的種種奇談怪論〉。載於《十年風雨聲》。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

司徒華，(1997)。〈「鞭」與「也」〉。載於《捨命陪君子》，三言堂結集。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

司徒華，(1997)。〈我所認識的彭定康〉。載於《捨命陪君子》，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

司徒華，(1997)。〈附錄：中學畢業後的我〉。載於《捨命陪君子》。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

司徒華，(2002)。〈香港工運與教協會的經驗 — 阿拔·尚加學院演講詞〉。載於《滄浪之水》。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

司徒華，(2003)。〈民主派的策略與前景，《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對司徒華之訪問稿〉，2003年8月。載於《江山無限》。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

司徒華，(2005)。〈「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載於《橙黃橘綠》。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

司徒華，(2006)。〈香港回歸後九年多以來的變化（2006年9月15日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演講講稿）〉，載於《弦斷誰聽》，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

司徒華，(2006)。〈香港回歸後九年多以來的變化，2006年9月15日華盛頓美國



國會圖書館演講講稿)。載於《弦斷誰聽》。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

司徒華，(2006)。〈結集十二《塵土雲月》出版了〉。載於《橙黃橘綠》，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

司徒華，(2007)。〈「望斷天涯路一條」〉。載於《煙雨平生》。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

司徒華，(2007)。〈我讀「疾風驟雨中」的周南〉。載於《煙雨平生》。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

司徒華，(2007)。〈甚麼是愛國？甚麼是民主？〉。載於《煙雨平生(三言堂結集)》，香港：次文化堂

司徒華，(2007)。〈甚麼是愛國？甚麼是民主？2007年7月27日香港民主促進會及公共專業聯盟座談會講稿〉。載於《煙雨平生》。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

司徒華，(2007)。〈背叛與欺騙〉。載於《青山不老》，三言堂結集。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

司徒華，(2008)。〈香港獨立工會的道路和經驗 — 為教協會成立三十五周年而作〉。載於《青山不老》，三言堂結集。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

司徒華，(2009)。〈《明報》與我50年〉。載於《欄干拍遍》。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

司徒華，(2009)。〈「無味」與「可憎」〉。載於《欄干拍遍》。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

司徒華，(2009)。〈13年後六四或會平反〉。載於《欄干拍遍》。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

司徒華，(2009)。〈殘酷的本質〉。載於《欄干拍遍》。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

司徒華，(2009)。〈答有關六四〉。載於《欄干拍遍》。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

司徒華，(2011)。〈序〉。載於《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英文部分

Chris Patten, (2007). Not Quite the Diplomat: Home Truths about World Affairs. Canada: Penguin Group.

David Faure,(1997). Society,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George Beer Endacott, (1964). 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Hong Kong 1841-1962.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51-52.

Harold Lasswell and Abraham Kaplan, (1963). Power and Society: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Inqui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Hsin-Chi Kuan, (1999). "Is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ormula Working?". In Gung-Wu Wang and John Wong(eds.), Hong Kong in China: The Challenges of



Transition.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pp. 23-46.

Ian Scott, (1989).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Joseph A. Schumpeter, (1976).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Ming K. Chan, (1994). Decolonization Without Democracy: The Birth of Pluralistic Politics in Hong Kong. in Edward Friedman (eds).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zation: generalizing East Asian experiences, p.163. Boulder: Westview Press.

Ming Sing, (2004). Hong Kong's Tortuous Democraticiz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Siu-kai Lau, and Po-san Wan, (2000)."Social Conflict: 1987-1995". Pp.115-170, in Lan Siu-kai (e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Yash Ghai, (1997). Hong Kong's New Constitutional Order: The Resumption of Chinese Sovereignty and the Basic Law.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盧兆興，（1998）◦ Decolon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 Citizen Participation ◦ Asian Survey, 28(6), 613-629.

金耀基 Yeo-Chi King, (1975). 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 in Hong Kong: Emphasis on the Grass Roots Level. Asian Survey, 15(5):422-439.

網路資料



〈金禧流水賬〉，原載《學苑 - 金禧專號》。於 2013 年 5 月 3 日，取自

<http://web.archive.org/web/20080929131422/http://www.geocities.com/stssisthebest/gold.html>

《SARS 嚴重急性呼吸綜合症》，於 2013 年 4 月 17 日，取自衛生署，

http://www.info.gov.hk/info/sars/c_infected.htm

《大陸保釣運動開始轉向？民間出海行為被中國政府嚴格壓制》，(2011)。美國之音，於 2013 年 5 月 8 日，取自

<http://news.backchina.com/viewnews-124909-big5.html>

《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及二零零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 — 建議方案》，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於 2013 年 4 月 17 日，取自

<http://www.cmab.gov.hk/cd/chi/report5/index.htm>

《香港身份認同的建造》，(年分不詳)。2012 年 11 月 14 日，取自

<http://www.socialwork.com.hk/artical/sociology/top12.htm>

1/8 蒲人，(2013)。《「救港計劃」與泛司徒華主義》，2013 年 3 月 28 日於香港高登論壇。於 2013 年 6 月 25 日，取自

http://forum5.hkgolden.com/view.aspx?type=CA&message=4339332&highlight_id=0&page=197%E5%81%89-%E5%BE%8C%E5%8F%B8%E5%BE%92%E8%8F%AF%E5%B9%B4%E4%BB%A3%E8%88%87%E6%94%BF%E9%BB%A8%E6%94%BF%E6%B2%BB%E7%99%BC%E5%B1%95

BBC 中文網，(2013)。《香港政黨成立真普選聯盟促雙普選》。於 2013 年 6 月 26 日，取自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3/03/130321_hk_alliance_for_true_democracy.shtml



Edkin，(2013)。主場新聞評論，2011 年 5 月 27 日，《六四廿四，支聯會的分岔點》。於 2013 年 6 月 9 日，取自

<http://thehousenews.com/politics/%E5%85%AD%E5%9B%9B%E5%BB%BF%E5%9B%9B-%E6%94%AF%E8%81%AF%E6%9C%83%E7%9A%84%E5%88%86%E5%B2%94%E9%BB%9E/>

Michael Elliott, (2008). A Tale Of Three Cities. TIME Magazine, 2008/1/17. 2013/1/26

Retrieved from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1704398,00.html>.

yauyat，(2012)。《立法會選後分析》。於 2013 年 6 月 8 日，取自

<http://www.wretch.cc/blog/yauyat/9240680>

司徒華，(2010)。《金禧事件奠定教協威望》。於 2013 年 5 月 3 日，取自

<http://news.sina.com.hk/news/20110108/-1287-1976629/1.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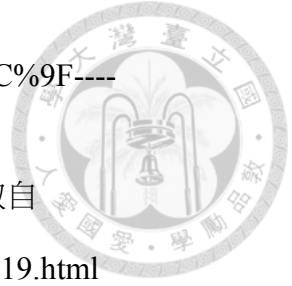
安徒，(2012)。《勇士凱旋，反思保釣》。於 2013 年 5 月 8 日，取自

http://vicsforum.blogspot.tw/2012/08/blog-post_19.html

艾克思，(2011)。《司徒華留下什麼“遺產”？》。於 2013 年 5 月 1 日，取自

<http://lingfengcomment.pixnet.net/blog/post/28051645-%E5%8F%B8%E5%BE%92%E8%8F%AF%E7%95%99%E4%B8%8B%E4%BB%80%E9%BA%BC%E2>

%80%9C%E9%81%BA%E7%94%A2%E2%80%9D%EF%BC%9F----



艾克思，(2011)。《高風亮節司徒華》。於 2013 年 5 月 21 日，取自

<http://www.chengmingmag.com/cm389/389spfeature/spfeature19.html>

李賜雄。〈罷課，罷課〉。載於《我的人生旅途-生活及工作紀趣(70年代)》。於 2013

年 4 月 29 日，取自 <http://arthur.imageunion.com/1704.htm>

明報專訊，(2011)。《教協支聯民主黨，華叔留最後叮嚀》。於 2013 年 6 月 8 日，

取自 <http://news.sina.com.hk/news/20110105/-2-1972985/1.html?rtext>

東周網，(2011)。《司徒華傳奇一生 — 反對公投，政改一錘定音》。於 2013 年 6

月 5 日，取自 <http://eastweek.my-magazine.me/index.php?aid=10208>

東周網，(2011)。《司徒華傳奇一生 — 成立教協，凝聚力量》。於 2013 年 5 月 1

日，取自 <http://eastweek.my-magazine.me/index.php?aid=10205>

林修祺，(2013)。〈反對派「佔中」運動的新動向與特點〉。《香港鏡報論壇》2013

年 5 月號。於 2013 年 6 月 25 日，取自

<http://www.hkdevelopment.org/article/59.html>

非常識，(2012)。《香港民主改革的過去、現在與未來》。2012 年 3 月 26 日非常識

第 226 期，於 2013 年 6 月 26 日，取自

<http://news.cntv.cn/special/thinkagain/democracyinhongkong/index.shtml>

星島日報，(2011)。《政壇掀風雨，一生走我路》。載於 2011 年 1 月 3 日星島日報

社評。於 2013 年 6 月 4 日，取自

<http://www.singtao.com/archive/fullstory.asp?andor=or&year1=2011&month1=1>

&day1=3&year2=2011&month2=1&day2=3&category=all&id=20110103j01&keyword1=&keyword2=



星島日報，(2011)。2011年1月3日社評專欄，《政壇掀風雨，一生走我路》。於2013年5月11日，取自

<http://www.singtao.com/archive/fullstory.asp?andor=or&year1=2011&month1=1&day1=3&year2=2011&month2=1&day2=3&category=all&id=20110103j01&keyword1=&keyword2=>

美國之音新聞網，(2011)。2011年1月28日，《香港各界參加民主先驅司徒華葬禮》。於2013年6月6日，取自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article-20110129-hk-held-funeral-pro-democracy-giant-szeto-wah-114855889/777042.html>

香港大學民意網站，(2007)。《2007年「香港、台灣、澳門、沖繩民眾文化與國家認同國際比較調查」》。於2013年6月26日，取自

<http://hkupop.hku.hk/chinese/release/release529.html>

香港大學民意網站，(2013)。《2013年「中國人」認同指數》於2013年6月26日，取自

http://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ethnic/chicitizenIndex/poll/index_poll_chart.html

香港大學民意網站，(2013)。《市民的身份認同感 — 身份類別認同》。於2013年1月9日，取自

http://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ethnic/eidentity/poll/eid_poll_chart.html

香港大學民意網站，(2013)。《市民對香港特區政府的信任程度》。於 2013 年 6 月 26 日，取自

http://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sargperf/sarg/poll/sarg_poll_chart.html

香港大學民意網站，(2013)。《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滿意程度》。於 2013 年 6 月 26 日，取自

http://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sargperf/sarg/poll/sarg_poll_chart.html

香港大學民意網站，(2013)。《特首梁振英評分》。於 2013 年 6 月 26 日，取自

http://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ce2012/cy/poll/cy_poll_chart.html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官方網頁。於 2012 年 10 月 15 日、2013 年 5 月 19 日，取自 <http://www.alliance.org.hk/>

香港民主黨官方網站，(2010)。2010 年 5 月 24 日，《理性溝通對話，建立政改共識 — 實現 2017 行政長官和 2020 立法會的終極普選》。於 2013 年 6 月 4 日，取自 <http://www.dphk.org/?p=5083>

香港民主黨官方網站，(2010)。2010 年 6 月 23 日，《告全港市民書》。於 2013 年 6 月 5 日，取自 <http://www.dphk.org/?p=5792>

香港信報社評，(2011)。2011 年 1 月 3 日，《懷斯人也 — 悼司徒華》。於 2013 年 6 月 6 日，取自

http://www.hkej.com/template/dailynews/jsp/detail.jsp?dnews_id=2982&cat_id=6&title_id=402904

香港政府部門及有關機構（按組織架構編排）。於 2012 年 10 月 10 日，取自

<http://www.gov.hk/tc/about/govdirectory/govwebsite/index.htm>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條例》。於 2013 年 4 月 15 日，取自

<http://www.hklii.hk/chi/hk/legis/ord/569/>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網頁，取自 <http://www.hkptu.org/index.htm>

桑普，(2011)。〈司徒華的中共情意結〉。《開放雜誌》網路評論，於 2013 年 5 月

11 日，取自 <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414>

馬傑偉，(2002)。《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論述》。2012 年 11 月 14 日，取自

http://www.com.cuhk.edu.hk/project/eric/site/hk_identity.pdf

爽報專欄，(2012)。2012 年 10 月 10 日《爽通識：香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2013

年 7 月 30 日，取自

<http://www.sharpdaily.hk/supplement/100018/20121010/141628/%E7%88%BD%E9%80%9A%E8%AD%98-%E9%A6%99%E6%B8%AF%E4%BA%BA%E7%9A%84%E5%9C%8B%E6%B0%91%E8%BA%AB%E4%BB%BD%E8%AA%8D%E5%90%8C>

張志剛，(2011)。《思入風雲：鬥爭老手》。載於 2011 年 1 月 4 日東方日報社論專

欄。於 2013 年 6 月 4 日，取自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10104/00184_010.html

梁文道，(2011)。《司徒華，一個死在香港的中國人》。取自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1/01/201101110209.shtml>

梁慕嫻，(2011)。〈華叔的經驗影響深遠〉。2011 年 9 月 6 日於《開放雜誌》。於 2013

年 6 月 26 日，取自 <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415>



彭小明，(2011)。《緬懷司徒華叔印象》。取自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1/01/201101100055.shtml>

港報評司徒華：《政壇掀風雨，一生走其路》。於 2013 年 5 月 9 日，取自

<http://www.hkzone-forum.net/archiver/?tid-4582.html>

無待堂，(2012)。《除了通過「他們」，沒人可以到民主那裡去》。於 2013 年 6 月

26 日，取自 <http://dadazim.com/journal/2012/11/road-to-hell/>

華夏經緯網，(2007)。《港人治港》。於 2012 年 10 月 10 日，取自

<http://big5.huaxia.com/zt/sw/07-062/588091.html>

黃志偉，(2011)。信報專欄，2011 年 1 月 29 日，《後司徒華年代與政黨政治發展》。

於 2013 年 6 月 8 日，取自

<http://www.procommons.org.hk/%E9%BB%84%E5%BF%>

新浪網社評 2011 年 1 月 5 日：《華叔精心設計的支聯會》。於 2013 年 5 月 21 日，

取自 <http://finance.sina.com.hk/news/-1-3535251/1.html>

葉劉淑儀，(2006)。《香港的民主發展：過去、現在與將來》。於 2013 年 6 月 26

日，取自

<http://ieongigij.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207871>

鄒頌華，(2011)。《香港觀察：後司徒華時代的民主運動》。於 2013 年 6 月 8 日，

取自

<http://learnedfriend.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28033>



劉青，(2011)。《司徒華價值 — 民主精髓》。於 2013 年 4 月 20 日，取自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11/01/201101110719.shtml>

劉夢熊，(2011)。《指點江山：後司徒華時期的政治演變和建制派的因應策略》。

於 2013 年 6 月 6 日，取自

<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2/07/PL1102070001.htm>

潘天賜，(2008)。《風雨同行教協人 — 人在教協三十五年》。於 2013 年 4 月 28 日，

取自 <http://www.hkptu.org.hk/ptu/director/pubdep/ptunews/543/rain.htm>

頭條日報專題，(2011)。《各界對司徒華的評價》。於 2013 年 4 月 20 日，取自

http://www.hkheadline.com/news_topic/nt_content.asp?sid=6173&nt=np

龍緯汶，(2010)。《香港回歸後的民主倒退》。於 2013 年 4 月 11 日，取自

http://cathayglory.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68

戴耀廷，(2011)。《司徒華與香港民主文化》。於 2013 年 6 月 21 日，取自

http://legalsandwich.blogspot.tw/2011/01/blog-post_08.html

蘋果日報專欄，(2010)。《蘋論：與華叔一起走好民主每一步》。於 2013 年 5 月 10

日，取自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00208/13708662>

蘋果日報專欄，(2011)。2011 年 1 月 2 日，《耗盡半生爭民主》。於 2013 年 5 月 15

日，取自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10102/14828378>

蘋果日報專欄，(2011)。2011 年 1 月 3 日，《司徒華病逝，民主鬥士，風雨一生》。

於 2013 年 4 月 20 日，取自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10103/14829498>

蘋果日報專欄，(2011)。2011年1月3日，《苦難中成長，動盪中堅持，為了民主，一生孤寂》。於2013年4月20日，取自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10102/14828377>



蘋果日報專欄，(2011)。2011年1月3日，《帶領泛民打下雄厚政治基礎，全面直選，力爭到底》。於2013年5月11日，取自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10103/14829568>

蘋果日報專欄，(2011)。2011年1月3日，《教協第一擊，金禧事件轟動》。於2013年5月2日，取自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10103/14829613>

附錄



附錄一、司徒華暨香港相關大事年表（粗體表示）

1931年：生於香港，祖籍廣東開平。

1946年：港督楊慕琦發表政制改革方案，後胎死腹中。

1950年：畢業於皇仁書院，就讀期間開始參加團體和社會活動。

1952年：畢業於葛量洪師範學院，為該校首屆畢業生。並開始從事教育工作，在紅磡街坊公立學校任職教師及教務主任，直至1961年。

1961年：在葛量洪師範院校友會觀塘學校出任校長，直至1992年退休。

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引起暴動抗議。

1967年：香港左派發動暴亂，是為六七暴動。

1968年：港英政府推動新政，加強政府與民間溝通，為香港社運的萌芽。

1971年：畢業於官立文商夜學院。

1973年：因文憑教師薪酬不公問題，領導非學位教師爭取合理薪酬，發動罷課成功，成為工運領袖，並開始創立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1974年：創立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同年3月獲選為教協理事會會長。

— 1974-1990年擔任教協理事會會長；

— 1990-1996年擔任教協理事會副會長；

— 1996年至今擔任教協監事會主席。

1978年：發起第二次中文運動，爭取中文成為主要教學語言。

1978年：參與調查金禧中學校董會貪污事件，反對教育司署封閉金禧中學。

1979年：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中英談判開始，香港回歸逐漸明朗。

1980年代初：領導香港教育界抗議日本篡改日本教科書中侵華歷史部份，組織「紀



念九一八民眾大會」。

1983年：政治團體匯點成立，主張港人治港與民主政治，以及立法、行政、司法獨立，維持資本主義體制。

1984年：基本法草委會成立。

1985年：港督尤德發表代議政治白皮書，宣布政制改革，香港進入過渡期。

1985年：以立法局教育界功能組別擔任立法局議員，並且擔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

1986年：區域市政局成立。

1986年：組織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召開民主政制高山大會，成為香港民主運動核心力量。

1987年：發起爭取八八直選的「民主政制維園大會」。

1987年：率領「香港訪京民主對話團」訪問北京。

1989年：六四事件後與中央政府決裂，與李柱銘同時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並擔任主席至其過世，同年獲美國「中國民主教育基金」頒發「中國民主傑出貢獻獎」。

1989年：香港百萬人遊行聲援北京民運，並且罷工罷市。

1990年：擔任教育統籌委員會委員至91年。

1990年：擔任香港職工會聯盟秘書長至92年。

1990年：香港民主同盟成立，並擔任中央常務委員至94年。

1991年：任九龍東地區直選立法局議員至97年（現今香港立法會前身）。

1992年：彭定康任總督，發表施政報告，提出政改方案推動民主與改革選舉制度。

1994年：參與創立民主黨，任民主黨中央常務委員、黨鞭至08年。

1995年：任觀塘北直選市政局議員至97年。

1996年：任教協監事會主席。

1997年：香港回歸，董建華任特區行政長官，臨時立法會成立，回歸前的立法局



議員多數「下車」。

1997年：獲捷克「人民需求基金」頒發人權獎。

1997年：擔任臨時市政局議員（觀塘北委任）至99年。

1998年：任立法會九龍東直選議員至04年。

2000年：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解散。

2003年：SARS在香港爆發，近300人死亡。《基本法》第23條草擬立法。

2003年：聯同四十多個團體舉行七一大遊行，逾五十萬人參加，迫使政府擱置《基本法》23條立法，前特首董建華翌年請辭。

2004年：宣佈不再競選立法會議員，但仍擔任支聯會及民主黨職務。

2004年：「愛國愛港」爭議，北京和中國相關學者發表文章與言論，提出所謂「愛國者治港」，掀起論爭。

2005年：第一屆行政長官董建華以「健康問題」為由辭職，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出任行政長官，政改方案遭立法會否決。

2005年：曾蔭權提出政改方案，第五號報告書發表，為就2007年與2008年選舉的建議改革方案，後被立法會否決。

2007年：由於出席民間電台的六四論壇被檢控，被質疑具政治性。

2007年：泛民主派首次推出候選人參與行政長官選舉。

2007年：曾蔭權再次提出政改方案，中國人大常委會表示香港普選或在2017年之時間表。

2008年：在4月20日於維園舉行的城市論壇上，司徒華被個別人士指以「人權聖火」是與奧運聖火相衝突，是蓄意阻撓和破壞奧運聖火在港的傳遞。

2009年：組織參與六四燭光晚會。

2009、2010年：反對五區總辭，與社會民主連線主席黃毓民互相指責，被部份支持總辭的人指責阻擋香港民主進程。

2010年：帶領民主黨與中共達成妥協，進行破冰會談，並通過修改的政改方案。

2010年：證實患有第四期肺癌。

2011年：因癌症病逝。

2012年：反國教運動、佔領中環運動。



附錄二、司徒華作品整理



資料參考整理自司徒華作品彙編網站 <http://www.szetowah.org.hk/works>，包含會議記錄、發言等，以及出版的散文或專書作品。司徒華從 1997 年為《明報》副刊的《三言堂》專欄撰寫文章，文章數量眾多，結集成書後由「次文化堂」出版。

司徒華的散文與專書

《大江東去》 - 2011 年出版的司徒華回憶錄
《兒童文藝故事》
《妹妹》
《父慈子孝》
《父親的秘密》

「三言堂」結集（次文化堂出版）

1998：《捨命陪君子》
1999：《猶吐青絲》
1999：《胸中海嶽》
2000：《去尚纏綿》
2001：《悲欣交集》
2002：《望斷天涯》
2002：《夜聽春雨》
2003：《滄浪之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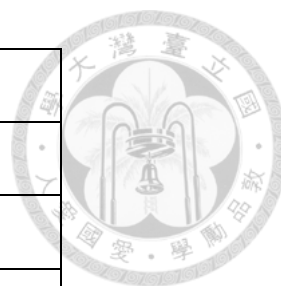


2004：《江山無限》
2004：《化作春泥》
2005：《山鳥山花》
2006：《塵土雲月》
2006：《橙黃橘綠》
2007：《弦斷誰聽》
2008：《煙雨平生》
2008：《青山不老》
2009：《一寸春心》
2010：《欄干拍遍》
2010：《起看星斗》
2011：《竦聽荒雞》

「三言堂」選輯（次文化堂出版）

《回眸時看》
《隨風潛入夜》
《滋蘭又樹蕙》
《一枝清采》
《俯首甘為》
《又綠江南》

《難忘的溫馨往事》：司徒華在葛師校友會觀塘學校教學點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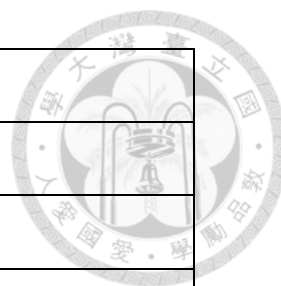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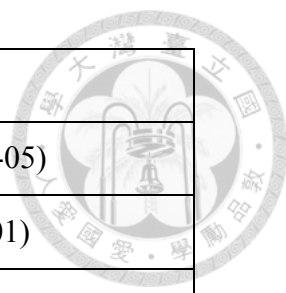
一篇九十五分的習作 (1997-12-06)
聖誕老人送洗衣粉 (1997-12-09)
笑中有淚的街頭一幕 (1997-12-12)
一個難忘的聖誕節 (1997-12-21)
三個頑劣的學生 (1998-01-14)
我對他們的期望 (1998-01-17)
三十二年後的聖誕 (1998-01-20)
《第二次龜兔賽跑》 (1998-04-22)
蒼翠的小森林 (1999-01-08)
《強仔坐了波監》 (1999-01-11)
馬拉松好手 (1999-04-19)
五姊弟 (1999-06-09)
少年往事 辛酸難忘 (2000-02-25)
「他日相逢下車揖」 (2001-07-19)
跨越苦澀 (2004-10-22)
廿四味的苦 (2004-12-06)
「這一枝是我的！」 (2005-01-11)

《十年風雨聲》：司徒華一九八五至一九九五年立法局言論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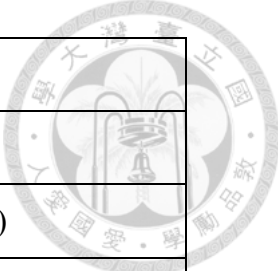
評論一九八五年的港督「施政報告」 (1985-11-28)
發揚勞資兩利、坦誠協商的精神 (1985-12-18)
廣播事業要推動社會進步 (1986-03-19)
提高教育質素的一項重要措施 (1986-03-27)

沒有必要冒這樣的險 (1986-07-16)
關注大亞灣核電廠的安全問題 (1986-10-15)
誰是公屋計劃的得益者？ (1986-10-29)
評論一九八六年的港督「施政報告」 (1986-11-05)
對預科教育和幼兒教育的意見 (1987-01-21)
引起公眾恐懼的條例 (1987-03-11)
反對不公平不合理的稅制 (1987-03-19)
解開死結 重視母語 (1987-03-25)
支持設立中央公積金制度 (1987-05-13)
改善對僱員的破產欠薪保障 (1987-07-01)
反對對電影進行政治審查 (1987-07-08)
沒有直選，就不會有民主政制 (1987-07-16)
評論一九八七年的港督「施政報告」 (1987-11-05)
不要歪曲市民對「八八直選」的立場 (1987-11-18)
各級議會之間要有由下而上的聯繫 (1988-02-10)
代議政制發展的大倒退 (1988-03-17)
要實行夫妻分開評稅 (1988-04-21)
不應對電影加以政治審查 (1988-05-18)
長期服務金制度有待改善 (1988-06-29)
基本法(徵求意見稿)的諸問題 (1988-07-14)
教統會第三號報告書的兩個關鍵問題 (1988-10-26)
評論一九八八年的港督「施政報告」 (1988-11-09)
政府不能在醫療服務問題上怠工 (1989-03-08)
政府財政收支的諸問題 (1989-04-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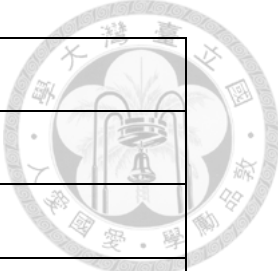




這是光明與黑暗決戰的時代 (1989-05-31)
我為甚麼參與發起「港人救港運動」？ (1989-07-05)
評論一九八九年的港督「施政報告」 (1989-11-01)
祝福與致敬 (1990-04-04)
抗議漠視幼兒教育 (1990-04-26)
支持制訂人權法案 (1990-06-27)
教育條例中一項不合時宜的條文 (1990-07-04)
反對輸入外地勞工 (1990-07-04)
馬理遜獎學基金 (1990-07-11)
評論一九九零年的港督「施政報告」 (1990-10-25)
選舉制度的問題 (1990-11-28)
不公平的議席分配 (1990-11-28)
選民年齡要降低到十八歲 (1990-11-28)
教統會第四號報告書的三大問題 (1991-01-16)
「劫貧濟富」的財政預算案 (1991-03-27)
以「賊」為喻 (1991-05-29)
人權與獸權 (1991-06-05)
老有所養 不可忘本 (1991-07-10)
立法局代表甚麼人的利益？ (1991-07-17)
評論一九九一年的港督「施政報告」 (1991-07-30)
需要「公開諮詢」不要「充分考慮」 (1991-11-13)
不能在終審法院問題上指鹿為馬 (1991-12-04)
請啟聯不要做「凡是派」 (1992-01-29)
新聞自由是人民的眼睛、耳朵和喉舌 (1992-02-26)



對民意置若罔聞的財政預算案 (1992-03-25)
要將財政盈餘用於中小學教育 (1992-05-13)
怎樣在中學裡推行工業安全教育？ (1992-05-20)
「龜石賽跑」的笑話 (1992-06-03)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1992-06-14)
檢討和改善立法局和行政局之間的關係 (1992-07-01)
「多議席單票制」的真面目 (1992-07-15)
對非英聯邦大學畢業生的歧視 (1992-07-16)
選舉委員會與基本法 (1992-10-14)
評論一九九二年的港督「施政報告」 (1992-10-21)
我們不坐「紅色豬籠車」 (1992-11-11)
公屋計劃的本質 (1992-12-09)
教育工作要「有的放矢」 (1992-12-09)
政府要對幼稚園教育作更大承擔 (1993-02-03)
有所進步的財政預算案 (1993-03-24)
讓全民投票來決定政制發展 (1993-04-21)
要「協調哲學」，不要「鬥爭哲學」 (1993-05-12)
「三符合」抑或「兩違反」？ (1993-05-26)
不一而足的公屋管理問題 (1993-06-02)
行政立法關係的關鍵問題何在？ (1993-07-14)
社會主義的「新品種」 (1993-10-13)
評論一九九三年的港督「施政報告」 (1993-10-20)
九七年後的出入境自由 (1993-11-10)
不能將「排污服務費」變作「人頭稅」 (1993-12-01)



「斗膽」而「瘋狂」的加價申請 (1994-01-19)
不要做「政治禽獸」 (1994-02-23)
虛假的「還富於民」 (1994-03-23)
政府對開設實用學校缺乏誠意 (1994-04-27)
從《聯合聲明》不斷後退 (1994-05-04)
就席揚案件回應詹培忠議員 (1994-05-11)
譴責港督彭定康先生 (1994-06-08)
新界婦女的權利 (1994-06-22)
以甚麼態度面對「九七」 (1994-06-29)
我們要有這樣的道德勇氣 (1994-06-29)
評論一九九四年的港督「施政報告」 (1994-10-19)
從「白飯」到「叉雞飯」 (1995-01-18)
對幼兒教育的意見 (1995-03-23)
全面檢討居屋計劃 (1995-05-17)
進一步發展特殊教育 (1995-06-14)
花園大廈的問題 (1995-06-21)
有關「臨時立法會」的種種奇談怪論 (1995-06-28)
我們一定會捲土重來 (1995-07-28)



附錄三、本文參考線上百科相關資料

此部分為本文參酌之線上百科資料，其中不乏專業資訊之提供，對本文寫作幫助頗大。但由於網路百科資料或有不全，或是參考性不足的疑慮，故列於本文末端，以附錄形式呈現。

維基百科，0708年雙普選條目。於2012年10月15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0708%E5%B9%B4%E9%9B%99%E6%99%AE%E9%81%B8>

維基百科，1998年香港立法會選舉條目。於2013年5月28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8%E5%B9%B4%E9%A6%99%E6%B8%AF%E7%AB%8B%E6%B3%95%E6%9C%83%E9%81%B8%E8%88%89>

維基百科，2000年香港立法會選舉條目。於2013年5月28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0%E5%B9%B4%E9%A6%99%E6%B8%AF%E7%AB%8B%E6%B3%95%E6%9C%83%E9%81%B8%E8%88%89>

維基百科，2007年及2008年香港政治制度改革條目。於2013年4月17日，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07%E5%B9%B4%E5%8F%8A2008%E5%B9%B4%E9%A6%99%E6%B8%AF%E6%94%BF%E6%B2%BB%E5%88%B6%E5%BA%A6%E6%94%B9%E9%9D%A9>

維基百科，2012年香港政治制度改革條目。於2013年6月4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6%94%BF%E6%B>



2%BB%E5%88%B6%E5%BA%A6%E6%94%B9%E9%9D%A9_%282012%E5%B9%B4%29

維基百科，七一大遊行條目。於 2012 年 10 月 6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3%E4%B8%80%E5%A4%A7%E9%81%8A%E8%A1%8C>

維基百科，八八直選條目。於 2013 年 5 月 11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B%E5%85%AB%E7%9B%B4%E9%81%B8>

維基百科，中文運動條目。於 2012 年 10 月 14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1%9B%E9%87%8F%E6%B4%AA%E6%95%99%E8%82%B2%E5%AD%B8%E9%99%A2>

維基百科，中文運動條目。於 2013 年 5 月 8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96%87%E9%81%8B%E5%8B%95>

維基百科，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條目。於 2012 年 10 月 7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C%8B%E9%A6%99%E6%B8%AF%E7%89%B9%E5%88%A5%E8%A1%8C%E6%94%BF%E5%8D%80%E5%9F%BA%E6%9C%AC%E6%B3%95BA%A4>

維基百科，五區總辭條目。於 2013 年 4 月 18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4%E5%8D%80%E5%85%AC%E6%8A%95>

維基百科，五區總辭條目。於 2013 年 6 月 3 日，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4%E5%8D%80%E5%85%AC%E6%8A%95>

維基百科，六四事件條目。於 2012 年 10 月 14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D%E5%9B%9B>

維基百科，六四事件條目。於 2013 年 5 月 15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D%E5%9B%9B%E4%BA%8B%E4%B6>

維基百科，文憑教師薪酬運動條目。於 2013 年 4 月 29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6%86%91%E6%95%99%E5%B8%AB%E8%96%AA%E9%85%AC%E9%81%8B%E5%8B%95>

維基百科，司徒華條目。於 2012 年 10 月 13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8%E5%BE%92%E8%8F%AF>

維基百科，民主化條目。於 2012 年 11 月 1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4%B8%BB%E5%8C%96>

維基百科，民主黨條目。於 2013 年 5 月 28 日，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4%B8%BB%E9%BB%A8_\(%E9%A6%99%E6%B8%AF\)](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4%B8%BB%E9%BB%A8_(%E9%A6%99%E6%B8%AF))



維基百科，何俊仁條目。於 2013 年 5 月 28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5%E4%BF%8A%E4%BB%81>

維基百科，泛民主派條目。於 2013 年 5 月 28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6%B0%91%E4%B8%BB%E6%B4%BE>

維基百科，金禧事件條目。於 2013 年 5 月 7 日，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7%A6%A7%E4%BA%8B%E4%BB%B6>

維基百科，非殖民化條目。於 2012 年 11 月 4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D%9E%E6%AE%96%E6%B0%91%E5%8C%96>

維基百科，保釣運動條目。於 2013 年 3 月 11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9D%E9%87%A3%E9%81%8B%E5%8B%95>

維基百科，英皇制誥 (香港)條目。於 2013 年 2 月 27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7%9A%87%E5%88%B6%E8%AA%A5_\(%E9%A6%99%E6%B8%AF\)](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7%9A%87%E5%88%B6%E8%AA%A5_(%E9%A6%99%E6%B8%AF))

維基百科，香港中學入學考試條目。於 2013 年 4 月 29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4%B8%AD%E5%AD%B8%E5%85%A5%E5%AD%B8%E8%80%83%E8%A9%A6>



維基百科，香港主權移交條目。於 2013 年 4 月 9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4%B8%BB%E6%AC%8A%E7%A7%BB%E4%BA%A4>

維基百科，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條目。於 2012 年 10 月 15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5%B8%82%E6%B0%91%E6%94%AF%E6%8F%B4%E6%84%9B%E5%9C%8B%E6%B0%91%E4%B8%BB%E9%81%8B%E5%8B%95%E8%81%AF%E5%90%88%E6%9C%83>

維基百科，香港民主同盟條目。於 2013 年 5 月 23 日，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6%B0%91%E4%B8%BB%E5%90%8C%E7%9B%9F>

維基百科，香港民主運動發展史條目。於 2012 年 10 月 6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6%B0%91%E4%B8%BB%E9%81%8B%E5%8B%95%E7%99%BC%E5%B1%95%E5%8F%B2>

維基百科，香港回歸條目。於 2012 年 10 月 7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4%B8%BB%E6%AC%8A%E7%A7%BB%E4%BA%A4>

維基百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條目。於 2012 年 10 月 10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7%89%B9%E5%8D%80%E6%94%BF%E5%BA%9C>

維基百科，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條目。於 2013 年 4 月 17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5%9F%BA%E6%9>

C%AC%E6%B3%9523%E6%A2%9D



維基百科，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條目。於 2012 年 10 月 14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96%87%E9%81%8B%E5%8B%95>

維基百科，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條目。於 2013 年 4 月 28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6%95%99%E8%82%B2%E5%B0%88%E6%A5%AD%E4%BA%BA%E5%93%A1%E5%8D%94%E6%9C%83>

維基百科，香港機場核心計劃條目。於 2013 年 4 月 7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6%A9%9F%E5%A0%B4%E6%A0%B8%E5%BF%83%E8%A8%88%E5%8A%83>

維基百科，高爾泰條目。於 2013 年 5 月 11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5%B0%94%E6%B3%B0>

維基百科，真普選聯盟條目。於 2013 年 7 月 1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C%9F%E6%99%AE%E9%81%B8%E8%81%AF%E7%9B%9F>

維基百科，麥理浩條目。於 2013 年 3 月 7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A%A5%E7%90%86%E6%B5%A9>

維基百科，彭定康條目。於 2013 年 4 月 7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D%AD%E5%AE%9A%E5%BA%B7>



維基百科，黃雀行動條目。於 2013 年 5 月 17 日，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3%E9%9B%80%E8%A1%8C%E5%8B%95>

維基百科，匯點條目。於 2012 年 10 月 15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AF%E9%BB%9E>

維基百科，楊慕琦計劃條目。於 2013 年 3 月 20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5%8A%E6%85%95%E7%90%A6%E8%A8%88%E5%8A%83>

維基百科，葛量洪教育學院條目。於 2012 年 10 月 14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1%9B%E9%87%8F%E6%B4%AA%E6%95%99%E8%82%B2%E5%AD%B8%E9%99%A2>

維基百科，維園六四燭光晚會條目。於 2012 年 10 月 15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6%AD%E5%9C%92%E5%85%AD%E5%9B%9B%E7%87%AD%E5%85%89%E6%99%9A%E6%9C%83>

維基百科，臨時立法會條目。於 2013 年 4 月 7 日，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8%E6%99%82%E7%AB%8B%E6%B3%95%E6%9C%83>

